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执行理事长	林宏修	黄 涛	徐启源
副 理 事 长	林 锋	高 翔	
理 事	陈 昱	陈伏金	林 山
	黄文山	苏 忠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徐启源		
编 委	汪征鲁	赵麟斌	陈伏金
	陈 昱	林 山	陈章汉
	黄文山	王 坚	

《闽都文化》总第92期 2024年第3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出版单位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 编	陈 昱
执行主编	黄文山
副 主 编	刘小敏 郭志杰
编辑部主任	曾建梅
编 辑	李铁生 王春燕 林瑶佳 张博雅
编 务 主 任	单 南
编 务	何 玲 何财铭
装帧设计	乔 麦
封面摄影	陈怡健
本期责任编辑	王春燕
地 址	福州鼓楼区天皇岭弄 11 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 子 邮 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hyjh.com/

闽 都 文 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敬请关注
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杂志刊号 CN-35(Q) 第 0093 号
印刷厂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支付的稿酬已含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网络传播，请在投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Contents

P4



闽江之“心”

P12



说不尽的太平

P18

天开灵境留仙住



在水一方

- 4 万小英 闽江之“心”
- 12 魏 冶 说不尽的太平
- 18 管柏华 天开灵境留仙住
- 24 叶 润 南通不再“难通”

左海风流

- 30 柏 荣 八尺薯藤，一念众生

岁月写真

- 34 林碧莲 父亲的村庄

坊巷春秋

- 39 蔡 林 没有爱的“爱庐”
- 44 陈常飞 大根路与城守前
- 48 黄河清 老街记忆

闽都记忆

- 51 景 艳 成均之教固海基

Contents

P30



八尺薯藤，一念众生

P34



父亲的村庄

P89

半岛风情



- 58 戎章榕 追寻饶刚生
- 64 禾源 廉介自持 明于政治
——屏南知县沈钟

双塔视野

- 68 乔 撞 梁思成手绘的福建古塔
- 72 孟丰敏 把茶叶带到西方的荷兰人
- 77 江梦笔 浮香之路
- 82 胡沧泽 隐元禅师东渡之旅

福地山水

- 89 吴安钦 半岛风情

在线读城

- 93 杨国栋 芬芳四溢“茉莉花”

- 封面 陈怡健 茉莉花开（摄影）
- 封二 黄民杰 南公园（国画）
- 封三 卓继辉 送郭一章诗卷（书法）
- 封底 陈玉树 万荷·绽香

闽江之“心”

万小英

尼罗河之于埃及，恒河之于印度，幼发拉底、底格里斯河之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黄河、长江之于中国……河流对地域的影响，谁也不能无视。闽江对于福建，也是如此。

美国劳伦斯·C·史密斯《河流是部文明史》中说，从最早的几场雨开始，我们的星球就被永久地重塑了。落到地面上的水，开始冲刷地球上刚刚出现、日渐增厚的大陆地壳。自此，水和陆

地展开了一场永不停歇的攻守战。水滴汇聚到一起，聚成了一种磅礴的力量——河流。河流只有一个使命：往下流，一直往下，流向大海。

河流其实还有一项使命，就是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依傍着她而生，创造出属于他们的生活与生命状态。对于旁人来说，闽江与其他河流没有分别，在数百万年间，流淌着，不停歇地搬运泥土，雕刻山峦，冲积出河谷平原，吸引着先民



在肥沃的两岸驻足，筑造家园。可是对于闽人来说，闽江显然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世代与闽江依存，是如此紧密，伴随着江河的波澜起伏，几乎融为一体。

是的，闽人与闽江是一体的。闽人胸腔里跳动的那一颗颗心，也跳动在闽江之中——那绵延的江水，紧紧地怀抱着这块土地，在时间的长河里承载了多少闽人的心绪，怎能不化作闽江之“心”？

—

说闽江之“心”，不能不说她那颗带有神性的母性之心。

东晋《搜神记》记载了从闽江来的螺女故事。闽人谢端从小就是孤儿，住在闽侯江边，一天在这里捡到一个斗大的螺，就带回家放在水缸里养着。自此之后，每日回家都可见到桌上摆好

了丰盛的饭菜。他不知道是谁在帮他，一次回家意外见到一个美丽少女正在灶台忙活。姑娘对他说：“我是白水素女，天帝怜悯君子少孤，所以遣妾与君具膳。今既已知，妾当化去，留壳与君。”螺壳很神奇，自此常常会自动盛满米，得赖这些米粮，谢端的子孙都活得很好。为了纪念这段奇遇，人们把这段闽江称之为钓螺江。

撇开浪漫的外壳，从这段神话可以看到一段历史符号叙事。如果将谢端和螺女分别代表闽人和闽江，这个故事就可解读为：闽一带的人如无父无母的孤儿，处于偏地；后来受老天哀怜，得到闽江的慷慨馈赠，吃上了饱饭，子孙无忧。这个解读其实很真实地反映了闽江对于闽人持久、深厚的哺育历史。

在闽人的眼里，闽江是母性的。所以，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仙女下凡与世俗男子因缘交葛演化成爱情故事，螺女与谢端很“清白”。事实上，后来闽江边的百姓筑螺女庙纪念，神龛里坐着





螺洲古镇螺女庙

的也是一位古代中年母亲形象，呼为“仙娘”。娘——这也是闽江在闽人心目中的可感形象。

如果说东晋的螺女是闽江隐性的“母神”，那么唐代的陈靖姑则是众所周知的“母神”。陈靖姑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闽江之女”，不仅家住闽江边的下渡，而且拜师学捉妖降魔之术到闾山，此处位于闽江水底龙潭角一带。她之后在闽江上演一出感天动地的壮举，终不幸丧生闽水。她因显灵救苦，被人们尊为“临水夫人”。

传说陈靖姑一生与为害百姓的“两鬼一怪”（长坑鬼、挨拔鬼、蛇怪）缠斗。24岁时有孕在身，明知出去施法会受伤，但仍在对百姓怜悯之心的驱动下，帮助祈雨。她将三月孕胎暂存于母家的大木桶下，然后独自来到白龙江布洋坪施展道法。在滔滔闽江里，只见这位奇女子左手执龙角，右手执宝剑，乘着一片草席漂在江中……刹那间，浓云密布，大降甘霖。谁知鬼怪潜入下



龙潭角陈靖姑祈雨处

渡陈家，伺机害她。胎毁血崩、力衰神散的陈靖姑，因未学救产之术，不能自救。陈靖姑死后魂灵重新进入闽水之中的闾山师门，学得救产之术。自此凡有人间胎产，远近呼之必显应拯救，成为千千万万妇孺的保护神。在今天的福建，孩子落地第一件事依然要认她做“干娘”。

每每想起这位准母亲，在大雨中的闽江，在汪洋血水之中无助心碎的情景，都会泪眼模糊。闽江看过她庇护百姓风暴般的能力与决断，听过她内心痛楚无助的哀鸣，见证她从“侠义女神”成长为护佑苍生的“母神”过程。闽江之“心”一定也为之颤动。

闽江有害人的“鬼怪”，意味着河流有着任

性、灾难的一面，是取人性命的暗流，是打船的急流，是泛滥的洪水……宋代的柳七娘也是一位与闽江的“妖怪”搏斗的准母亲。

据传，柳七娘习得法术，前半生与做官的丈夫在外地生活。丈夫被人陷害致死后，她用计谋让恶人伏法，然后将丈夫的灵柩带回福州。此时，闽江上的南台大桥建了19年仍无法完工，因为龙潭壑有精怪捣乱。柳七娘在为丈夫报仇之后，已决定不再轻易施法术，但面对家乡人相求，还是挺身而出，在苍霞洲江边施法除妖。大桥最后顺利竣工，就是闽江上第一座石桥“万寿桥”。

值得一提的是，近2000年后，1949年8月17日，万寿桥再次迎来一场激烈的光明与黑暗的较量。解放军战士英勇的鲜血染红了闽江之水。万寿桥战斗对解放福州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为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此桥改名为“解放大桥”。从石墩桥到水泥桥，桥的外形会变；从万寿桥到解放大桥，桥的名字也会变；但是桥下的闽江之水滔滔不变。

或许江水滔滔，才让柳七娘产生了要凭一己之力在闽江口建塔的强烈想法——她说是为了“镇水势，可以保全闽风水”，但不少人认为是为亡夫祈求冥福（值得一说的是，“罗星”是她孩子的名字，是遗腹子）；或许两种理由都有——此石塔，就是著名的罗星塔。

闽江从武夷山脉出发一路奔流，闽江口是江水流入东海不回头之前，悄然叹口气、回旋不舍



罗星塔

的地方。今天的罗星塔在山包上，一度成为指引航道的“中国塔”。可是要知道，当年柳七娘所建的石塔是屹立于闽江之心的，俗呼磨心塔，因为在水中央就像磨盘之心。其实江水日夜磨的，也有她的妻心、母心。

螺女、陈靖姑、柳七娘……固然她们是传说中的女神级别，但其实，悲悯仁厚、勇敢无畏、情意深重等这些母性的特质，本身就带有神性。她们都与闽江息息相关，隐含的深意可想而知。

二

说闽江之“心”，不能不说她那颗带着诗性的自由之心。

千百年来，闽江在自由的漫游探索中塑造着自己的模样。以前河道更广阔，水量更充沛。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在福州看到“有一大河宽一哩，穿行此城”。大河就是闽江，“一哩”等于1600多米，当时就有这么宽。但是无论怎样变化，她的方向不变，目标不变，跨越千里，奔腾着，从赣闽交界的武夷山一路汇入东海。

闽江从武夷来，所以当朱熹坐船从武夷来到福州，让人恍惚觉得，他是被闽江的流水波光捎来的。

闽江记录了诗人的心绪。去古田的路上，他

写下《水口行舟二首》：“昨夜扁舟雨一蓑，满江风浪意如何？今朝试揭孤篷看，依旧青山绿树多。”“郁郁层峦夹岸青，春山绿水去无声。烟波一棹知何许？鸂鶒两山相对鸣。”在这位被当时政权削职、迫害，而一路逃奔的诗人眼里，有些东西是不会被骤然风雨以及无法揣测的前路改变的，比如闽江的景色，比如人的信念。行至福州淮安半岛附近的一段闽江，朱熹的心境更如一江碧水：“春日江中注，我行溯其波。扬帆指西澨，两岸青山多。青山自逶迤，飞石空嵯峨。绿树生其间，幽鸟鸣相和……”（《石岵江行》）“挂帆望烟渚，整棹别津亭。风水云已变，我行安得停？离樽枉群贤，独醪愧先倾。谈笑不知倦，但觉江水清……”（《晚发淮安》）在闽江的抚慰之下，朱熹在江波青山间谈笑而过；当然更可能的是，闽江在朱熹的心照之下，呈现出如此宁静自由的景象。

一位福州的女儿在闽江面前，也不由得自在起来。一向被读者视为母亲或奶奶的冰心，回忆起40多年前的回乡之旅，一下子就显现孩子的口吻：

“走的是水路。那时我从山东的渤海，走进福建的闽江，觉得江水实在比海水安静温柔得多！我曾在一首短诗中，提到那时的情景：白雾蒙蒙，是江南天气，雨儿来了——我只知道有蔚蓝的海，却原来还有碧绿的江。这是我父母之乡！”

（《还乡杂记》）似乎正是闽江，



淮安半岛江景



白马河上的“缺哥望小姐”雕塑

令这位游子轻松地认出了故乡。

在福州，闽江穿城而过，一条条内河是她延伸的胳膊，揽住坊巷小道，探进闽人更幽秘的生活。爱情，最容易让人看出隐藏的个性。闽水滋养下的闽人血液中的情愫以及骨子里的性格究竟是怎样的呢？

在白马河有一组雕塑很生动，讲的是民间流传的“缺哥望小姐”故事。薛品玉是闽国官员之女，美丽聪慧，对父亲为官不正的行为颇有警觉，并加以规劝，但并无效果，只好躲入小楼成一统。她不愿顺从父亲以婚事攀附权贵，而是对楼下小河上的缺嘴渔郎黄耆有好感，扬言“宁嫁箬笠渔子，不嫁纨绔小儿”。渔郎也爱上了她，苦于无法表达，竟郁郁而终。死前叮嘱母亲，他心里结了一块相思石，可拿去卖，以养暮年。那石头奇异，放在水里，可结出渔郎对着楼上小姐含情脉脉的幻境。薛品玉见后，感怀至深，竟

然悬梁自尽。后在罗源林九娘法术的帮助下，两人还阳，喜结连理。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薛品玉与黄耆这对情侣演绎了福州版的《牡丹亭》。比之杜丽娘与书生柳梦梅，薛品玉与黄耆更为痴情，双双情深致死，又死而后生；而且这是“白富美”爱上“矮矬穷”，跨越了社会阶层。唐代闽人这般见识、勇气、情义，让河水似乎也展现着个性自由的卓然独立。

无独有偶，安泰河上也演绎过这般特别的爱情——“荔枝换绛桃”。河沿的吊脚楼上住着书生艾敬郎，隔河对面楼住着女子冷霜婵，对他暗生情愫，扔过来荔枝。书生情动，回抛过去绛桃，上写“身无彩凤双飞翼”。女子又抛荔枝，纸包上写“心有灵犀一点通”。两人由此相恋。不料闽王王延翰垂涎冷霜婵美色，但她异常刚烈，宁死不屈。最终，这对“苦命鸳鸯”共赴烈火而亡。

朱熹、冰心，作为诗人，自然蕴含着不竭的自由诗意。爱情也是人生的诗篇。“不自主，毋宁死”，坚定、热烈的心灵，投影在波心，闽水默默奔流。

三

说闽江之“心”，不能不说她那颗带有野性的超然之心。

闽江流经福建 38 个县市，流域面积约占全省陆域的一半。谁都看得出，闽江有着庞大的动脉一样喷发的能量，围绕着闽人运转。所以有个说法，福建之所以称为闽，是因为闽江——先有一条叫“闽江”的江，依她而存的福建，也就简称“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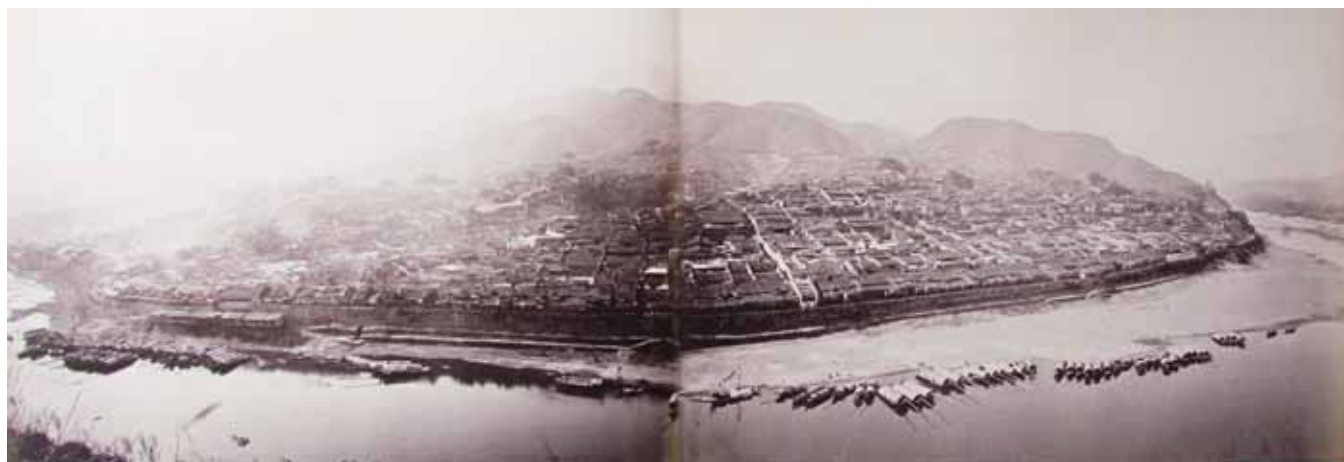
很多人陶醉于闽水的宁静、温柔，这些人是幸运的，不必见识其暴烈、凶险的一面。但这或许是闽江更为凸显的个性，因为有一颗险峻、激越之心，才是其生命不息的动力来源。在闽江上讨生活的人深谙这一点。

1862 年至 1872 年十年间，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逊游历了东南亚和中国，拍摄了大量照片，并写出了《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福州与闽江》等作品。在《十载游记——马六甲海峡、中南半岛与中国》中，讲述了他在闽江的经历：“我在水口租了一艘‘快船’载我们到延平府。船长是郑寿，或者应该说是他的妻子，主要说话的人

都是她，尽管身高不到四英尺，却比高出她两倍的女人多出一倍半的话。老实说，她真可谓是女中豪杰，现代中国的奇女子！当我们逆流而上第一道急流，只见她人还在船头喂幼儿吃奶，转眼间便将孩子丢入篮中，拿起长篙把船撑开以免撞上岩石。紧接着又去照顾小鬼，要不就是煮饭、打扫、逗弄丈夫，无论是心血来潮还是情势所逼，她总能把每件事做得妥妥当当。”

“有一回我们顺流而下，脆弱的船只在急流弯道中猛冲的速度，一度让我以为此命休矣，谁敢相信舵手竟每次都能及时让船转向避开瞬间冒出来的巨石呢？只见他镇定地屹立于船桥，铁掌牢牢握住长舵，不动如山，眼看着就要撞上石头了，我正准备要跳水逃生，他却以全身的力量推动船桨，整艘船随即横扫一圈，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开危险。我们就这样前进，然后退！退！退！有如一片羽毛在乱流之中飘摇不定。”

汤姆逊不由得感叹：“当我看着这些穷苦的



约翰·汤姆逊拍摄的福建延平府

船夫冷静、勇敢而大胆地穿梭于闽江急流之中，每一趟无不是冒着生命危险，而且在这里除了行会可能提供些许补偿之外也没有保险，赚的又是仅供糊口的微薄工资，我开始有了更深一层的体认：这群受无能政府管束的中国人，其实潜在有一种刚毅、不屈不挠的特质。”

船夫为何如此拼命？因为他们懂得，闽江不仅仅是一条水流，而是需要日夜操劳的所在，要为闽人带来粮食、房子、百货……带来闽人的生活源泉。

“八山一水一分田”，福建山路多，陆路难行，水道一度是更为便捷的通道。在曾经舟舸如梭的闽江上，往返于福州与闽江上游南平、三明地区的商船浩浩荡荡。那时福州并不产米，全靠闽北山区的产粮区供给，所以米船如织。此外还有从山区顺流而下的茶叶、木材以及其他农副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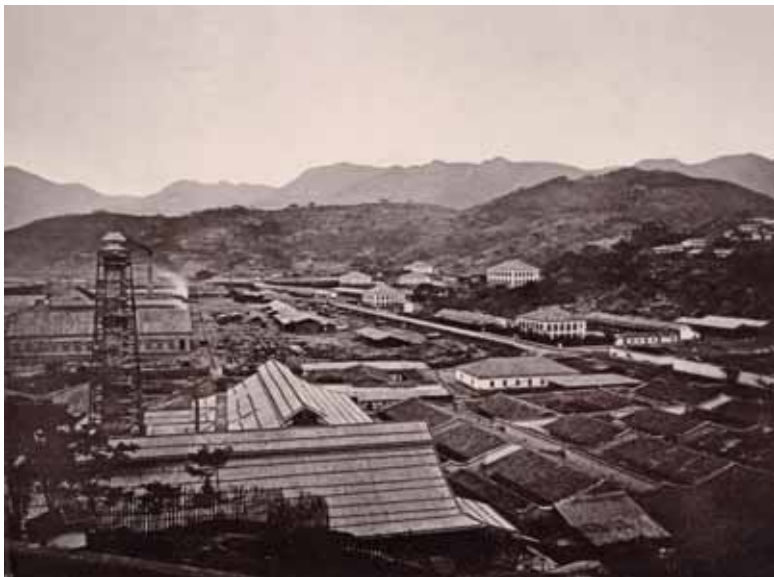
产。而从沿海城市逆流而上的，则是食盐、日用百货等。

闽江，构造了沿线百姓千百年来生活样态。早年“纸褙福州城”，人们用木板造房、踏木屐，正是因为有河流源源不断地送来山里的木材。福建船政在马尾造船，很大一个原因是物流的顺畅，可以从闽江上将一船船木材源源不断地从武夷山运抵马尾港，用作造船原料。闽江入海口又成为一个新起点，茶叶、脱胎漆器、寿山石、瓷器等，源源不断地运往海外，流布全球。

说起福建船政，不能不讲闽江边的严复。滔滔闽水陪着少年的他成长，也见证过他后来在福建船政学堂做学生、当教员时开眼看世界，意欲强盛民族的意气风发。想不到的是，没过几年，严复的那些同学师友以及风华正茂的学生在马尾海战覆没。常年在异乡的严复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有一年除夕，心情恶劣的他写了一首诗给同乡陈衍：“乡思如潮不可减，连床何限语咄咄。即今除夕非佳节，莫向桃符署旧衔。天下诗才衡左海，故园胜处负楞岩。买山未是巢由事，江水犹应鉴至诚。”巢父、许由可以归隐山林，他连躲都不知到哪里去，只是不断地想起故乡，“江水犹应鉴至诚”，坚信故乡的江水会明白他一腔至诚之心。

也只有闽江的超然之手能够抚慰他的痛苦。或许，他并不知道，闽江之“心”此时正和他的心在一起跳动。



约翰·汤姆逊拍摄的福建船政

说不尽的太平

魏 冶

1

现代人也许很难想象，大海此岸的一只素色茶碗，会在彼岸的岛屿掀起何等滔天巨浪。

和中国宋代遥遥相对的日本镰仓幕府时代，正在掀起一阵中国茶具的热潮。那时候的日本上层贵族，尤其是最高统治者源赖朝父子，酷爱来自中国的茶碗，其中一种被称为“天目”的茶具，在日本地位奇高，皇室贵族几乎达到了非此莫用的程度。

“天目”为何？

曲折复杂的历史巨石，有着许多褶皱般的误会。天目是中国一座名山，在今浙江省临安县。宋时日本僧人来到中国求法，临近海滨、寺院林立的天目山是一大去处。归国的僧人多有将天目山寺院中的黑釉茶碗携回的，久之，日本就

称这些来自中国的茶碗为天目茶碗、天目釉，但考其源流，这些茶碗并非产于天目，而是来自多个窑口，其中以福建的黑釉居多。

无论如何，彼时的天目釉在日本享誉极高，日本人想模仿烧制，却屡屡失败。许多怀有匠心的日本人渡海，遍访中国窑口学习，其中就有被日本誉为“陶祖”的加藤四郎左卫门景正。他跟随道元禅师到福建学习制瓷技术6年，足迹涉及闽北闽南的各大窑口。加藤四郎学成回国后，在濑户开窑烧造黑釉炆器——即日本现存最古陶窑之一“濑户烧”。加藤四郎所仿的，主要就是被称为“灰被天目”的中国黑瓷茶碗。

顾名思义，灰被天目得名于茶碗的色彩：胎体厚重青黑，釉面呈落灰般的银泌色泽，却非灰麝而致，而是碗在窑中受火不均留下的痕迹。故此，反有妙手天成的意趣，日本人对此更加趋之若鹜。

濂户烧在日本国内享誉极高，濂户烧又尊灰被天目为母本，自此，灰被天目在日本身价日隆，乃至后世有“天下仅有天目三盏”的说法：三个盏分别被三个达官贵人收藏，灰被天目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被奉为超凡无上的神品。直到现在，灰被天目依然被列为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的重要藏品，予以妥善保管。

然而，“神品”的产地却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它的名字“天目”追踪，是找不到答案的。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因考古队的发掘解开了谜团。

谜底的坐标，落在了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太平镇葫芦山村的茶洋窑里。

从上空俯瞰，茶洋窑掩映在茂密的树林里，前后连接大岭、马坪、生洋、碗厂、安后五座山坡，时代绵延几百年：宋元时期以大岭、安后为代表，清代多见于新碗厂等窑址。窑址位于古村



茶洋窑遗址

茶洋，占地7万多平方米，山下闽江蜿蜒流过。在重现天日之前，茶洋窑在各种史志中都未被提及，为何如此，也是一个谜题。但只消从它延续的时间和窑口规模来看，便可知它的产品是极丰富、影响是极大的。

茶洋窑的工匠极为庞杂地学习和融合了建窑、景德镇窑和龙泉窑技艺，烧制出黑釉、青白釉、青釉、酱釉、绿釉、青花等多种产品。黑釉系的茶盏是窑中产品的主体，主要仿建窑系的束口盏和敛口盏，烧制年代多为南宋至元代。其中出土的一类束口、深弧腹、平肩的器物，样貌和日本奉为神品的“灰被天目”极为相似。这一发现，揭开了尘封已久的谜题。

茶洋窑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丰富了建盏的体系，扩展了建窑系的拼图。福建南平的建窑建盏，是中国宋代黑瓷的代表作，早已名动天下。但长期以来，建窑系的窑口都被认为仅分布在建



灰背天目茶盏，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

阳和武夷山等地。太平镇茶洋窑的发现，使建窑建盏的历史书写荡开一笔，笔触延伸到了100多公里外。灰被天目的原型在茶洋窑，赋予了它重要窑口的地位。茶洋窑产品也在世界各地遥相呼应：韩国新安沉船中出水的浅腹黑釉盏和茶洋窑遗址器型相同；宁波的明州罗城城墙

遗址（望京门段）出土了大量黑釉瓷，其中部分样品被认为来自茶洋窑……茶洋窑的风靡一时可见一斑。这一切，使建窑系从武夷山脉延伸到闽江，拥有通江达海的气质。

有趣的是，历史的脉络一直不曾断过。太平镇的茶洋瓷器厂诞生于1956年，生产日常用品，就选址在茶洋村旧窑址附近。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深入，瓷器厂的工作人员才惊奇地发现：原来厂房竟筑基在历史之上，江水亦流淌在传承之中。瓷器厂开启了茶洋窑工艺的复原和仿烧工作，工匠们借鉴茶洋窑古代样品成分配方，进行原料筛选和搭配，成功烧制出灰被天目盏。古老的太平茶洋窑没有画上句号，它的复兴之门正悄然打开。

2

200多年前的一天，一支小船队沿着闽江顺



茶洋村

流而下，停泊在太平镇江边的一个小村庄——蛟坑。蛟坑有一潭深水，青山四合，凝成碧绿，传说有蛟龙出没，一位神仙曾在此斩杀蛟龙，得了这个名字。一位士人从扁舟里探出身来，作为北方人的他，正在从京师到地方赴任的途中，欣赏了这大异其趣的独特山水，不禁诗兴大发，挥毫写下《蛟坑夜泊》一诗，生动再现了蛟坑山水环绕、瀑布飞泻的壮观景色。这位士人不是别人，正是名满天下的才子纪晓岚，诗云：

暝色从西来，乱山青莽莽。滩河戒夜行，薄暮收双桨。连朝困登陟，兹夕遂偃仰。飞泉树杪来，一泻落百丈。彻耳鸣琤琫，颇使心神爽。荒戍缠薜萝，孤卒友魍魉。喜无钲鼓音，乱此环佩响。夜静人语稀，沙岸自来往。流云渐欲破，山月微微上。两月纓上尘，浩歌濯漾漾。

此时的纪晓岚还不是日后任《四库全书》



太平镇真君殿

总纂、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纪晓岚。此时的他到福州赴任福建提督学政，正处于仕宦生涯半途。他从福建北大门浦城出发，顺着南浦溪、建溪、闽江一路顺流通往福州。这首诗是他在闽北所作三首五言古风之一，也是最后一首。毕竟“两月纓上尘，浩歌濯滌滌”，旅程已经胜利在望了。

纪晓岚宿在蛟坑，自然不是为了欣赏蛟龙。盖因蛟坑有水兵驻扎护卫，能够保证安全，只是环境过于幽静，也只能“孤卒友魍魉”了。

匆匆就是百年。纪晓岚走了，再也没有来过。水口电站建起来之后，原蛟坑村被淹没，新的蛟坑村建起，原先的戍所也不见踪迹。

这首诗却没有被人忘记，至今还镌刻成碑，置于蛟坑村一处宋明的古建筑里。这座古建筑也越过了重重劫难，依然屹立江边，见证着岁月变迁。这便是奉祀道教神仙许逊的太平镇真君殿，因建筑精美、岁月久远，人称闽江第一殿。

许逊何许人也？即传说在蛟坑斩杀恶蛟的神仙。此外，他还有一个重要身份——道教闾山派鼻祖。

闾山派是源于闽越地区的一种原始宗教，后来纳入道教体系。按其宗教神话所述，闽江广阔无边，江底下有座山，叫闾山，凡人看不见，唯独通闾山正法，道行高深和有道缘之人才能看到。闽人遇到水灾病魔、妖魔鬼怪，对付不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奔上闾山，学会一身的本领。闾山的创始人和法主正是这位许真君，他会在这里接待内心纯良的人，教给他们本领。

闾山派天威法坛《开坛科》曰：

闾山原在江中心，要开之前三年春；
三千年满开一度，有人得见闽江清；自古有缘相会遇，
闾山开时救万民；天威法坛传角韵，祇迎圣驾降来临。

多么浪漫，多么富于想象力的民间信俗！

纪晓岚夜宿蛟坑时，是否拜访了真君殿？驻足江畔时，又是否透过重重波涛，望见了传说中的闾山呢？虽然他在诗句里对许逊和闾山派只字未提，但别忘了，他是写有狐鬼神怪故事集《阅微草堂笔记》的纪晓岚，饱学之士以外，他也有另一面，甚至多面。

真君殿奉祀着许真君，其是闾山的法主。真君殿里是否藏着通往闾山的神秘通道呢？

走入坐东朝西的大殿，中轴线上依次排列山

门、戏台、大殿，两侧有钟鼓楼和二层回廊，四周土墙，穿斗式木藻井构件上雕有人物、龙凤瑞兽，雕工精致。

闽江沿岸的古戏台大多因为水文变化沉入水底。真君殿后的古戏台是硕果仅存的几个之一。边廊墙上写满了文字：落款日期从雍正、乾隆到咸丰、同治、光绪，跨越百余年；戏班的来路与名号有剧头庆福班、福省聚兴班、洋里合顺班等。

正感叹墨迹比人事更久远，转眼瞥见戏台柱上镌有一联：“方寸地纵横万里，瞬息间上下千年。”

诚哉斯言。

立定真君殿里，看闽江滔滔南去。以閩山派为联系，太平镇的闽江第一殿与福州南台岛的龙潭角，许逊真君信仰与临水夫人陈靖姑信仰，闽江的一头一尾遥遥相对。更何况，这位福州地区最有影响的民间神灵，在传说中，正是在閩山学法于许真君。

3

是时候说说太平镇，这个被闽江贯穿的镇子了。

太平镇位于南平市延平区东南部，古称太平里三寨，开基于唐末宋初，开迹为蔡氏、肖氏。明朝郑汝惠迁入太平，始有郑氏宗族。明末崇祯年间，杨氏迁入太平。郑、杨成为太平大姓。太平镇横跨闽江东西两岸，闽江流经太平镇全镇。



真君殿戏台藻井



咸丰年间的戏本

太平有 8 个库区村（社区），是福建水口水电站库区重点乡镇。

太平镇的历史很丰厚，太平镇的现在更精彩。我在太平则有以下亲历。

太平鱼宴。

太平镇是个天然的库湾，鱼多且肥美。延平有句顺口溜：“来延平，去太平！去太平，吃鱼

宴！”太平镇的淡水鱼不仅鲜嫩肥美，而且美食做法花样繁多，清蒸白刀、醉虾、太平燕最具特色。太平镇库区的白刀鲜嫩肥大，远胜别处，用特制的细长盘子盛上一整条，清香扑鼻。太平镇刘家寨有一种长在水田里的小虾，捕回家后装入小钵，以黄酒泡上一两天，便可生吃。红色醉虾透明如霞，引人垂涎。太平镇临近福州，太平燕就是典型福州文化影响下的产物。这道菜将鸭蛋与肉燕、香菇、胡萝卜、花菜等应季食材同煮，主菜“鸭卵”在福州话中谐音“压乱”之意，以得太平。在太平吃太平燕，逢佳节年庆，更有“无燕不成宴，无燕不成年”的说法。

太平镇有两条龙。

一是板凳龙。板凳龙的民俗在闽浙赣一带均有，我也见过不少，唯独太平镇的板凳龙令我印象最深刻。我想缘由大概是太平人格外好客。太平的风俗是元宵家家户户都要邀请客人，客人越多，新的一年就越兴旺。元宵节这天，小小的镇子客似云来，人声鼎沸，一条由几百条板凳组成的长龙在镇上穿街而过，直到深夜。长龙所到之处，四周抛掷出无数的鞭炮，队伍需要从爆竹中穿过，惊险刺激。

太平为何富裕？和另一条龙有关系：做龙。做龙意指做游乐产业。20世纪80年代延平区农民廖连生创意大开，在外搭建经营大型游乐设施“龙阁迷宫”，新颖前卫的造型和玩法，一时风靡。很快，延平区樟湖、巨口、太平等3个毗邻乡镇的农民纷纷结伴集资到北京、上海、南京等

大城市的公园，仿效“做龙”。做龙成了太平镇特有的致富产业，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回流，使得镇上建起了鳞次栉比的漂亮别墅。

美丽的灰被天目，神秘的闽山派，奔腾的闽江，古朴的戏台，诱人的太平鱼宴，全国游乐产业的“龙头”，还有不及下笔的许多……很难想象，如此多元素能被同时安置在一个小小的镇子里。这就是太平镇的魅力，但它的魅力远不止于此。

为什么是太平？

因为闽江，金砂驿（茶洋驿）成为宋元以来交通线上的重要驿站，闽江上游的其他窑口，或者不同窑系各样品种瓷器的流通出海多在此经过或停歇。茶洋窑可凭借自身胎釉原料，仿烧建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吉州窑等多个窑口的陶瓷产品，取各窑口之长。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便利的水运交通，让茶洋窑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还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大量销往国外市场，其制瓷技艺也随之传播至世界各国。

因为闽江，蛟坑真君殿里回响着闽山派的神秘传说，闽北山里的许真君和福州海边的陈靖姑同出一源；因为闽江，太平镇成为重要的库区镇，出产数量庞大、味道鲜美的河鲜；因为闽江，太平镇的农民得风气之先，足迹遍及五湖四海，奔赴全国各地经营室外游乐场等，掘得了第一桶金。因为闽江……毫无疑问，贯穿全境的闽江塑造了太平镇和太平人敢打敢拼、通江达海的气质。

天开灵境留仙住

管柏华

1

琯头如金刚力士雄镇闽江口北岸，东望马祖，西携亭江、闽安为后援，南眺琅岐、潭头，挟川石、粗芦、壶江拱卫海滨，恍若闽都之首领。据《榕城考古略》称，琯头原属闽县合北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为闽侯县所辖，后划入连江县。琯头镇在改革开放之后，曾议及划入福州市区未果。

按照《说文解字》，琯头的“琯”与“管”字通假。文献上说，“因旧时所辖地域地形似乐器‘琯’而得名，又称琯江。”另有人说，“琯头”有管领闽江之头的含义。据《福州百科全书》称，沿海的设馆，有福州琉球馆、长乐的盐馆。琯头的商馆与福州琉球馆均为海上交通与贸易机构，主要用以接待宾客和各类行商。由馆而易为琯，可能属地名的雅化。

琯头西、北、东岗峦环抱，临琯江的南面有长12里、宽6里的琯江平原，所谓的“孟溪环绕



近沧州”，盖孟溪发源于汤岭山脉，著名的百洞山是它的余脉，山脉入海则为粗芦、川石、壶江等岛屿。相传秦始皇曾谓粗芦岛：“此岛主东南王气”，令凿山馮水涯，得芦根数丈，昼砍夜合，断之有血，故又称荻芦峡。当地有句俗语“海涛狂似虎，不到芦花洲”，故1800年后，郑和七下西洋都在福斗港誓师出航。上万将士饮上官井水，拈香设誓拜南海神坛。一些学者认为郑和船队于1421年到达过此地，并曾绘图进呈永乐皇帝。哥伦布等欧洲航海家都承认拥有郑和的地图。郑和船队中有许多粗芦岛人，领头叫唐计。据族谱记载：“嗣从郑和下西洋，功著青史，（瑄头）唐氏之族于是始基矣。”

距三宝太监下西洋越百数十年，有事关青芝山开山之祖董应举。郭柏苍《竹间十日话》载：瑄头塘头村人董应举有祖遗之田数亩，与两广总督陈瑞儿子陈长祚之田相连，陈长祚三番五次要买董应举的田，都遭拒。陈长祚于是想陷害董应举。恰在此时，陈长祚的同年之子来闽督学，陈长祚买通了他，准备诬陷董应举。督学手下一

官，可怜董应举，悄悄对他说：“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何必为了几亩地，害了自己的性命呢！以你才华，还怕将来没有良田？据说陈家出钱二百金，也不算抢夺啊！凡事要三思而后行啊！”董应举接受了这位好心人的劝告，心里却是十二万分不甘愿，他把二百金拿回，途经台江万寿桥，将金子全部投入大桥下水中，并发誓报仇。董应举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中进士，后官至工部侍郎。陈长祚之子，在乡里干了许多违法之事，董应举收集了他的许多罪状，寄给福建巡抚李凌云。此事被陈长祚得知，他马上托叶向高调停，将女儿嫁给董应举的儿子，两家结为秦晋之好，董家土地以嫁妆的名义完璧归赵。后人将董应举大桥头掷金处称为“掷金潭”。

记录台湾少数民族习俗的《东番记》作者陈第，是戚继光爱将，也曾是董应举的挚友，两人经常在百洞山青芝寺谈古论今，有时语言针锋相对，被人号为“骂友”。陈第死时，董应举写祭文：“交游天下无两知己，一斋自信平生没有第二个骂友，想听骂声已不可能了。”



粗芦岛

琯头码头俗称“海关道”，故“琯头”也有“关口”之含义。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朝廷在福州设海关，1880年在琯头设分关（后改支关），此时，琯头港已是福州海关监管区。《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为还巨额债务，把洋关周围50里划给洋关管辖，从此琯头分关与东岱分卡均由洋关兼管，税率一律值百抽五。

晚清川石岛狮头山上曾矗立一座雄伟的大东电报局大楼，靠着海底电缆与台湾联系，这电缆是中国人自行铺设的第一条水下通信线路。此线连接台湾淡水与川石岛，长117海里。当时电缆运到台湾后，用“飞捷”号炮舰作为水线船开工铺设，工程耗大洋22万。依靠电缆，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和继任向朝廷报告台湾的财经、治安、天灾等状况。《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被割让，海底电缆归日本管辖。中国人历经斗争无效，最后于1931年5月1日砍断川石岛一端的线头。上海世博会期间，海底电缆作为文物也曾在福建馆展出。

琯头地区，古时未有行政机构，乡事由乡老、族长自理。自南宋以降，长门口常驻防军，明末始设五虎巡检司，为军政合一单位，清沿其制，归福宁总兵管辖。道光末年，海防警讯频频，特在长门设提督衙门，驻军万人。1927年国



川石岛

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设闽厦要塞司令部。

琯头的行政机构始设于1927年，为连江县十七行政区之一。1935年，琯头设联保处，由城关区署管辖。1939年改称乡镇公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琯头属第三区。1958年改琯头人民公社。1984年后为琯头镇人民政府。

琯头人生性敢于先尝先试。琯头电光厂创办于民国三年（1914），由鱼牙老板倪圣武独资建设，街市灿烂辉煌，后因偷电成风，入不敷出，停办。倪圣武后邀福州“电光五”刘崇伦投资，又聘会城内白水井人郑子新律师为经理，工厂始兴。然严霜偏打独根草，收费员林依二挪用公款吞金箔自杀；电厂会计长衫卷入轮机，不幸碾毙，电厂再告歇业。最后由琯头商界大佬集资在旧大道大桥“于山李”当店内，再行设厂。1941年，日军占领福州时，工厂内迁三元镇（今三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琯头人林依犁、

倪易等人再次建厂。

电厂创办后，信息灵通的商人，购进外国新发明的碾米机。首先经营机器碾米的是泉州人林万源，厂址设在新道街。继起者有林森茂、董太成、合和泰、新祥兴、裕丰福、董伯津、德昌等碾米厂。在江墘，当地人称为“门边厂”的木材加工厂，厂主初为陈番仔，后为陈依妹。

瑄头酿造酱油已有数百年。早在清代，亨利、协和、辰记、同化等家均用“瑄头法”酿造工艺。民国酿造泰斗陈陶声教授曾亲来瑄头考察，命名为“福建瑄头法”，并载入他编著的《高等酿造学》。瑄头法酱油所用原料非常讲究，生产酱油要经十道工序，制酱油膏还要增加一道。特点在于晒炼过程，将底油澄清后经一两个月的晒炼，抽出渗入稍高一等的油膏中，反复五次，直至最高等的油膏，一般要一整年时间。采用该工艺酿造的酱油和酱油膏，色泽红润呈红褐色，澄清无沉淀物，味醇柔和，鲜而带甜，颇合江南人和闽人口味。经该酱油烹调的菜肴色香味俱佳。

瑄头是鱼米之乡，青芝山下5000亩的稻田均为高产田，而三分之二的村庄滨江靠海，占尽渔港之利。龙沙熨斗岛的鲷刺是惊世的美味，东岸与五虎礁的石蚝，终年不竭；壶江、川石的金鲟是海产的“活体人参”，而酷似旧时男童鼻下悬着的“黄鼻涕”（黄蛎）更是人间的至味。传说当年朱元璋亲率舟师进攻福州，从乌猪港过东岸门时，因抓痒丢下头皮癞疤，从此东岸才出现了黄蛎。

梁武帝《白紵行》有“飞瑄促弦舞少年”之句，用来赞誉瑄头商业发达，殊为贴切。瑄头向来是连罗宁人的进省必由之路，又是“下路南兄”泉漳人和“北仔”温、台、青、登诸州商人来闽之路，尤其是南港淤塞，北港成为主航道后，市井更加繁荣。在民国初期就有商家四五百号，而沿江一线更有旧道、新道、游贤道等码头。而今进入21世纪，码头更有15座之多。1989年，一台湾基隆渔轮触礁，在即将倾覆时被瑄头“东升”渔轮所救。台轮船长在答谢宴上说：“瑄头港胜过家乡的港。”

明宣德年间，瑄头上街沿山一带已有小集市出现。五口通商后，闽南、长乐人在瑄经营的大商行增多，货物上下水都要劳力起卸，这些干体力活的，统称“甲哥”。清咸丰、同治年间，甲哥组成“甲会”，瑄头有三个不统属的甲会，即旧道甲、新道甲和拱屿甲。1947年下半年，物价飞涨，甲哥们要求余丰福大米行涨薪，结果引起械斗，余丰福米行被捣毁。后诉诸公堂，甲哥好勇斗狠但讲理非所长，便请来乡绅倪铁生帮忙。倪铁生原来常和甲头推杯换盏，不顾与米行老板尚是姻亲至好，又同是“新道派”，反而出面替甲哥打赢了官司，获得了盛誉。

2

旧时，福州的大中学生春游、秋游，学校包租木船“麻伞”（福船的一种），“车船”顺闽

江游青芝百洞山必是首选。青芝山有三件宝，百年灵芝王、楠木释迦牟尼、汉白玉佛。相传在未建寺前，一老僧进山采药，见两松鼠追逐一物，拾起来却是灵芝草，以此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往往药到病除。遂以化缘所得，修建了青芝寺。民国时国府主席林森在此隐居6年。九世班禅敬献的汉白玉

佛就供奉在山中的东觉岩石室内。青芝山有108景，以岩洞怪石称奇，著名的有一湖、二室、三台、四泉、五峰、十洞、三十九石、四十四岩，堪称移步换景。

青芝洞穴最为奇特，为嶙峋奇崛的花岗岩。最有名的蝙蝠洞绵延曲折，可从山下通向山顶。稗官野史上说，明朝时，洞内外蝙蝠叠云压山。相传，明末叶向高、董应举、李九我三人某日傍晚游洞，入之愈深愈觉阴森可怖，正要返身出洞，洞里传来仙道语“三人两宰相”，大家顿觉诧异，董应举回首洞外，洞里又发幽冥语：“回头一侍郎。”后来叶向高、李九我均官至宰辅，而董应举则官拜工部侍郎。蝙蝠洞在山顶洞口，可观琯江全景，闽江口五虎礁、马祖列岛亦可遥望。

旧时，福州台江街头有个疯子，身边常跟随一群小儿，他常常唾沫飞溅道：“我是缺嘴将军啊！”“缺嘴将军”在方言俚语里是很厉害的



五虎礁

意思。其实，缺嘴将军是琯头长门炮台的一尊岸炮，因这门大炮击中法军旗舰“伏尔他”号，致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受伤后在澎湖毙命，故被朝廷封为缺嘴将军，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当地人为其披红挂彩。

闽江口两岸长门与金牌两山对峙，江门仅380多米。五虎礁雄踞口外把门，双龟岛俯伏守户。五礁排列如虎，不生一草，远望色白。民国初年日本外务省编的《福建事情》中称：“川石岛到马尾的闽江两岸，风光优美，外国人称之为‘莱茵河岸’。”

粗芦岛是连江最大岛，又称荻芦岛、熨斗岛，传说山上有九龙落于此处，为东南龙脉所在位置。明将汤和曾在此登岛，进军福州。郑成功、张煌言反清复明时也曾在此塘下黄霞山建过水寨和炮台。如今的粗芦岛已是蔚为壮观，马尾造船厂新厂和福建省渔业基地已在此扎下营盘。



“二七”烈士林开庚纪念碑亭

3

琯头先有“香港客”“台湾客”“南洋客”聚集之称谓，后又被誉为“中国旅美侨胞第一镇”。该镇人口仅6万，而单是留美华侨华人就有11万，在美国纽约的20万福州人中，就有一半是琯头人，所以琯头话才是纽约中国城通用的语言呢！

琯头华侨大部分于20世纪80年代旅美。纽约的琯侨经多年拼搏，许多已从开餐馆晋升本公司，甚至涉足于房地产和金融业，他们的儿孙辈很多都进入美国的名牌大学。琯头华侨华人的特点是社团多、侨领多。单是连江二中旅美校友会就有几千人，从1972届到1990届，每届都成立了校友会。他们赚钱后热心慈善。旅美华侨廖祺通在下塘村小学独资捐建祺通学楼和下塘礼堂。林碧容在竹岐村捐建“时高学楼”。陈友敏在琯头青芝中学捐建综合楼。倪秋官捐建全县最

大的幼儿园——青芝幼儿园。黄岩海则在琯头街道独资建“岩海门诊大楼”。印尼华侨张锵官在青芝景区捐建“观光亭”“鳌湖曲桥”等。琯头美东同乡会则集资兴建“‘二七’烈士林开庚纪念亭”“林开庚烈士纪念碑”。琯头的许多道路、桥梁，以及自来水工程都有华侨急公好义的影子。据不完全统计，琯头华侨华人的善款累计达7876万元。

琯头释道庙观接宇连天，神诞游行是四乡八里最热闹的；洋教堂豪华气派，有的妇女虔诚怀抱《圣经》。民国时琯头各庙宇香火鼎盛，三官堂演戏时煤油起火，曾烧死观众200多人。闽剧界有俚语称“赶去琯头看戏”（讨死），民间打油诗道：“戏定仕梅班，头出拜天官，二出演走番，三出演和尚去尼姑庵，喊声火烧厝，戏班死十三，乡里死堆山。”

侨乡的欧式独栋民居星罗棋布美轮美奂，但却是空巢居多。大量的外来人在琯头聚集，琯头正像10里外的闽安镇和南岸的琴江村一样，南腔北调九家十一姓续写着数百年来故事。琯头人满世界挣钱，外省人在琯头赚钱，只要看看满街的川菜馆、东北菜馆和蜻蜓一样飞动的“拉拉车”、三轮车就知道了。

琯头的城市化正在进行时，天赋异禀且占地65平方千米，比当年的省会还要大。有人问，无诸、郭璞等人当年何以不在此建冶城？但此一时彼一时，存在即合理，今天的琯头已为福州狂飙突进的国际化预留下了最美的空间：山与海。

南通不再“难通”

叶 润

1

回首乱山横，不见居人只见城。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

——苏轼《南乡子·送述古》

古代大文豪苏轼为好友陈襄（字述古）写过多首类似的送别诗，无不情意缱绻，难舍难离，甚至声泪俱下。古代交通落后，山陬海隅，险巉万状，一经离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怎能不生发“生离”的悲苦和感慨？

苏轼与陈襄的忘年之交，在“路途艰难”的岁月留下的浓墨重彩，至今都未曾被世人淡忘。

陈襄虽不如苏轼般妇孺皆知，但文名和官名相得益彰，与陈烈、周希孟、郑穆并誉为“海滨四先生”。唐末，其先祖从河南光州固始随王潮入闽，居于今闽侯南通镇古灵乡。陈襄自幼拜老儒为师，及长，就学福州。20多岁便进士及第，年少英发，前途一片光明。可惜也是可幸，他天生自带反骨、不够圆滑，看不惯官场上的阿谀奉承、尔虞我诈，从不愿违心行事。初任浦城县主簿，代理县令时，得知此地豪门势力只手遮天，挟制官府而妄为，便果断地与权贵之门撇清关系，拒接见、拒收贿赂。断案时，命数名小吏环立案前，使“私谒不得发，老奸束手”，杜绝搞小动作，滋生腐败。一时，百姓称颂，而权势之士



恨之入骨。

后来，陈襄屡次入京为官，外任孟州（今河南孟县）、彭州（今四川彭县）、常州、开封等地，不断辗转，建学舍、劝就学，开垦示范田，教植水稻，开渠引水，兴修水利，从教育到民生，无不尽心竭力，收获了一众民心，也招惹了更多宵小之徒的嫉恨。

神宗立，陈襄奉命出使辽国。岂料，辽国设小座招待陈襄，陈襄以礼争之，不肯就座。辽人反上奏朝廷污蔑之，陈襄因此获罪，被贬至明州（今宁波）。仕途的波动并没有让陈襄收敛傲骨，反倒如一株寒梅盛开得更为肆意、洒脱。即使多年后凭着才干和政绩再被召回京，任尚书、刑部郎中，修起居注，知谏院，却因不满王安石的“青苗法”，五次上疏请求罢免王安石、吕惠卿等人。神宗不从，但器重陈襄文才，召试知制诰。陈襄以言不见听，辞不应试。后便又被下放到地方应职，直至熙宁九年（1076），才又被召入京，为枢密院直学士，知通进银台司，提举进奏院。

陈襄一生四处为官，漂泊不定，在故乡待的时间少之又少。熙宁元年（1068），陈襄曾回福州，与郡守程师孟游越山、昇山、乌石山宿猿洞诸名胜，并在乌石山平远台、鼓山灵源洞留有题名石刻。至于是否曾回到闽侯南通镇，却少见记载。各种原因无法揣测，但是当时南通镇处于水陆难通的状态，或许也是一种因素。

那个年代，不仅是穷乡僻壤的南通，即使杭州这种大城市交通亦极其困难。陈襄与苏轼便初

识于杭州。熙宁五年（1072），苏轼出任杭州通判，陈襄正好任杭州太守，为苏轼的顶头上司。陈襄虽年长苏轼20岁，但两人共事期间，性情相投，政见相合，结为莫逆之交。

熙宁六年（1073），苏轼以杭州通判兼转运使的身份前往常州、润州、秀州、苏州等地赈灾。路途漫漫，他难掩对好友的思念，便写下一首《卜算子·感旧》怀念两人相聚的美好时光：“还与去年人，共藉西湖草。”待其第二年春天返回杭州，与陈襄只短短相处不到4个月，陈襄便任期已满，不得不离开杭州，奔赴南都（今河南商丘）任职。苏轼在有美堂为之设宴饯别，觥筹交错，离别之情弥漫，一首《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油然而发。情愈真，别愈难，宴席散罢，苏轼红着眼圈，又拉着陈襄在孤山竹阁再次饯行，一首《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漫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让陈襄也忍不住心口发酸。

苏轼一路陪伴陈襄至杭州城东北的临平，眼见陈襄身影渐行渐远，隐于乱山之中，苏轼悲从中来，文章开篇提到的那首《南乡子·送述古》便跨越时空，流传至今，“今夜残灯斜照处，荧荧，秋雨晴时泪不晴”。

如今，行走于南通镇的街巷，不同时代，不同地点，但是秋雨飘洒、绿荫如烟之时，便忍不住想起苏轼的眼泪，想起他与南通之子陈襄的友谊。

2

其实，旧时南通便有“难通”之说。群山环抱之地，又有乌龙江、大樟溪隔断，山路、水路皆艰险难行。历史上两场血战曾发生于此，地理位置的优劣难免左右了战事的胜败。

南宋末年，被元军一路追击的宋兵在水流湍急的乌龙江过渡时，延误时机，在南通瓜山被元军围截。陈文龙率宋军浴血奋战，一路护送在福州即位的皇帝赵昺冲出重围，但是秀王赵与檠和其余残部全部阵亡于瓜山，一时间漫山血污，仿若人间炼狱。如今，南通瓜山的百姓，每年五月，都要举行祭奠仪式，告慰亡灵。

1926年，南通瓜山又迎来一场鏖战。在福建的最后一支北洋军团1万多人由漳州北上，欲进占福州。因乌龙江、大樟溪阻隔，被北伐军围困

于瓜山。经过几天激战，北洋军团最终惨败。

瓜山因有三道山峦分道延伸而下，形如“瓜”字，故名瓜山。瓜山村便得名于瓜山。说起瓜山村，不得不提“郑公义渡”。郑公名为郑潜，元朝至正年间任福建监察御史，退休赋闲于瓜山村。当时，南港及瓜山一带乡民进省城必须渡乌龙江。乌龙江江面宽阔浩荡，江风雄劲，常有渡舟倾覆。为方便乡亲出行，郑潜在泽苗、新岐至阳岐间设立渡口，摆渡过往行人。当地人称为“郑公义渡”，并在白苗、仙岐、阳岐等处竖立“郑公渡”碑以纪念。

当然，这些小渡口、小船只，摆渡零散的村民尚可，遇到战事，成千上万的将士汹涌而来，便于事无补，难以发挥作用。很长一段时间，南通依然“难通”，穷乡僻壤，无人问津。

直到新时代来临，以现代科技开山跨水，修桥搭路，南通才焕发出新的生机。乌龙江湾边大

桥、大樟溪南港大桥以及水陆码头相继建成，南通犹如“任督”二脉被打通，原来堵塞的地方一旦顺畅起来，便势不可当。原先最薄弱的劣势，长出铠甲和鲜花，竟然成为优势和特色。物流企业看准了南通的机遇，蜂拥而来。海峡农副产品批发物流中心、东南国际建材城物流项目、永辉物流仓储中



瓜山村



湾边大桥

心、新加坡普洛斯物流项目和华威菜多多物流项目等相继落户，蓬勃发展。此外，还有天泽·奥特莱斯大型购物广场、滨江商务区、休闲旅游区、主题街区、文创乐园、运动基地、知名房企等加入，南通破茧成蝶，完成了华丽蜕变。

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3

南通从默默无闻，到逐渐被世人重视，深藏于其中的文脉底蕴，经过弥久岁月的发酵，重新散发出芬芳。南通镇文山村多产芒草，故原名“芒山”，山之阴有“芒山书院”。据传先贤林则徐、郭柏荫、陈若霖等曾就读于此。后因林则徐、郭柏荫、陈若霖等官至朝廷大臣，声名显赫，才改名为“文山书院”。

文山书院位于文山村弥勒山半山腰，坐西

朝东，为院落式木制平房。入门为天井，中为四扇三间小厅，前后二进，两边为厢房。大厅和厢房的古式窗棂花纹精致、古雅，颇有韵味。书院四周为风火土墙，院后山峦起伏，前有溪流淙淙，可谓清静修身之处。可惜，今已改为民房，成了另一番柴米油盐的“世俗人间”。

幸好，那些久远的故事未被遗忘，每每提起，依然鲜活、灵动，充满逸趣。据说，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

与文山村的陈纲石有谊亲。林则徐幼时，便寄居于陈纲石家，就读于文山书院。林则徐自小便勤勉好学，经常端坐于溪边潭石上背诵诗文，琅琅读书声配着溪水轻流，一幅少年勤学图悠然天成，路过的乡人无不交口称赞。一日，天色已晚，陈纲石见林则徐迟迟未归，难免焦急，便一路前往文山书院寻找。书院寂静无声，唯有一盏烛火独自摇曳，微弱烛光下林则徐正在低头读书。陈纲石不禁莞尔，连声召唤其名。哪知林则徐沉浸书海，毫无反应。陈纲石只得近前拍其肩膀，林则徐方才惊讶地回过神来。陈纲石询问：“天已昏，何勤学乃尔？”林则徐慨然答道：“读书志在报国，能不勤耶！”小小年纪便志向高远，富有家国情怀，令人惊叹。林则徐最后成长为虎门销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民族英雄，似乎在文山村那个平凡的夜晚就已种下了因缘。如今陈纲石老宅前林则徐亲手

栽种的铁树依然健在，苍劲、茂盛地享受着阳光、雨露，追思着先人爱国、廉明、正直、无私的一生。

几年前，来自北京的郭久骧夫妇在福州到处寻觅先辈郭柏荫的足迹。郭柏荫，侯官县人，清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历任江苏按察使、江苏布政使、广西巡抚、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任内曾力主严禁鸦片；奏请减少苏、松、泰三地税收，缓征各县漕粮，以纾民困；整顿治安、兴修水利，政绩甚著。

郭久骧夫妇为丰富郭柏荫在族谱中的事迹，教传后代，辗转来到郭柏荫的故乡。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他们了解到郭柏荫曾就读文山书院。可惜，文山书院已改建成民居，未能找到有价值的信息。不过据传，陈纲石60大寿时，林则徐正在京城为官，特意千里迢迢遥寄8面寿屏祝贺，其中便有郭柏荫的题字。郭久骧夫妇怀着期待，又前往陈纲石的老宅。然而再次事与愿违，老宅的居民回忆道：原来老宅内确实悬挂着16面屏风，其中便包括那8面寿屏，可惜因洪水等灾害，最后只剩下4面，且上面的红底金字也已经磨损，难以辨认。

“虽然未能寻找到先辈的字迹，觉得有点遗憾，但看到这些文化实物，我觉得能够保存下来非常不容易，一定要做好这些文物的保护，这样



文山古窑遗址

对教育后代、了解先辈历史有非常大的帮助。”看着屏风上斑驳的裂痕，郭久骧夫妇感叹道。

文山村除了文山书院，还有文山窑也值得一提。1346年，文山陈氏始祖陈益振（南宋名臣陈文龙的后代）为躲避朝廷迫害，带着家人从莆田迁徙至文山村。文山村盛产芒草，有着非常适合做砖瓦的黏土。陈氏先人们便就地取材，在美丽的乌龙江畔建起十几座顶部酷似毡帽的砖窑和上百个密集排列的手工作坊，形成200多亩的砖窑场。文山窑砖因精美、耐用而广受赞誉。三坊七巷重修时，发现了许多印有“三坊七巷文山窑”字样的砖块，原来文山村还与三坊七巷有着如此千丝万缕的联系。

文山窑砖除了供应福州本土外，还通过日渐发展起的水路，运往国内各地乃至东南亚一带。南通镇因水而隔，变成了因水而通，甚至成为生



十八重溪

产福船的重要基地。南通镇方庄村的福船制造技艺被评为第四批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平如衡，下侧如刀，贵其可以破浪而行”的福船又把八闽大地的瓷器、丝绸和茶叶，运销往海外，江海相通，不断延展。

明朝时，方庄村的方家由河南迁居于此，世代以造船营业，技艺精湛。先后为日本建造过“七洋”号、“泰期”号仿古木帆船；为新加坡建造过“郑和将军”号仿古游船；为韩国建造过“新安”号仿元代木帆船；为大连市建造过“大福龙”和“大福凤”钢包木仿古游船以及至今为止世界最大的仿明代“郑和”宝船。

如今，木帆船的时代已经淡去，钢铁水泥的现代化船业正在蓬勃发展。时代在转型，南通镇也为寻求新的出路而“转身”。一次次转身，都

离不开栖身的山水。

依托十八重溪的丰富水脉，周边的金鱼养殖场开始兴起。大大小小的鱼池里，红、橙、紫、蓝、墨、银白、五花等各色金鱼，摆尾游弋，吸引了络绎不绝的爱鱼人士。人气旺了，鱼缸、盆景等商机也被带动起来。

十八重溪，作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如丝带般环绕着南通，溪流两岸生长着茂密的阔叶林、灌木林，西溪瀑布、鸳鸯洞、流纹岩、龙潭、大帽山、宝塔峰等每一重都有每一重的景致。在这里，可漫步于浓荫石道，可结伴野餐烧烤，可溪水捞鱼，可竹筏漂流，尽享山水之乐。

微雨阵起之时，再没有古时苏轼与陈襄那般的离愁别绪，山水不再是阻隔，南通不再“难通”。

八尺薯藤，一念众生

柏 荣

自 13 世纪开始，世界各地陆续进入小冰河期，于 17 世纪达到巅峰。小冰河期导致地球气温大幅下降，粮食减产，社会动荡，人口锐减。小冰河期发生灾变之时，是中国的明中期到清中期。这也是中国社会经历的第四次小冰河期，其时就连广东和海南冬季都狂降暴雪，而安徽、江西等地甚至有盛夏飘雪的记载。极度酷寒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粮食大幅减产。因为除了严寒，还有持续干旱，而在旱灾之后，接踵而至的便是蝗灾和鼠疫。前三次小冰河期的到来，都让中国人口锐减超过五分之四。比如东汉末，汉族人口 6000 万，几十年灾荒和大战乱后，到西晋一统时，人口仅余 770 万。唐末，汉族人口也是 6000 万，到北宋初年仅剩下 2000 万。但明末清初虽也经历

了灾荒和多年战乱，全国人口只减少了一半，尚达 5000 多万。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从海外传入的红薯、土豆、玉米等抗旱高产作物的推广种植，正是它们拯救了大批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灾民。

首次将红薯引进中国的是福建长乐海商陈振龙。但这绝不是一次平平常常的贸易活动，其所冒风险甚至可比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以生命代



长乐鹤上陈振龙故居

价盗火给人类。

正值暮春时节，风和日丽，天朗气清，我来到长乐鹤上青桥村瞻仰陈振龙故居。步入村庄，只见一座普普通通的农家宅院，正静静地沐浴在春天和煦的阳光下，散发着花草的芳香。如果不是故居里展列的图片和文字介绍，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这素朴的泥瓦土墙里竟藏着一个个感天动地的故事。

陈振龙生于嘉靖年间，自幼刻苦课读，20岁时即考中秀才，但乡试屡次不获，于是弃儒经商。此时正值隆庆元年（1567），朝廷解除了自洪武年间颁布的延续近200年的禁海令，海门一开，百业兴盛，海上贸易日渐活跃。陈振龙也随长乐商帮到了菲律宾吕宋岛。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红薯。红薯原产于南美洲，最初是作为船上的压舱物被西班牙人带到菲律宾的。由于这种作物不仅生吃煮熟吃都可以，而且生产期短、产量高，即使是在沙土地上也能种植，还特别抗干旱，很快就成为吕宋当地人的重要食物。他立刻想到家乡的境况：气候干旱，土地贫瘠，粮食产量很低，常年闹饥荒。于是有了将红薯引种家乡，造福乡梓的想法。一得空，陈振龙就冒着烈日走进吕宋岛的乡间地头，向当地农民详细了解红薯的种植和储存方法。

但让陈振龙发愁的是如何才能将薯种安全地带到自己家乡。当时菲律宾处于西班牙殖民统治之下，对从南美洲引进的红薯管控非常严格，不容许一根薯藤被带出境。为此，陈振龙想了很多

办法。第一次，他将红薯混装进其他货物里，被海关查出，受到处罚。第二次，他将薯藤编进箩筐，又被查出，还险获牢狱之灾。但陈振龙不气馁，他在码头不住转悠，发现不少渔船船帮上都绑有粗大的竹筒，顿时有了办法，以重金买通一家船主，而后将八尺薯藤秘密装进系于船帮上漂浮的竹筒里。万历二十一年（1593）春天，陈振龙终于成功地将薯藤经漳州月港带回长乐。

而从第一眼看到红薯，到将薯藤安全带回故乡，其间整整用了25年光阴，陈振龙也从满头青丝的年轻人变成一位皤然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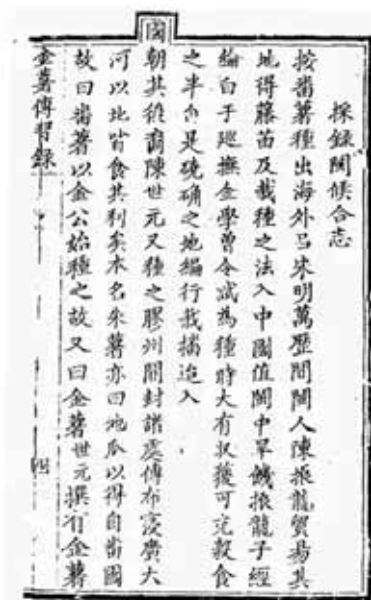
回到家乡后，陈振龙开始在自家地里试种红薯，当年就获得丰收。欣喜之下，陈振龙吩咐儿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希望能借官府之力，推广种植红薯，以缓解闽人缺粮之虞。陈经纶向金学曾报告了陈振龙从吕宋引回薯藤的经过，列举番薯的种种优点和种植方法，说红薯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建议广种，以解粮荒。金学曾对此十分重视，“即觅地试栽。俟收成之日，果有成效”，遂决定在全省推广种植。万历二十二年（1594）漳州等地出现严重干旱，金学曾下文要求闽南各县广种红薯救灾，并让陈经纶携带薯种前往闽南，教当地农民如何种植。4个月后红薯丰收，旱饥得解，百姓欢愉。金学曾还在陈经纶提供的《种薯传授法则》的基础上，写了一本《海外新传》，书中对红薯的传播路径、生长习性、种植要求都做了详细记载。这也是中国第一部薯类种植专著。明朝首辅叶向高认为“此

乃金公大造之功”。当时福建人感激金学曾，将这种原名“朱薯”的作物称为“金薯”。因为是从海外引进的，后人则普遍叫“番薯”。金学曾也因此被尊为“番薯公”。

这之后，陈经纶、陈邦弼、陈以柱、陈世元以及陈云、陈燮、陈树，陈家六代人，将番薯的推广种植如同接力般一代代传下去。陈经纶的儿子陈邦弼经商往来于江西和浙江，见江西丘陵地带干旱少雨，不适水稻，当地百姓常食不果腹。于是他与儿子陈以柱极力劝说农民种植番薯，并亲力亲为，觅地做出示范。很快，番薯种植就在长江流域推广开来。陈以柱还大胆地选择在安徽的盐碱地和沙地上培育薯苗，并获得成功，这大大提高了江浙一带番薯种植的产量。后来，陈以柱到江苏、山东等地经商，又将番薯种植推广到了黄河流域。

最值得一提的是陈以柱的第三个儿子陈世元。

陈世元年轻时在山东胶东经商，正遇到“旱涝蝗蝻，三年为灾”，粮食绝收，民不聊生。他赶紧从福州招募有经验的农民到胶州来种番薯。他还让长子陈云四处张贴告示，免费向当地农民赠送薯种，传授种植方法，从而成功地缓解了当地饥荒。陈世元自山东种植地回到长乐老家后，还将种薯经验编写成《金薯传习录》一书。尤其让人动容的是，乾隆五十年（1785）春夏之交，河南大旱。时年已逾八旬的他请命自愿携带种苗，与孙辈一道前往河南开封教种番薯。乾隆皇帝为



陈世元《金薯传习录》

此諭示河南巡抚毕沅：“陈世元年逾八十，自愿携带薯子，挈同孙仆，前往教种，属甚急功……”至当年10月，陈世元积劳成疾，不幸去世。乾隆皇帝闻讯叹息并赐匾嘉奖。匾上即题写“属甚急功”四个大字，以表彰陈世元救急赈灾的重大贡献。

番薯在中国推广，不仅仅是陈家六代人的努力，还得到一批有识之士的鼎力支持。山东的王象晋即是其中一位。王象晋出身宦宦世家，曾官至浙江右布政使。他热衷农业耕种，自号“农居士”，中年脱离宦海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乡经营农业。当王象晋听说陈振龙引薯种回闽，便主动联系陈振龙，准备在山东引种栽培，开展试验。后来他将自己的种植经验总结为《群芳谱》，其中的“甘薯篇”对番薯的种植方法、性能、收

采、保存、制作等方面都作了全面说明，他认为山东的沙地最适宜种番薯。书中的有关内容被乾隆时期山东布政使李渭转引在《种薯法则十二条》中，对推动番薯在山东等地的广泛种植起了很大作用。

徐光启是明代著名科学家、农学家，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万历三十六年（1608），江南发生大水灾，导致谷类作物减产。为解决因灾造成的粮荒，徐光启委托在福建的学生购买薯种，用木桶运至上海，先在自己家的园地里试种，之后推广到各地。他写下《甘薯疏》，介绍甘薯传入中国的经过和栽培技术等。徐光启为番薯在中国的推广不遗余力，在所著《农政全书》中盛赞甘薯的优点有“十三胜”。他还提出利用窖藏的方法破解薯种越冬的难题。

福州人翁若梅则被人称为“红薯县令”。乾隆三十二年（1767）他出任四川黔江县丞，在任期间，正值黔江干旱，粮食歉收，百姓饥馑。于是他写信向陈世元求助，陈世元寄去《金薯传习录》，介绍番薯种植方法。翁若梅于是召集各乡里长到县署开会，商议如何推广种植番薯。他还亲手抄录多份《金薯传习录》到各乡，并请陈世元派人运送番薯种苗来黔江，教会农民种植。在他的努力下，黔江番薯获得丰收，有效缓解了灾情。番薯种植也由黔江迅速传播到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

道光年间，何则贤等士绅文人在福州乌石山建“先薯祠”祭祀巡抚金学曾，附祀陈振龙及其



乌石山先薯亭

子孙，感念他们造福乡梓的卓著贡献。后“先薯祠”废。1957年，经福州市人民代表提案建议，于“先薯祠”旧址附近建“先薯亭”。

先薯亭，纪念的不仅仅是陈振龙一个人，而是对陈家六代人以及一批劬劳为民的官员的集体礼拜。正是因为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接续不懈的努力，让来自南美洲的番薯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结出硕果，成为百姓主要粮食来源之一。

离开青桥村，告别陈振龙故居，但八尺薯藤依然萦绕在我的脑海中，还有那藤蔓上的芸芸众生，悠悠岁月。

父亲的村庄

林碧莲

大木匠

父亲是个木匠，大木匠，盖房子的。与之区别的是细木匠，做家具的。

农村人人生三件大事：娶妻生子、盖房子、娶儿媳妇。

盖房子是人生中最难的事。娶妻生子一般有父母帮忙，而能盖房子就不怕娶不到儿媳妇。

六扇厝是村民普遍的选择。五开间，中间厅堂，左右各两间，横排开来六堵墙，故名六扇厝。有钱人家且子孙多的盖八扇厝，七开间。

俗话说：“地理未动，木匠先行。”盖房子先请地理先生定方位，然后是石匠打地基，最后是木匠扶扇、立柱，上大梁。地在那里不会跑，但要盖房子，先要盘家底：盖多大的房子，需要的梁柱椽子的多少、大小、尺寸等。木匠要提前帮忙量地，设计结构，看料，开单，甚至帮忙上山

选找树木。东家要提前采伐木材、晾晒木料。

大木匠有窍门，确定尺寸有讲究，木匠讲究鲁班尺，鲁班尺定吉凶。好木匠会帮东家精打细算，用料省，且工时稳定，不误工。

父亲在永泰大喜村这边待了32年，大喜、白杜、里洋、三富这一片的房子几乎都有父亲的付出。为了请他盖房子，有的人家等了两年多，从日工价5元等到了日工价7.5元，那是20世纪90年代。

大木匠须有能耐。有能耐的大木匠方能做大师傅，主持扶扇和上梁。

扶扇，即定框架。纯木结构的房子要把房子主框架一次性树立起来。我们家的祖厝是八扇厝，用了14根墙柱（支撑木扇墙的）、4根廊柱（支撑过道屋顶的）、4根平柱（支撑厅头的）。扶扇的时候，先扶东墙，接着扶西墙，最后扶厅墙。东西墙的墙柱都是用穿枋串着固定好的。中间的梁柱先穿，两边的檩柱依次，穿孔的



尺寸也有区别，梁柱的穿孔最大，檩柱的递减，相差2—3分。穿枋的木料或有瘤结，细心的师傅要根据木料的特点在孔内做相应的处理，以使枋和柱若合一契。梁柱直径1尺，高9丈，檩柱6根，前后各4，尺寸依次递减。一扇墙框架需要三四十个壮年汉子把它扶着立起来。在墙框架将正未正时，汉子们把整扇墙框架抬起来，垫上柱珠。墙柱是圆的，厅头的柱子是方的，4根厅柱也是用穿枋构成一个正方形的厅头结构，用以摆放祖宗牌位。

木匠师傅指挥汉子们扶扇，当三堵墙框架都扶到将正未正时，木匠师傅顺着柱子爬到枋上，牵引三方，榫卯相合，框架已定。

扶扇是大事，是难事，不容有失。能指挥扶扇的师傅必是大师傅。扶扇之后要办酒席款待师

傅和乡邻。

扶扇也要良辰吉时，时辰一到，木匠师傅动锤子，以示动工。后面的行动就随意了，不需要卡时间点。

瘦小佝偻的父亲讲述这一切时，声音洪亮，寿眉飞扬，眼神明亮，那般气势如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

上梁是盖房子的大礼，有讲究。要挑黄道吉日，日子要吉祥，要与家主及家中幼童的生辰八字相合，与东家家人的

生肖相合，也要与大师傅生肖相合。要宴请亲朋好友，亲朋好友要送礼，送青布袋装的红糍团和橘子，还有一对红纸包的“双贵钉”。“双贵钉”不是普通铁钉，要在铁匠铺专门订制。这铁钉两头都有冠，对折，中间似断非断。上梁礼完成后，东家拗断铁钉，收走一根，回礼一根，寓意大家都“添丁”。

到了上梁那一天，厅堂中央要摆香案，摆供桌。大师傅要祭祀鲁班，东家要献猪头、公鸡，亲朋好友献红糍团、橘子和一对“双贵钉”。母梁要请有福之人先抱动一下，称为抱梁。而后由两个汉子从前庭搭架子扛上去。其他的檩梁可以从房后传上去，但母梁必须从前庭光明正大地扛上去。两个汉子扛着梁步步登高，大师傅依规矩要“做四句”，就是四句一组押韵的吉利话。“新

起新厝新又新，鲁班师傅来添丁。也有房房多幸福，也出子孙去上京。”“今日上栋梁，好事到处传。亲朋来贺喜，东家上大梁。”“一条大梁在厅堂，梁头向东排排坐，梁尾朝西福寿长。”“丁财两旺福气双全，添丁发家常发吉祥。”“添丁添丁，代代子孙兴，添丁添得远，代代子孙传。”大师傅“做四句”的时候，大梁从庭前的院子里一根一根地往上抬，观礼的亲朋好

友高声应和“好啊”，以示赞美和祝福。母梁上到梁柱的上方，大师傅按吉时让母梁归位。而后母梁的前后两个方向各架4根贯通的椽子，不能断，根部在低处，末梢在高处，有讲究。大师傅在每根椽子和母梁的交接处钉下5根铁钉，寓意“五子登科”，铁钉不能锤实了，要冒头，寓意“出丁”。这8根贯通椽，上端悬挂五谷袋，寓意“五谷丰登”；下端悬挂五帝钱，寓意“驱邪避祟”。这8根椽子要冒头，大师傅把冒出的部分用锯子锯平，但这锯下的椽头不能落地，师傅要用手接了带下来。大师傅在上梁过程中还要抛橘子和红糍团，大家在院子里抢，寓意“吉祥如意，好时运”。

大师傅从屋顶下来后，要给东家的全家人“送丁”，红纸包的两根铁钉和两根竹钉，从大到



小挨个送，东家回以红包，也从大到小挨个回。亲朋好友的青袋中也有一份红包，给大师傅的。大师傅也要给亲朋好友回礼，一个红纸包的两根铁钉和两根竹钉，寓意“添丁”。

上梁过程中气氛热烈，喜气洋洋。

村庄里的父亲

2022年的春节，我参加采风活动，来到嵩口镇大喜村。

山路弯弯，沿着山溪溯流而上。路的尽头，是一道堤坝，堤坝后面藏着一面碧绿的湖。站在村口向南眺望，沿湖的村路像两只手从东西两个方向向南掬住了这一湖碧水。四面青山葱茏，南边有宽阔的溪谷夹在竹林间，山泉从谷中无声漫

过布满鹅卵石的河滩注入湖中，一排石墩沟通了东西两岸。青瓦白墙的土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散落在湖边的山坡上，柔和亲善，似森林里自然生长的蘑菇。这里没有一幢钢筋混凝土的房子，没有一丝工业社会的僵硬和凌厉。偶有村人在路上、在果园、在菜畦活动，整个村庄安宁静谧，如遗落世外的桃源。

我在村庄里漫步，似有响声在村中回荡，击打着我的灵魂，我突然有所悟：这是我从小听到大的“大喜”啊，这是父亲的村庄啊。

今年的10月3日，我们终于如愿陪父亲旧地重游，到了大喜村。村道东边的山脚下，德季、德炎两兄弟合建的一幢纯木构六扇厝，是49年前父亲主持建造的，用了10根墙柱、2根平柱。



当年“扶扇”共用了四五十个壮年汉子。这幢房子用的是穿心楼的结构，走廊在中间，前后两明间，楼梯隐藏在平柱构成的厅头后面。大门和走廊两端的廊门一关，外人无法进入，里面来去自如，安全又方便。房子保养得很好，墙面和梁柱每年都清洗，木料颜色鲜亮，只有屋檐下椽子有些朽烂，去年也都更换过了。东家孩子们都在上海和福州发展，德季婶子刚好从上海回来，见到父亲非常高兴，摆凳子，端茶，拿花生、龙眼，热情款待。邻居们听到消息，纷纷放下手里的活过来打招呼，喊着“功银师”。父亲和大家开心地聊天，回忆往事，交换着各自的信息，感慨着时光的流逝。我们从东边沿着湖往南走，一路上父亲不断地向别人打招呼，对方先是诧异地问：

“你谁啊？”马上惊喜：“功银师，是你啊！你从哪里来啊？”然后是端茶，聊天，留吃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父亲居然都能三言两语挖出人家祖孙三代的根底。东家进，西家出，绕湖一圈，一路上都是热情的笑脸。我一直以为的古板拘礼、交际谨慎的父亲，在这里却自信爽朗，如鱼入大海，从容自在。父亲一边和大家聊天，一边向我们介绍他当

年在这里工作的情况，举目所见，整个村庄，只有其中的一幢房子，因建造时间比较早，父亲没有参与过。秋日暖阳下的父亲喜气洋洋地在我们面前过了一把衣锦还乡的瘾。

我们从大洋镇出发，穿过富泉乡的德石村，同安镇的洋中村，梧桐乡的白杜村、梧桐街，再到大喜。回来时，从月洲的村道翻山上同安镇的荷洋村回到大洋镇。父亲一路上指点当年他徒步赶路时的小路和地点，时不时点评周围乡村面貌的变化，如今的柏油村道平坦宽阔，他于沧桑感慨中不乏满足与喜悦。我们在父亲的话语中溯流而上，去触碰父亲辛苦奔波半生的足迹。

我从小到大的印象，父亲都是早出晚归，忙碌得很。在人民公社时代，为了养活家人，父亲偷偷地在山里开了一垄山地种红薯。为了避人耳目，父亲是半夜3点多上山劳作，5点前回家，休息一会儿后，再去集体的地里上工。分田到户之后，父亲更是废寝忘食地劳作。有的田处于深山，田地贫瘠，路途遥远，赶牛耽误时间；有的田则挤在偏远的山坡，小得连牛都无法转身。父亲就一锄头一锄头地自己翻地，把能争取到的每一粒粮食都背回家。一年中春耕和秋收时间，父亲在家侍弄田地，其他时间就外出打工。来回路程用时多少，在东家那里可以做工几天，父亲都计算好了，一点儿不敢懈怠。为了多赚点钱，父亲就带徒弟。徒弟只能做粗活，但每栋房子及每项工种的人工量是限定的，父亲一个人要赶出好几人的活。我念大学那几年，家里四个孩子都在

读书，这是父亲负担最重的时候，每一天的工钱他都算计好了用处。父亲不敢耽误一天工，亦不敢乱花一分钱，乃至来回奔波都是以步当车，过午过晚，赶不上饭点宿头是常事。

随着混凝土盖房时代的来临，木匠行业渐渐式微，父亲只得回家种李果，做李干，以赚取家用。前几年，都说吃山茶油更健康，父亲又翻垦果园种油茶，还专门种龙眼油茶，说是榨出来的茶油更香。这几年听说有转基因黄豆，吃了不好，父亲就自己种黄豆，一罐罐地寄来，说磨豆浆更香。我爱吃的扁豆，弟弟爱吃的甜笋，大妹爱吃的芋头，小妹喜欢的地瓜……一季有一季的新鲜菜品寄来。考虑到下一代都已经进城谋生，山地无法守护，父亲又种了长寿的柿子树和板栗树，天天侍弄。

“我23岁娶你妈，30岁盖了下居院那两间房子，40岁又盖横楼那4间房子，50岁娶儿媳妇，60岁到城关帮你弟盖房子，70岁又回老家翻盖新房，一生未敢松懈。”父亲颇有点感慨地说。

父亲的话，让我想到了李森祥的《台阶》，文中的父亲为了改变门楣，一根草一块石地辛苦积攒，穷尽一生的精力，盖起了有九级台阶的新房子。那在晨雾中踩踏黄泥的身影于我而言，是何其熟悉。我又想到了春天里在村庄忙碌的燕子。年年岁岁，燕子衔泥筑巢，哺育乳燕，最后新燕飞离老巢，只有老燕在屋檐下守望。也想到了我们筑下的巢，我们养育的乳燕，我们守望的未来。

没有爱的“爱庐”

蔡 林

这里的“爱庐”并非大家所知的福州仓山康山里1号刘氏“爱庐”。它位于桥南附近的泛船浦海关埕地界，拆迁前门牌号是瑞荣坊22号。当年，被冠以“泛船浦”之名或是为了与康山里1号“爱庐”区别，称其为泛船浦“爱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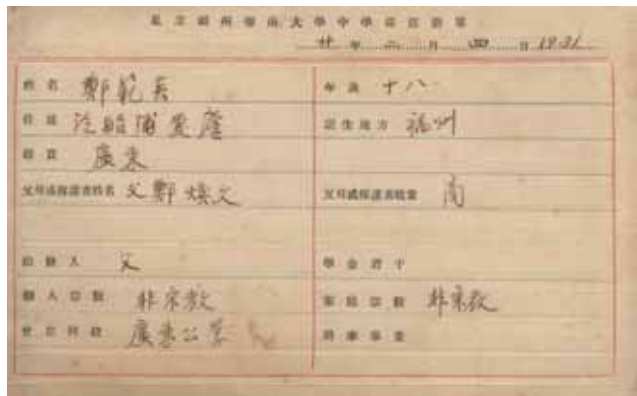


海关埕地域拆迁前的泛船浦“爱庐”——“广东馆”

1

泛船浦地界中段有一道“海关浦”，闽江水从今日闽江大桥的西侧、当年海关验货场处流入海关埕腹地。分岔向西流的在禅臣洋行南面戛然而止，留下一个可掉转船头的窝形码头。东流水分Y形两叉，一道继续向东，一道向南，南流水蜿蜒过阜昌、太古洋行，止于俄、英、日等洋茶厂聚落。水叉上南北间架一座有着石狮子护栏的石桥。从江边海关码头向南过石桥止于太古洋行的巷子称“海关巷”。泛船浦“爱庐”位于石桥的南边、海关巷东侧，是个带院子的洋楼。

“这洋楼，是当年太古洋



1931年《私立福州华南大学中学部注册单》

行的管家兼账房先生的院子。”太古洋行华人老板的孙子韦先生如是说。院子的后门连着韦氏瑞荣坊，前门隔着海关浦水，和海关巷与西边的邮政管理局两层洋楼（原阜昌洋行仓库）相对。后来，这楼和院子改造成茶厂宿舍，他曾进那里玩过。“文革”后期他见过曾被泥封的匾额，泥剥落时字迹模糊，凭大人方言口音辨识为“爱庐”。

池志海先生收藏的《私立福州华南大学中学部注册单》民国二十年（1931）记录，籍贯广东的学生郑范英，年方十八，居住在“泛船浦爱庐”。她的父亲名叫郑焕文，非宗教人士，职业为“商”。

19世纪中期英帝国主义从广州通商带来了洋行的粤籍买办，在上海、宁波、武汉、厦门、福州口岸扩大通商，设立洋行。“洋行”据说由广州十三行的“行”所从事贸易功能而来。冠以“洋”即是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贸易公司。有资料表明，福州通商口岸打开后，便捷的茶路吸引

了英国的怡和、太古，美国的旗昌，俄国的阜昌等洋行，他们纷纷带着买办从香港、广州、上海转战福州，以粤籍为主替洋人买卖、办事的“买办”阶层在福州聚集。

太古福州分号买办是广东香山籍韦氏兄弟，他们带领的“华经理账房”的华人账房、跑街、管仓、报关、分庄等人员为洋行服务。辛亥革命前太古洋老板撤退了，韦氏弟弟韦锦川领头盘下太古的家当。福州太古分号在他们手里经营得风生水起，赚得盆满钵满。20世纪20年代中期韦锦川在海关巷原有的太古工厂、仓库东边的瑞荣坊建起了广式十二间排纯住宅，“华经理账房”的管家兼账房先生郑焕文挨着瑞荣坊入口建起了“爱庐”。

“爱庐”是一栋带院子的红砖木结构西式两层洋房，方方正正，券廊式拱形窗，檐口带线脚装饰，窗上安装防晒的木百叶窗。入口中部有带露台的门廊，走进一楼大厅，正中是起居处，像聚会、办事的场所。露台上具有民国风的绿色琉璃花瓶柱嵌在围栏中，地面铺着连续图案的花砖。二楼有一个长会议桌，周围是房间。院子大门朝西，门内侧设有收发室，直至21世纪拆迁，门卫房还在。建在海关巷太古洋行茶厂仓库以及太古华人韦老板十二间排边上的“爱庐”，其布局架势似乎不像纯住宅，带有写字楼的气息。它由广东人建，进出入住的也是广东人，加之传统福州人对“爱”的理解偏狭隘，羞于启齿，于是，在当地古稀老人记忆里以及部分文献资料中，这

里不称“爱庐”，而呼“广东馆”。

2

广东“馆”与广东“会馆”一字之差，许多不知情的人会认为是一个地方，即使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当地人，大多也混为一谈。实际上，它们并不是一个地方。

“广东会馆”时常出现在新闻报端，位于当年的南台岛太平巷北侧（仓山区六一南路52号），至今完好地保留在仓山第二中心小学校内。会馆于清同治六年（1867）落成，为在福州经商或生活的同乡提供保护。之后于清光绪二年（1876）由旅闽广东人集资扩建，是一座气势恢宏、古朴传统的岭南风格建筑。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回老家香山途经福州，曾下榻于此……

“广东馆”，则是一处粤籍商人的私宅，已悄无声息地湮灭在城市发展进程中。但它的蛛丝马迹留在一些回忆文章和当地人的口述以及文件资料里。

多年前随手翻开一本杂志，其中一文《淘气在广东馆》，作者写到小时候随外婆住在仓山广东馆：广东馆房子是一座洋房（并非广东会馆），这是我童年最快活的乐园，狗窝、鸽子、水井、果树、花卉，还和一个广东女孩一起采光了外公的金橘树上的红果子、把牙膏挤压在枣红色的门板上绘制大师级的抽象画，最高级的游戏是从二楼坐上木梯扶手滑下，转了个180度，最后着陆

在瓷砖地板上。

这般快乐让我惦记在心，找机会询问了作者，记录下他文章以外的记忆碎片：院子里一位比他略大一点的男孩，有辆小童车。一天，童车闲置在楼梯旁，他就骑了起来，不知何时发现男孩远远地看着他……他随外婆住在二楼靠东的屋子里，楼上大多数房间紧闭着。某天，一对男女说着广东话从人力车上下来，女人似乎生病了，由男人搀扶着住进二楼的一间卧室。他在二楼会议厅里遇见过这位娇弱的女人，她穿着白色的睡衣，把他带到屋子里给他糖果，昏黑的屋子窗帘紧闭，一阵化妆品的香气袭来……《淘气在广东馆》的作者还画下记忆中房屋内部结构的平面图。

一个春和景明的日子，我随蔡氏宗亲前去祭祖扫墓。休息时我聊到海关垵，刚说到那里的邮局，一位同族的年近耄耋的老人开口：“邮局那里有个广东馆，房子很大。”我眼睛一亮，忙问道：“您怎么知道？”他瞪了我一下说：“我怎么会不知道！我和他的儿子郑祖熹是中学同学，好朋友。”说完此话，这位名叫蔡汉江的老人陷入沉思，面对着春山清明，他长叹了一口气说：“他死了。”大家不禁沉默起来。

后来，我与《淘气在广东馆》的作者一起拜访蔡汉江先生，继续听他讲述广东馆的故事。蔡汉江老人告诉我们，他和广东馆里的郑祖熹在十二中同班读书。当年（1962年左右）蔡汉江住仓山下藤路十锦祠，有时会去广东馆玩。见过郑祖熹母亲，“福州县城人口音，个头小小的，为人

和蔼。他父亲是做生意的。”郑祖熹还有个妹妹，送给了汉江老人在十锦祠的邻居林家当女儿。郑祖熹时常会去十锦祠窥探妹妹，因此，他们俩更亲密。“记得有一天下课后，他又要和我一起回家，我知道他想妹妹了。我家厨房窗户可以看到那人的家。”这天妹妹正在院子里玩耍，郑祖熹一直静静地躲在窗后看妹妹，边看边流泪。妹妹回屋了他也没舍得离开，直到天暗。郑祖熹平时不太说话，蔡汉江始终感觉到他心里压抑得很。他看完妹妹后似乎正想张口说什么，汉江母亲煮了鱼丸，叫他一起吃，他欲言又止，急忙告辞了。那晚之后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不久就传出他自缢的消息。

这种结局，我之前从瑞荣坊韦先生那里听到过，就发生在这座“爱庐”里。听邻居说他母亲是郑家下人，兄妹俩庶出，家族成员都不予认可，身份地位卑下。他们被赶到楼后面的小屋子里居住，房子改造成茶厂宿舍后，他们还住在楼后厨房那里。送给十锦祠林家的女儿，曾在母亲病重时回来照顾过。邻居都说这个儿子（郑祖熹）情绪压抑易波动。我问蔡汉江老人，是这样吗？“不是的！”老人颤抖着说，“他有事憋在心里，他没说。”半个世纪的少年友谊，老人留下深深的同情和自责里：那晚，如果让他说出来，也许就不会走上绝路……

我的心被紧紧抓捏着，不知该说些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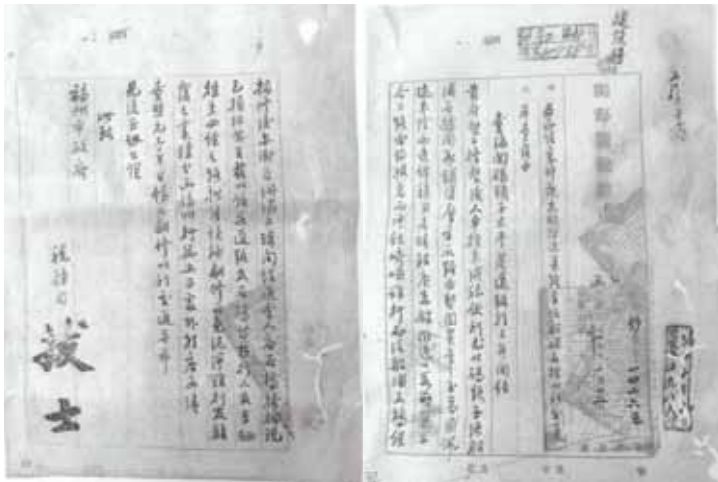
同行的作者见状，赶紧将话题转移到他们家的院子，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对院子的印

象，一个是20世纪50年代初住过，一个是60年代初去过，相隔十年，追溯那院子的结构，那些狗窝、鸽子笼，居然一一对得上。按年龄推测，50年代初在广东馆里拥有童车的男孩应该就是郑祖熹。蔡汉江当年到广东馆找郑祖熹玩，并没进过红砖房子，只知道“那房子很大，他（郑祖熹）和妈妈不住在房子里”。“您见过他父亲吗？”“没有，只听祖熹说他像爸爸，宽肩大头。”老人说：“郑祖熹的妹妹个头不高，大脸方方的，送人后改姓林……十锦祠搬迁后我们分别安置了，她现在70来岁，应该还在……”

《淘气在广东馆》展现了一个充满童年欢乐的广东馆，而老人的一番话却让我产生了无尽的悲悯。他们说的都是发生在广东馆，也就是郑氏“爱庐”里有天壤之别的故事啊！

3

“泛船浦石桥”是座架在海关浦上的石板桥，这座桥在仓山人的生活中尤为重要。早年，南台岛大岭顶（现在的观井路东段）未打通，大桥南岸观音井向东的路受阻，东行者需绕梅坞路走太平巷，再由太平巷往北到海关巷，从海关巷北行过桥到江边海关埕，或在石桥处拐弯继续往东可达新民街、菖蒲、港头等处。在仓山老人们的记忆里，那石桥修得规范，有些壮观。立在桥上可见深深的暗流涌动，时有货运船穿过桥下，往东边划行的船多运大米，往西边划的多运砖



民国时期，闽海关税务司拔士签名的公函

瓦，浦水与石桥俨然形成立体交通。桥头护栏柱上还刻有如万寿桥栏杆上的石狮子，附近民众都相信那石狮子有灵性，家里孩子“怀好疼”“破病”就去拜拜。

在这一带略显突兀的广东馆合着是因位于石桥附近的交通要道而被人们记住。20世纪50年代扩路，海关浦窄了，桥短了，石狮子也不见了踪影。20世纪70年代闽江大桥飞架在海关巷西侧，石桥渐渐淹没在海关巷道路中。不过直至21世纪初，透过模糊的石板缝还可以感觉到石板下潺潺的流水。

这期间石桥不乏修修建建，有份修路桥的函件写道：“与上年间经贵府督工修整后……码头至泛船浦石桥间承铺双层方石路面坚固异常。”“……广东馆附近一段所筑三合土路面场，被急雨冲蚀崎岖难行，泛船浦石桥经拓修后亦渐告坍塌……”出现在函件中的“广东馆”是连接

着泛船浦石桥和三合土路段定位的建筑标志物。

《福州旅行指南》列出“福州中外各菜馆”馆名、地址。馆名为“筐乃家”的菜馆地址标注，赫然出现“泛船浦广东馆”。从“筐”字看这是一家日式餐馆，按常理不会设在华人的馆舍里。查《福州市街图1937年仓前山野上英一福州考附图》得到了答案，一个“筐之家”的图注，位于广东馆南面。“乃”与“之”有误，但指向一致。在这里“泛船浦广东馆”非“筐乃家”菜馆的地址，而是告知食客的定位地标建筑。

《闽报》一期报头上曾写道：“本报馆设在南台泛船浦广东馆东边……”核对地图，闽报馆附近除了广东馆外，还有瑞荣坊、福建邮局等知名建筑，而《闽报》广而告之的依然是泛船浦广东馆。可见这栋位于海关巷交通要道上识别度高的建筑，在门牌号不完善时期确实是这一区块的地标。

这里的爱庐、广东馆、石桥都冠以“泛船浦”以示区别，泛船浦是特定的区域，曾经历过萧条、沧桑和屈辱。由“番船浦”改名的泛船浦已然觉醒，以江流形成的土地、乡民的融合精神，参与福州港口贸易，作为近代不可或缺的力量走向世界。今日，当年临江洲地上鹤起的洋建筑，包括海关浦畔没有爱的“爱庐”已淹没在城市发展进程之中，但是，它们留给世间的冷暖故事，仍在流传。

大根路与城守前

陈常飞

大根路并不长，连接东街与津泰路，毗邻仙塔街与五一北路，牵系着老福州人的记忆。巷子某段有蓝花楹树，在福州“文艺圈”中颇有名气，有人说树龄已有30多年。该路段粉墙某处，三角梅等花卉密布，姹紫嫣红开遍。它地处福州城市中心地段，周围车水马龙，华灯初上时更是一派繁忙景象，但大根路里，却并不喧闹，特别是夏天午后，更是异常安静。

大根路原名“大墙根”，位于福州城区“旗界段”内。今路边一堵白色大墙，有人说那是清朝的遗存。清朝年间，旗汛口一带方圆几里皆为旗人聚集地，比如位于大根路对面的省立医院门诊部大楼门那边，当时是福州将军署，署中主官为福建八旗驻防兵之最高长官。

清顺治十四年（1657），清兵驻防福州，屯城中东门、汤门、井楼、水部四关，自井楼门街

东边一派，至法海寺止，民居概令搬移住兵，谓之“匡屋”，为满洲营，此即福州“满城”之始，时许多街巷均为清兵驻地，在大根路周围还有副都统署、佐领署、防御署等设置。旗人为巩固政权，实施了许多防护。为了避免汉人随意进入这块区域，便高搭围墙。人们俗称此地为“长墙弄”，也称“大墙根”。旧日里，老人提及这个



大根路原名“大墙根”



大根路

地方，都会说一句极有意思的话：“只能去‘大墙根’，不可能去‘大墙里’。”武昌起义后，福州革命军随之响应，义军从于山炮轰“将军衙门”。旗兵终于败北，福州将军朴寿遁逃。

从清顺治十八年（1661）旗兵驻守福州城至此的曾经的那段岁月，画上了句号。

当年，这里的多家机关宿舍及大根路教堂等建筑还没出现，大墙内清兵披坚执锐，大墙外百姓步履蹒跚。到清兵离去后这条小巷才逐渐扩大，变成了寻常路。再后来人们把“墙”字省去，改为今名——大根路。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大根路的名字来源于白居易的《早春》诗：

雪消冰又释，景和风复暄。
满庭田地湿，荠叶生墙根。
官舍悄无事，日西斜掩门。

不开庄老卷，欲与何人言。

“荠叶生墙根”早已成为过往，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排长条形绿植和花圃。沿着此路往前，尽头是大根路“袖珍公园”。边有一亭，可供行人休憩、闲聊。亭边杂植竹树，有花点缀其间。公园中一面照壁上还有蔡襄浮雕，底下小字记录着蔡襄《荔枝谱》中描写福州郊区种荔枝的盛况：“暑雨初霁，晚日照耀，绛囊翠叶，鲜明蔽映，数里之间，焜如星火，非名画之可得。而精思之可述，观览之胜，无与为比。”

辛弃疾云“千年田换八百主”，曾经繁华之地，后来也可能“兔走荒台”，沦为另一番面目。就说大根路，谁又曾想过这个地方还有个远近闻名的荔枝园？今天已找不到任何遗迹可为它作“脚注”，只能在一些文献史料上寻点“蛛丝马迹”，从而得到一条佐证。如郑祖庚《闽县乡土

志》云：“大墙根、荔支园、彩云里以东各街巷，南支路也。”林枫《榕城考古略》云：“荔支园，将军署之南，俗名长墙弄，南口接大黄府东口，及武安桥、青都观（城守前）等处。”林家溱《福州坊巷志》中说大墙根：“其地亦名荔支园，中有支巷二，曰升平里、纸房里，皆无通路。今废。”还有《民国福建省会邮图》《福州城台地图》等都将这一段区域标注为“荔支园”；在同治年间绘制的《福建省会城市全图》中标记有“荔支园土名大墙根”一语。福州市在城内分设鼓楼、大根区，是1949年前的事，1956年4月，鼓楼、大根两区合并为鼓楼区，大根区名从此消失。

顺着大根路南行再右拐，就是城守前路。

城守前商铺栉比，原有的老建筑与时代一起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越来越模糊的历史记忆，只能借助一沓故纸或老者口述才能得以追忆。《福州市地名志·部分地名摭谈·鼓楼区》载：“城守前——在仙塔街东，大王府南，以清代城守营副将署设在此地，今仍沿用旧名。”顾名思义，这里曾是守城部队衙门驻节地。城守前旧称“柏衙前”，因元代行省郎中柏粘穆尔居此，故名。明成化年间，黄镐（尚书）、黄尧复（侍郎）也居住此处，时称大、小黄府。清初，靖南王耿继茂、耿精忠父子分别迁居两座府宅中，其地遂改称大王府、小王府，

相传大王府系耿继茂所居，小王府系耿精忠所居。后耿藩兵败，其地被旗营占据，一说左翼副都统署曾设在大王府中，负责镇守福州城，同时协理军事及主管旗民户籍和民事等，城守前因此得名。

论及城守前，有两处不得不提，一处关于文教，一处关于信俗，前者是名城文化内涵之核心，后者为历史生动的生活画卷。

但这两处却鲜为人知。

福州民俗专家郑子端老先生出示几张老地图给我看，说这里曾有一座庙宇，名为珠妈庙，因地处满城，旗人对它进行了两次重建，供奉的据说有保佑儿童的神明。旧时天花（水痘）流行，且该病属疑难之症，旗人只得将“难题”托付神明，只可惜相关遗存没有保存下来。另一处是平冶楼，该楼系林宗泽宅，曾经是鼓楼区中的一处



城守前

藏书楼，这是我翻阅林家溱《福州坊巷志》时知晓的。

林宗泽，字雪洲，侯官人，著有《平冶楼诗本》等书，平冶楼是他藏书之所。当年此处“琅嬛福地”所藏图书多为“珍罕之本”，乡邦文献亦有不少。林宗泽喜藏书，他“日流连于南后街书肆中”，因家境不佳，花钱买到书籍后生怕其妻责骂，所以总是挟卷从边门进入，或先藏在某处隐蔽的地方，而后择机去取。民国后，林宗泽充福建通志局分纂，随即往江浙采访，流连于文渊、文澜、天一诸阁，传抄秘籍归闽，于是藏书日益增多。平冶楼曾收藏有施鸿保《闽杂记》钞本十巨册，“较申报馆铅印本内容多数倍，祖牟曾出贖请其雇人传钞”，林宗泽视为奇货，仅出示部分敷衍了事。林宗泽确实是嗜书如命之人，其重病时有人欲购其书，他说：“吾气犹属，书不可外出也！”可惜林氏身后萧条，其后人不能守此“财

富”，所藏之书终于散出。后来他的部分藏书被林家溱、沈祖牟、郭白阳、郑丽生等人收藏。

福州陈宝华老人曾经手绘《民国前城守前风貌图》记述往事，历历如绘。2015年02月6日，《东南快报》曾对此事作了报道。据载：城守前路北面为城守衙门，衙门四周是风火墙，门左右立石狮，两旁空地上古榕遮蔽，一派庄严气象。附近不远处为衙门马厰，俗称“马房里”，还有大士殿和张家大宅院。民国后，城守衙门改为福州警察训练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解放军驻军于此，其后改为省物资厅办公所。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后，这里曾建起一些西式建筑，今皆不存。再说那张家大宅院，曾是闽剧“赛天然”戏班发祥地。闽剧艺人在此排演过一出又一出精彩戏剧，闽剧名家郑奕奏也曾在这里出演。抗战胜利后，房屋归为省财政厅所有；改革开放后作为福建省财政干部学校，继又开办福建财会管理干部学院，福建省文史研究馆原馆长卢美松曾任该院副院长，这里是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工作的“第四站”，他的住所就在大根路7号。

论大根路与城守前的过往，可以用简短的文字叙述其历史沿革，但看似轻描淡写，却是经历了漫长时光。如今，整个大根社区中许多老地名尚存，如升平里、大王府巷、小王府巷、花园里等，这里的社区布局也延续着传统街巷的特征，这是值得庆幸的。



升平里

老街记忆

黄河清

琴亭虽为古村，但由于时代的不断变革，早已没有了古街，如今连古村也不复存在了。人们怀旧时，想再去一趟老街老巷，只能从记忆中去寻索了。

1981年由于铁路扩建的需要，琴亭村大规模搬迁。规划每户用补偿费建设12米长、5米宽、砖混结构联排两层楼房。建成后其新村主干道有6米宽、200多米长，成为一条街道，也就是后来人们称之的老街。沿街两侧的住户将临街的房子或出租或开店，渐渐成为一条繁荣的商业街。

每到一座城市或地方，心里总会有一个念头引导我，要去寻一条老街，静静地走一走，只为探索与感受老街背后的光阴故事，品味老街略带微湿气味的浓厚与苍凉。记忆中的琴亭老街店铺林立，有百货店、土产日杂店、药材店、豆腐店、理发店、小吃店、烤鸭店、照相馆、打字复印店、录像厅、铁匠铺、裁衣店等，外来人口还开了沙县小吃、兰州拉面等。一些出名的店主成

了老街名人，如理发陈依伯、铁匠周、锅边林嫂、卖布阿成等。

一缕阳光从云层中探了出来，老街醒了，一盏盏路灯渐次熄了。新的一天，新的故事从每一家的窗户里飘了出来，一同飘出来的还有一盏烟火，一缕茶香，一份简单的生活。老街的深处，一阵阵车轮滑过的“吱呀，吱呀”的声音由远而近，像一曲古老的歌谣穿越岁月的尘埃缓缓而来。卖水粉的中年夫妻推着自制的板车出现在街口的拐角处，阳光在他们身上跳跃着，夫妻俩说着话，脸上挂着笑容。一路上会遇见卖各种早点的，熟络的，也有陌生的，唠叨几句，问一问，也就熟悉了。他们大都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外来人，挣几个小钱，数着光阴过日子，说上几句就有了共同的话题，家长里短的，感觉分外亲切。

老街北边入口处有一块水泥空地，卖早点的小贩都聚集在这里，这里的地面沾染了许多的油渍，厚厚的一层油与泥土黏合在一起。卖早点的



如今的琴亭湖公园

小贩将家当放好，各自支起了家当。空地上的小贩越来越多，推车来的，骑三轮车来的，挑着来的，忙碌的早晨开始了。客人来了，笑问一句，吃点啥？要点啥？味道挺好的！尝尝吧……上班族大都喜欢在这里买早点，便宜，花样多，选好早餐后，坐下吃或拿着边走边吃。老街本来就窄，加上买早点的和来来往往的车辆，就都拥挤在这里了，一大早吵吵嚷嚷，人声、车声好不热闹，老街的一天就这样在烟火气中开始了。

布店老板人称卖布阿成，除在老街开个布店外，他还走村串户卖布。常见他肩背一个大包袱，出没在村头巷尾。只要阿成一出现，总会有人将他迎进屋，他坐定后便在桌上打开那个大包袱，五颜六色的布料即刻呈现在人们眼前，左邻右舍来问讯、买布者络绎不绝。

铁匠铺在南街头，锄头铁耙、镰刀斧头、刀

具剪子，各式铁制农具和大小铁器几乎样样都打。铁匠炉靠拉风箱助燃，请两三个帮工。老板姓林，有一手打铁绝活，远近闻名，生意红火，每到农忙季节，铁匠活更是应接不暇，熊熊炉火一天烧到晚，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不绝于耳。林老板亲抡大锤，一招一式有板有眼，从不马虎了事。那时的铁匠林，在十里八乡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林记铁匠铺堪称琴亭名店。

老街上还有一家理发店，一块老朽了的木牌子，用铁丝穿着，悬挂在屋檐下，风一吹就来回晃荡，仿佛不断地向路人招手。木牌上写着“为民理发店”字样，大约是用油漆写的，年深月久竟未褪淡。理发的是一个老头，一副眼镜耷拉在尖尖的鼻梁上，人们都称他池伯。下午，理发的人渐渐多起来，池伯每回用剃刀时，都会将剃刀在一块油布上刮擦几下，发出喇喇喇的声音。池伯的脸上是平静的，仿佛在调理一根松弛的琴弦，那双手的动作像舞蹈般娴熟轻盈，煞是好看。

姚伯的“元宵丸”店生意十分红火，他师从“美雅”的林英南，学得一手做元宵的好手艺，制作的元宵丸供不应求。姚伯的元宵皮薄馅多、饱含油汁，味极鲜美，最具鲜明的特点就是，每粒元宵丸都能做到皮与馅不粘在一起，口感嫩滑且不粘牙，内馅紧实又有弹性，汤汁晶莹剔透，口感清香。每逢春节与元宵，老街人都爱到池伯

元宵店买些元宵丸。它包裹了老街人对平安、团圆的祈望，也象征着一种幸福与安康。

2000年老街建了一个农贸市场，老街就显得更热闹了，市场上背箩挂包的，抱筐提袋的，推车负重的，负手而行的，三五成群结伴闲游的，单来独往步履匆匆的，往来穿梭，熙熙攘攘。周边村的小贩们都把农特产品拿到农贸市场出售，每个小贩都有各自占据的地盘，当然，偶尔会有新加入的，挪挪地方也就挤进去了。卖农具卖刀锤斧镰的，卖百货卖酱醋油盐的，卖服饰卖鞋袜衣帽的，卖蔬菜卖葱蒜瓜果的，卖海鲜卖鱼虾蟹蛤的，卖肉食卖鸡鸭、猪、羊肉的，卖杂货卖草木膏药的，吆喝叫卖声盈耳，讨价还价声震天。这城市车水马龙的喧嚣似乎都与他们无关，只有兜里那些零零碎碎的，沾满油渍、汗渍的钞票最实在，别看都是一块、两块、五块、十块的零钱，生活重担都是靠这些散钱撑起来的。斜阳临近西山时，农贸市场里各种喧嚣便戛然而止。老街华灯初上，此时最热闹的当属卡拉OK厅和录像厅，卡拉OK厅里不时传出港台歌曲《水手》《像雾像雨又像风》《甜蜜蜜》，不管是“跑调王”还是“破音帝”都可以过一把歌星瘾。录像厅也是年轻人最爱去的地方，和现在结伴去电影院差不多，都是和好友一起消磨时间的好办法。为了招揽更多生意，录像厅的经营者引进各种类型的影视剧，供顾客选择，录像厅门口张贴着各式的碟片和录像带海报，花花绿绿，令人眼花缭乱。

老街人爱养花，没闲地，就养在阳台上，多

了就搭个架子，花盆一层一层地放。老街人也爱种树，一个犄角旮旯也要植上棵桂花、石榴、银杏，秋来时，桂花飘香，石榴吐红，银杏叶覆盖在门前，夕阳下一片金黄。

老街人爱拉呱，左右邻里，一只小竹椅，一块青砖，一条木凳，一支烟，一壶茶，不急不躁，低声细语，家事国事，大事小情，谈古论今……摆的是龙门阵，聊的是快活林。心里堵的，聊一聊就通了，头脑里乱的，捋一捋就顺了。春夏秋冬，寒来暑去，日出日落，风来雨往，老街人的日子就这么过着。

老街人好吃，板栗酥、千叶糕、糖炒栗、菜头饼、炒肉糕、礼饼、炸虾酥香了半条街。街边的永泰葱饼又吊起了多少路人的胃口，还有臭味熏天的黑黢黢的臭豆腐……

老街人好玩，树荫下、弄堂里，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手中的纸牌甩在石桌上，啪啪地响；棋局前，长衫短膀厚厚地围成一圈，一下便是半天；操起二胡，一曲《跨上骏马保边疆》，拉得如痴如醉；遛鸟的、舞剑的，耍一段太极，扭一曲扇子舞……老街人活得不紧不慢，很滋润。

老街人实诚，平日里只要有人问个路或向门里探头张望，定然热情招呼，进得屋来，敬烟奉茶让座，相谈无隙。

时光流传，堆叠高耸的楼群终于将老街淹没，而关于老街的记忆也随同时间的潮水涌向了岁月的另一端。然而，老街里的故事，将会长久地予以一种心灵上的慰藉，是悠远的乡愁。

成均之教固海基

景 艳

琴江一隅，幸福院旁，被挤挤挨挨的楼房簇拥着，黄家第九代孙黄剑祥指着眼前那座小小的彩色雕花坊，告诉我这便是昔日三江口水师旗营的北门旧址，往左百米左右便是江。微风轻拂，透过几株嵌于楼宇墙根的老榕树，穿越了时光。消失的榕树林、八桨船坞、督捕厅和阅兵台，越

来越浓郁的古村民居烟火味，是物换星移的标志。只是那从北门迁到抗法烈士陵园一侧西门的“海国屏藩”四个大字，犹如一枚朱砂印，将一个国家强大海防的梦想摁入了眉心。曾经的旌旗猎猎、辚船昂昂，曾经的刀光剑影、鼎折覆餗，都化作了追寻梦想的千里之路。一根针千条线，从这个曾经诞生过多个海军世家的初始地出发，我们抽取一根，条分缕析。

1

“厅堂顶梁上面是神龛，有三个格间，两小一大，左边是祖宗牌位，右边是菩萨塑像，中间那个大的是诰封盒，是装皇帝批复的。里面有四个杠，纸卷起来的轴。一个轴里面全是印章，一个是满文写的，还有一个是空白的。前面是灯，弧形的灯架，被两个弓着背的狮



抗法烈士陵园内的“海国屏藩”石刻

子支撑着。客厅里摆着四张桌，两张八仙桌，两张六仙桌，还有八张靠背的椅子。”89岁的黄世光先生现在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爬上房梁的亲眼所见，还有点神采飞扬，他用手比画着诰封盒的大小。那时的黄家大宅在琴江村孩童们眼里是个宫殿般的存在，“又大又深”，还有高悬的匾额。这座原本是水师旗营兵房的黄宅，在光绪年间得以扩建，黄家第四代黄恩浩和黄恩录兄弟俩的房子和花园沿着城墙从旗营的东门延展到了南门。现如今，黄家的主体建筑仍在，面积却大大缩小了。庭院里的老龙眼树仍然茂盛，枝头的果实过了季节也没有掉落下来。真是物是人非。

在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里，黄家毫无疑问是望族，但相比于同为海军世家的贾家、许家等，黄家入营的时间要晚几十年。这个清政府沿中国海疆设立的第一批满族水师旗营正式设立于雍正七年（1729）。据《皇朝政典类纂》介绍，乾隆二十八年（1763），为平衡旗人人丁繁衍造成的营盘超编人口增加、供给紧张，朝廷下令“福州驻防水师营汉军，悉陆续出旗，分别改补绿旗营”，然后从北京调员充额。黄家入闽先祖黄中极由此从北京郑家庄调入三江口水师旗营，同样承担起“树威绝岛，柔远重洋，水疆永庆”的重责大任，从此开启了这个家族与中国海疆紧密相连的历史篇章。

入营的时间晚，但黄家的人才履历并不少。乾隆五十一年（1787）至五十四年（1790），黄中极赴台湾平叛，荣立一等功牌；嘉庆九年

（1804），黄怀仁黑水洋围剿蔡牵，防堵“发乱”（太平军），诰封武翼都尉；1840年，鸦片战争，黄震麟调任福州驻防军统领，驻扎闽安，因戒备森严，促使英军北犯，使闽省“免遭战火涂炭”，被《琴江志》誉为“海疆长城”；1884年，甲申中法马江海战，黄恩录驻守长门后塘寨，主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见敌舰即尽力攻击”，获赏戴花翎并加协领衔；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留学在外的黄廷枢回国参战，出任长江布雷队队长……黄家男儿的名字屡屡出现在缉盗征战、抗击外侮、保疆守土的功劳簿上，先后走出了四代六位旗营指挥官，从事与海洋相关事业的更延绵到了第九代。

自嘉庆二十一年（1816）允许外省驻防童生、秀才就地一体应试始，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停办科举止，近90年间，琴江黄家出过



黄曾源故居



黄曾源书法



黄公渚（左一）、黄君坦（左二）与友人合影

1 位进士、10 多位举人，有据可查的三四品官员有 12 位，其中有 5 位知府，同知、知州以下官员近 30 名，赏戴花翎、蓝翎及诰封者多人。伴随着世事变化和家族的开枝散叶，黄家一脉的声誉渐渐外扩，包括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会典馆纂修等职的黄曾源和他的儿子们。著名的骈文大家黄孝纾（字公渚），著名诗人、赋学家黄孝平（字君坦），与黄公孟并称“江夏三黄”，他们都国学深厚，书画驰名。而大连海运学院教授兼外交部法律顾问、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黄廷枢更以他对中国海商法的卓越贡献而声名远播。

2

“人物一时重雁行，君家声誉旧无双。”张

伯驹曾这样赠语黄孝纾。琴江黄家的声名由武而起，因文而重，家族的成长和重教兴学密不可分。

也许，清廷当初在东南沿海设置旗营的初衷，更多的是需要一支熟悉水务的八旗嫡系部队，作为巩固权力的基石。所以，水师旗营初建时对清文清语的重视远超于其他。为了掌握旗员清文清话的教习情况，朝廷特别派遣了清字外郎到公衙门视察督导。据《琴江续志》记载，“雍乾间，旗员引见不能奏对清语被革者不一而足。”当西方资本主义的齿轮加速运转，急切地向中国寻找出口的时候，大清王朝还在着手解决内部交流沟通的问题，对世界风云变幻的脱敏失察，注定了大清水师与外国水兵的实力差距越拉越大。黄家前两代熟知清语，加上多位有兼办海关税务的履历，在对外打交道的过程中，更容易直接感受到来自西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强劲经济推力。

清廷规定，入营的八旗子弟可作为后备军人补充兵额，除了走科举入仕道路解决生计问题之外，不得经商务农或从事其他技艺。随着人口逐年增加，编制却一直沿袭祖制定额。生存的需求和对时势的洞察，让黄家高度重视教育，族人不分男女、不论贫富都以读书为要。只是，旗营与外界物理间隔，更缺少接轨世界的机会。所谓家国一体、家国同构，大清王朝面临的困境与危机，三江口水师旗营也难以回避。

鸦片战争爆发之后，黄震麟代理协领，与林则徐多有往来，他创设了琴江官学，“聘满汉教师，由官兵俸饷摊扣若干以供束脩，旗营子弟均可入校学习，使文风丕正”。黄家第四代的黄恩浩是三品文官，尤其重视兴建书院培养人才。据郑巧蓬先生从两岸故宫找到的档案资料显示，黄恩浩在临川县兴建兴鲁书院、修复临川书院，返营后，又把祖屋第三进改建成了书屋，他认为：“风俗关系到人心，而人心在于学校，古者国有学，党有庠，家有塾，所以维风俗，而正人心。”不过，那时的教育仍以传承古代国学经典为要，缺少了对现实与未来的观照。

1884年，甲申中法马江海战，年逾65岁、因为“自小学习水务及骑射清语”“有将略”被慰留的佐领黄恩录以捷字营统带身份参战，目睹了战争惨烈的

一面，更加意识到“落后就会挨打，发展才能强国”。让他倍感痛心的是，人们已经意识到旧式水师的八桨船、赶缙船难以抵御列强的铁船大炮，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握发待哺，列强的脚步却没有留给一个皇权治理下的国家更多的喘息时间。

推开昔日将军行辕的大门，里面已经恢复了原来的三进院落制式，静谧又安详。那株顺着院墙生长的“将军榕”，据说已有近300的树龄，一半在将军行辕，一半在佐领公馆，和那些铭刻在墙体上的历史影像一起，见证了水师旗营的水流云散，见证了三江口的风起潮涌。当辛亥革命卸去了军营的铠甲，这个院落便开始承担起了它的另一个职能。1917年，福建省教育厅批准“将公衙门”（将军行辕）永远作为校址并设立“闽侯县第九区第一私立高等国民小学”，黄恩浩的后



旗人街

裔黄曾成出任校长。他明言，今后如果有地霸蒙混官厅，购为私有，“吾乡不论何人均可出而交涉”。尽管随着时局跌宕，学校时办时停，但琅琅读书声仍未绝于耳。那是鲜血与挫败激发的警醒。

当西方教会在炮山天主堂（后转址西门山）扬光小学开始招收旗营学生的时候，琴江洋屿的乡村士绅及大户人家也群策群力办起了琴江小学，成立了校董事会。除了常规的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劳作、书画、体育等课程之外，还开设了英文、音乐课，组织孩子举行球赛，表演行动剧，游泳教学也出现了配上救生衣（泳褡）的专业教官。教学质量之高、理念之新闻名遐迩，甚至有“琴江师范”的美誉，多位黄家儿女曾担任该校校长。黄世光先生如此描述家庭对培养下一代的重视：“我们家屋顶的瓦片原先盖得很

密，一片连一片，露三分盖七分，后来没有钱的时候，就把瓦片扒下来卖，变成露七分盖三分的‘反三七’，供孩子上学。”

雨散风流。经历过履新外迁、乱世流离、更换门庭、安置择栖等，现在依然居住在琴江的黄家后人已经很少了。更多的，像一粒粒种子播撒到了新的土地上，祖上曾经的过往已鲜为人知，但，崇尚“忠昭日月、驰骋疆海”的家传如深扎的根脉，清泉浇灌，便会开出绚丽的花朵。

3

老人名叫贾素芬，刚刚过完她的106岁生日。问起琴江的陈年往事，她总是淡淡地说：“年纪大了，记不得了。”可是，当我把一张青年才俊的旧照放到她面前时，她的一脸平静陡然起了波



福州将军行辕

澜：“这个人我认得，他是我姐夫，黄廷枢。”问他是个怎样的人，老人清楚地回答了两次：“很爱国、很正直。”

在黄家，黄廷枢是个神奇的存在。他担任过国民党海军军官，与新四军有过合作；他公派留学英国、德国，因为抗战请缨回国；他积极参加组织长江布雷，却因为拒绝参加内战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开军舰和商船，他是名好手，当教授做学问，他是名好导师。身处历史转折的重要节点，历逆境而不折，无私奉献、执着无悔。从保卫海洋到开发、发展海洋，从航海报国到航海教育报国，海军世家的梦想在他身上得以起飞。

张永坚先生是黄廷枢先生招收的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一个海商法研究生。在他的眼里，黄先生就似他书房里“把酒时看剑，焚香夜读书”的配画诗，有剑一般的军人气质，有书一般的儒士风范。在当时，大连海事大学航海系驾驶专业有一门海事法律课始终没有开，黄廷枢认为，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肯定是不合格的。鉴于师资力量的缺乏，他自己主动接手，为航海专业的学生编写出了第一本《海法》教材。后来在给海商法研究生开课时，也没有教材，他便自己复印英国典籍；缺乏通用范例，需要苏联读本，他以七旬高龄自学俄语到可以通读。三年时间里，他雷打不动地坚持每周两个上午的师生讨论；他独自一人坐在只有一个考生的考场门口监考，不留一点自我放水的可能；面对已经通过审核的学位论文，他要求学生精简重抄。五六万字的论文七易



黄廷枢

其稿，手抄近 50 万字，帮助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和父亲一样寡言少语的黄海，在黄廷枢七个子女中排行最小，也是唯一的男孩。他说，他其实是有点惧怕父亲，父亲对规矩的坚持近乎“古板”。记得，家中租房，他想在墙壁上钉个钉子，父亲予以严厉制止：“你没有权力在人家的房子里钉钉子。”父亲的眼里，小到个人，大到国家，行为举止都要符合相应的规范，不能做不合乎道德法度、规则的事情。大姐黄授吾的大女儿外贸学校毕业之后，想让父亲帮忙在保险公司或外贸公司安排一份工作，那时父亲的学生正好都在相应的岗位上，在外人看来就是举手之劳。没有想到，大姐几次顶着烈日坐公交车辗转到父亲家，都被一句“免开尊口”给回绝了，还被斥责是“挖社会主义墙脚”。黄授吾被噎得一口水没喝，一路哭着回了家。

特殊年代里，黄廷枢因为曾经的经历受到

过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从未消沉。黄授吾大姐告诉我，在她父亲身处逆境的时间里，发生了一起希腊船只与中国船只在公海相撞的事件。希腊方态度强硬，坚持要中方赔偿，几乎演变成外交事件。她父亲在两名工作人员“陪护下”抵达现场，据理力争。之后，事件以希腊方做出赔偿道歉而告终。他认为：“对规则没有正确的理解，归根结底就是对合同没有正确的解释。”

一张张普通的信笺，笔老墨秀，是黄廷枢先生亲笔所书。学生毕业多年，联系依然密切。他以“您”相称，唤他们“同志”。那封写于1990年2月9日的信，张永坚先生珍藏了30多年，里面记录着黄先生的深沉嘱托：“我国的航海先进桂冠早已落入别人之手，作为炎黄子孙，一定要争这口气把它再夺回来。无疑这个重任落在你们这一代人的身上，希望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祖国为社会多做贡献。”张永坚先生告诉我，黄先生的晚年仍在时刻关注着国家学术、法治、行业的发展，潜心图治，笔耕不辍，直至生命的最后。

现如今，黄先生桃李满天，学生遍布海内外，他所从事的事业也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更新的发展。正如他所说的，海商法不过是国际法律体系中很小的组成部分，但正是那些越来越成熟的法律条文最终构成了国家与国家间的行为规则。那些基于务实、开放、包容而形成先进教育理念，以及经由这一理念培养出来的人才才是一个国家迈向海洋强国的重要基石。

长期负责琴江旅台同乡联谊会工作的黄中



抗法烈士陵园的长阶

极第七代孙黄心书说，民智才能国强。三江口水师旗营中走出的海军世家后代，内心从未放下海洋强国的梦想。他知道，目前黄家的后代中有当海警的、有从事海商法研究的，还有的从事与教育相关的职业。仅黄廷枢一家三代就出了8位教师，黄家有据可查的教师已逾20人。

伫立抗法烈士陵园的长阶之上，青石劲柏，临江远眺，越过那些忙碌的机械长臂，随之浮现的是一幅山随礁岩起、江入大海流的壮阔长卷。不远处，一道由无数沙石构筑的防波长堤正在向远处平推，越来越坚实、越来越绵长，正在积蓄着力量和自信，去拥抱大海。

追寻饶刚生

戎章榕

由于隐蔽战线斗争的特殊性，饶刚生生前曾经化名陈庆瑞、林济群、陈俊逸、林佑基等，再加上他为人处世低调谦和，其事迹即便亲人也知之甚少。他在长期地下斗争中积劳成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任闽侯地委委员，但不得不离开岗位，带职在永泰城关休养，1966年3月在福州病逝，享年54岁。

凤落村飞出“火凤凰”

翻山越岭，我们一路颠簸来到饶刚生的出生地——永泰县岭路乡凤落村。

凤落村之所以成为岭路乡革命活动的中心，很大程度上与饶氏兄弟——饶云山、饶刚生有关。饶氏兄弟就是凤落村的“火凤凰”！

1913年12月，饶刚生出生在凤落村一个家道中落的贫困家庭，幼年时母亲因鼠疫去世，他由祖母抚养。7岁那年，父亲本着“地瘦栽松柏，



饶刚生

家贫子读书”传统观念，将他送到本村私塾读书。饶刚生聪颖好学，让父亲看到了希望，又倾其所有凑足学费，把他送到县城“古松书屋”，继续求学。其间，他接触和阅读了许多进步刊物，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1935年迫于家庭经济的困境，饶刚生不得不辍学，去永泰泉山乡考湖村任教，成为一名私塾老师。

1936年6月，经人介绍，饶刚生加入中国

共产党，成为凤落村历史上第一批共产党员。翌年，闽中特委在凤落隔头邱大椿中药铺成立了中共凤落党支部，饶云山任支部书记，饶刚生、邱大椿任委员，直属闽中工委领导，以农村为阵地开展地下活动，逐步扩大党在乡村的影响。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抗战，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闽中特委考虑到饶刚生熟悉永泰地方民情，群众基础好，又有文化，适合派遣到国民党政权内部开展统战工作。1938年，遵照党组织指示，饶刚生公开竞选当上了泉山乡保长和联保主任。从此，饶刚生便在“红白两道”上游刃有余地开展统战工作。在他的努力下，泉山乡、凤落、庄边的大部分村保长陆续同我党结为统一战线联盟。

1940年，饶刚生回到凤落村继任保长。抗战进入国共合作时期，饶刚生不失时机地助力党支部成立了永泰县第一个农会组织，党支部书记饶云山当上了凤落农会干事长，饶刚生为农会干事。凤落党支部利用农会这一公开组织，开办信用合作社，自办“盐子店”，明里帮助的是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暗里解决了闽南特委机关游击队的吃盐问题。



饶刚生凤落村故居

为了方便闽南游击队的往返通行，饶刚生千方百计通过泉山乡乡长做伪军工作，撤销了日伪设在岭路坑仔里（永泰与莆田县交界）的岗哨（路条岗），为我党开辟了可靠的安全交通线，保障了闽南中游击区物资输送供应和掩护过往泉山乡一带同志的安全，也为闽南特委机关从莆田城郊四亭村迁驻莆田与永泰交界的宁里村，做好了准备。

在担任凤落保长期间，饶刚生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巧妙周旋。比如在抗丁抗税斗争上，一方面，他利用保长身份在保内筹款，一旦上头派丁，就用筹集的款项雇残疾人员充数应付；另一方面，利用群众对滥派捐税的不满情绪，组织暴动抗税。在他任保长期间，国民党没能从保内抓走一名壮丁，他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饶刚生等一批地下党员的共同努力下，我党先后在凤落、岭路、石圳一带发展了36名党员，建立了6个党支部、2个区委会和农会，为党的地下活动打下了牢固的社会基础。

从1941年5月闽南特委机关迁到凤落，至1945年5月，闽中特委（1943年2月改称）及其游击队往返驻

扎凤落开展武装斗争。这得益于凤落村的良好群众基础，得益于饶刚生等人所做的工作。

饶刚生由于在永泰活动频繁，身份暴露，国民党省政府指示永泰县县长以重金悬赏通缉，抓活的赏银圆1000元，拿到头颅赏500元。1945年7月，驻扎在塘前的国民党福建保安团获悉省委机关、闽中游击队向凤落转移的消息，便纠合永泰保安队300多人连夜包围了凤落村，妄图一举消灭中共福建省委及其游击队。游击队闻讯后立即转移隐蔽，敌人在凤落搜剿一个多月，仍不知游击队下落，气急败坏之下，在凤落抓了100多名群众（其中地下党员、革命同志12人）。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程金兰及其他革命志士咬紧牙关、宁死不屈，最终这位年仅26岁的游击队员和她3岁多的女儿饶玉珍还有几十名群众惨遭敌人杀害，壮烈牺牲。



凤落村

永泰地下斗争的设计师

我们追寻的第二站是永泰县梧桐镇后溪村，位于永泰梧桐与仙游高阳交界处，这是老区基点村，也是中共福建省委机关旧址。

那么，福建省委机关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驻扎呢？

1941年4月，侵华日军在闽江口登陆，入侵

福州、福清、连江、长乐等地，形势十分危急。闽南特委决定组织武装力量开赴沿海县建立抗日根据地。特委机关秘密从永泰迁往长乐南阳一带，靠前指挥，直接领导沿海地区抗日斗争。

其实，在国民党永泰县政府以重金悬赏通缉饶刚生之时，饶刚生便接到特委指示，让他带领有关同志奔赴长乐抗日前线。饶刚生抵达后，化名陈庆瑞，潜伏到罗都乡，公开身份是乡公所的办事员兼会计，暗中任务是与潜伏在警卫队的队长郭永星共同负责特委电台和修械所及机要保卫任务等。

长乐沦陷后，我党组建“长乐抗日游击总队”。为了扩大游击队伍，饶刚生多次秘密潜回永泰联络地下党员，动员组织选派一批优秀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赴长乐参加抗日游击队。长乐收复后，为巩固成果，特委决定选派饶刚生等一批骨干，通过地下党的关系，潜伏在县自卫队内，



后溪村中共福建省委机关旧址石碑

作为我党在长乐的秘密武装力量。

不料，意外还是发生了。9月的一天，一位永泰老乡到罗都乡公所办事，因为认识饶刚生，脱口而出喊出了他的真实姓名，致使饶刚生的身份暴露。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特委立即指示饶刚生迅速离开罗都乡，化名陈俊逸转潜到长乐县政府的谍报组任文书。不久又派到地下党开办的鹤上农场担任办事员兼谍报组文书，专门为我党搜集地方情报，掩护特委机关安全。

为了打通通往长乐抗日前线的地下交通线，饶刚生只身潜入位于祥谦镇凤港村的三元桥，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经过多次深入考察，认为村民孟梅英革命觉悟高，于是，在她家设立地下交通站，为安全通行提供了保障。

1942年春，根据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闽南特委又从长乐撤回永泰石笋下。饶刚生奉命回特

委机关担任机关管理科科长、机要译员，不久便被组织安排前往闽北参加福建地下省委组织的学习班。

1943年春，正当全国抗日战争处于关键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却继续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将闽北福建省委机关作为重点“清剿”的对象，闽北局势吃紧。

1943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从建阳突围到达莆田，对闽中

地区的情况作实地考察，并选定仙游县石苍乡高阳村、永泰县梧桐镇后溪村青溪自然村作为省委机关的新址。省委指派机关管理科科长饶刚生带人先行进入仙游、永泰境内，到高阳温氏宗祠、潼关村、丘演村芹菜湖、青溪龙潭里一带察看地势，选择机关建筑用地，负责搭棚修路，做好迎接南迁人员的准备。驻扎地虽然偏远，但饶刚生还是谋划了四通八达的道路，别出心裁地把青溪周边小道分别命名为莫斯科路、列宁格勒路、斯大林路、基辅路等。之所以借用苏联的地名，一则是对革命充满信心，二则是加强省委与闽北、闽南、闽江地下交通联络站的联络，三则是暗藏玄机为随时撤退留有后路。

12月，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率省委机关与闽中武装由仙游高阳移驻永泰梧桐青溪，从此，省委的工作重点就转移到了闽中。

为了保卫省委机关的安全，省委指派饶刚

生、饶云山等人深入机关周围的村庄做发动群众的工作。饶刚生会同林汝楠，以灰色面目出面组织“青龙会”（由青溪龙潭而得名），把周围的青溪、芹菜湖、罗山、高坪、后门宫、考坪洋等村庄的开明绅士、比较进步的保甲长温友秀及各界人士共36人请到省委机关，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和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等，通过歃血盟誓，结拜兄弟，立誓“团结一条心，共同打天下，拥护共产党，反对国民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青龙会”成立后，成为统一战线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

1944年春，省委决定派饶刚生担任省委联络科科长兼省委政治交通员，专门负责省委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络工作，开展群众工作，开辟新据点。1944年4月，中共福建省委机关由永泰梧桐青溪迁到德化坂里，6月又迁到永泰东湖。在这期间，饶刚生忙前忙后，先到盖洋乡赤水建立秘密联络站，发展地下联络网点，并到嵩口乡与地下党恢复联系，还通过国民党嵩口镇镇长关系，搜集情报。

1944年7月省委机关迁到永泰官烈后，饶刚生在战友的共同努力下，又先后在闽侯南屿、南港，福清县琯口、北西亭，长乐县南阳村等陆续



台江区山仔里16号的高家大院

建立了隐蔽据点（地下交通站），确保了省委机关的多次安全转移。

假夫妻终成真伴侣

我们追寻的第三站是台江区山仔里16号的高家大院，闽江红色航线教育基地。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议，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福建省委审时度势，决定在福州设立地下交通联络站。

1945年12月，省委选派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省委委员苏华和饶刚生、陈德义三人，秘密潜入福州，负责联络总站的组建。

饶刚生与陈德义先期到达福州，饶刚生化名林济群，与陈德义在南门兜搭了木棚住下，以贩卖柴火为掩护，秘密筹建党的地下联络站。

为了城市地下斗争的需要，组织上安排两位女交通员分别与饶刚生和陈德义组成两对假夫妻来开展工作，以此掩人耳目，避免意外。

这对饶刚生来说，一时难以接受。他痛失妻女才半年多，时常梦中相见，内心尚在滴血，怎么能接受与一个陌生女人一起生活？

好在组织上善解人意，将苏华大姐装扮成婆婆，三个人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以此消除饶刚生的尴尬。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饶刚生与刘秀英配合上越发默契。

这对假夫妻经过两年多并肩战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在领导兼“婆婆”苏华的见证下，于1948年3月结成了真正的革命伴侣。

1948年3月至1949年6月，福建地下省委机关转移到南平、古田、建瓯一带，苏华和陈德义离开福州撤回省委机关，留下饶刚生一个人负责联络总站工作。饶刚生依靠福州党组织的力量，先后在鼓楼、台江、仓山、郊区（如北峰岭头、鹅峰村）等建立起几十个覆盖福州全域的地下联络站点，形成一条稳固的地下交通线，为迎接福州解放做好了准备。

1948年底的一天傍晚，饶刚生要把省委一批枪支通过闽江地下航线运往南平，通过刘秀英想办法联系林森官，完成交接护送任务。当时，敌人在闽江两岸戒备森严，到处是明岗暗哨，为了确保这批枪支安全送达南平，饶刚生带病亲临码头指挥。就在林森官的船只驶到第四码头，准备与闽江上游轮船公司地下支部交接时，被伪侦探

队特务盯上。饶刚生当机立断，示意在码头以卖饼为掩护的同志上前纠缠特务。特务气急败坏地推倒饼摊，饶刚生立即暗示早已埋伏在周围的其他同志向特务围拢过来，与特务死缠要求赔偿，以此拖延时间。此时运输船已经起航离开码头。由于饶刚生周密部署，赢得了时间，才顺利完成了枪支的交接。

“小秘密”诠释大情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饶刚生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他从不居功自傲，只是担任永泰一中名誉校长，并经常到校给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饶刚生之子饶振南的回忆文章，披露了一个“小秘密”。父亲生病离世后，几个子女在整理物件时，发现了一沓沓的欠条，加起来大几十张，每一张都清清楚楚地标明所欠金钱数额、物品、价格、用途、归还时间等，有的已还、有的还没来得及归还。而这些就自然成了子女们的“遗产”。

母亲后来告诉孩子们，来家里打欠条的都是曾经与父亲并肩战斗过的老地下党、接头户、五保户，现在有的身体不好，有的家庭贫困，有的亲人过世，生活都不好过，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多照顾他们。

这留下的不仅仅是“欠条”，更是红色的“纪念”。

廉介自持 明于政治

——屏南知县沈钟

禾 源

沈钟，号鹿坪，字毗陵，江苏武进县人，生卒不详。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中举人。乾隆元年（1736），由清流县调任屏南知县。任职三年，勤政为民，兴土木、重教育、劝农桑、移风易俗、编修县志。他离开屏南后，士绅以“廉介自持，明于政治”称赞，后被供奉于城隍庙。

勤力政务，兴建县署

清乾隆元年（1736），江苏武进县举人、清流县知县沈钟，受命调至刚从古田分治而出的屏南县任知县。陆路、水路风雨兼程，在古田水口草草过了大年初一，初二在别人过年的鞭炮声里从水口出发，到古田县衙接过印台后，乘着小轿沿羊肠小道，一路颠簸来到双溪。虽说屏南于雍

正十二年（1734）从古田分治，可首任县令由古田县令兼任，第二任县令不知道什么原因履职还不到半年。沈钟到县府驻地双溪，目之所及，只是一个小山村，县衙仅有一座空署茕茕孑立荒野中。清《屏南县志》这样记载：“是时，仅一空署，尚在野田荒草间，每夜猛虎聚于墙外，人烟寥寥，不过四五十灶，在西南一隅间。”虽说百废待兴，但是沈钟坦然面对，奋发图强，与随从租住民房，自理食宿。一边料理县务，一边抓好建设。当时条件十分艰辛，一个县令俸禄有限，只得省吃俭用，再加上当地贫穷，无商店客栈，许多随从都想离开这里。沈钟宽严相济，一边宽慰他们，只要勤政，事态会渐好，一边严教他们“食皇粮，忠皇事”，要忠于职守。他以身作则，边料理衙门事务，边躬亲督率兴建县城的各大工



屏南双溪古镇

程。为确保资金，发动县城乡绅捐助；为保质量，亲临工程监督，有时就住在工地。他在《治屏管见》中写道：“新县之民与旧县不同，当每事开诚布公，俾从有翕然从风之意，方可从容就理。”就这样，历时三年，城垣、衙置及馆、库、庙、阁 20 多项工程竣工。在建设中，城内坟墓全部搬迁。对一些无主坟，沈钟发动乡绅在北门和东门外各建义冢 1 处，这件事大得民心，后人称颂其“泽及枯骨，圣王之政”。

县城初成，沈钟用心图谋发展，向四处招来大量商贾和居民。双溪县城屋舍鳞次栉比，街衢纵横，有了县城气象。

沈钟在艰辛工作中，表现出负重前行的官德。他曾留诗：“新辟山城草昧初，民风朴拙吏迂疏。一经自课诸孙读，半亩亲教老仆锄。香案云

生吞印把，讼堂台绿上阶除。盘餐漫道无兼味，笋蕨春来食有余。”百姓们感恩其功德，有意忽略前两任知县，称其为开县县令。沈钟自己对此并不在意，正如他在《名宦》的序中写道：“当前之毁誉，何足荣辱？身后之名，盖棺定论。”他宠辱皆忘，充满乐观，一心一意勤于政务。他在寄亲友书信中这样写道：“每月坐堂听事，自在白云青霭中。只此一段清景，可洗俗吏胸中万斛尘。”沈钟悄然离开屏南后，士绅盛赞其“廉介自持，明于政治”，后还把他请入城隍庙中，侍为城隍之一。

劝农勤耕，鼓励垦荒

沈钟到屏南上任后，深入调查，察地理，悉



沈钟《屏南县志·物产》

人情，发现这里地未尽其材，百姓不尽其勤。他在《治屏管见》中写道：“屏南山高水冷，稻只一获，终岁所入仅足供民食，若别出产，以充赋，则益裕如。”“屏南习于懒惰，耕获之外，别无所事，每见冬成后，惟闭门向火，男女皆然，良可笑也。”

他倡议除种植水稻外，还可种植茶树、青靛、苧、麻，以增加收入。清《屏南县志》这样记载：“知县沈钟曰：倘后之宰斯邑者多方劝导，广种杂粮，并茶、竹、麻、靛之类，岁有万金之获，以供国课，庶几户有盖存，输将亦易，民不扰而官无累矣！”同时沈钟还发动改造冷水田，提高水温，增产稻谷，倡导改毛猪放养为圈养，囤积猪粪用于肥田，鼓励垦荒，免征三年赋税。沈钟为了倡导耕种，还在每年春耕伊始，前往县城东门二里许的桥边的田野扶犁耕作，以劝农耕，这座桥成为他重视农桑的见证，取名为“劝农桥”。

沈钟治理有方，倡导农桑的同时，还鼓励

发展家畜圈养，发展纺织，使民裕足。他说：“凡天地间物产皆民生日用所需，然辨其土宜，勤其树畜，撙节爱养之道要不可不讲求也。”“地甚寒，虽不宜种棉，然麻葛颇裕，若勤于织，绩以夏布一疋，易棉布一疋，尚属有余。”在他的倡导下，有的家庭妇女学起纺织，织成夏布，让男人挑到邻县的古田、宁德

等地去交换棉布。从此茶叶、靛青、麻等成了屏南农业的新兴产业。家庭畜牧业也不断地发展，有了“养猪过大年，养猪养鸭下蛋换油盐”的俚语。

沈钟还主持兴修县治近郊的两条灌溉水渠，修辟了县城双溪至龙溪、甘棠至梅花地的道路40华里，打通了与古田交通的要道。还为了解决山区缺医少药的难题，炮制了“寸金丹”为民治病。他在《治屏管见》中写道：“屏地素无医药，民间遇有疾病，但枕无措，予每岁多制寸金丹以饵之，颇有效。”

兴贤育才，教化于民

乾隆元年（1736）正月初三，他在古田接印受事，随即便有古田绅士来拜见，争取两县设一个考场，以一经通考，说：“古屏原属一邑，即通考亦何害？”沈钟带着古邑绅士的要求来到屏南。

当时屏南初设科考场，正值考试，两县生童



屏南县城隍庙

纷纷讦控，县城百姓哄然而起，各持锄耙等，数百人围绕县门，阻止考生移民。《屏南县志》中记载：“原额取进八名，初以县治新分，卷帙颇少，将古邑童生拨入考试，分作屏寄字号，各进四名。”沈钟觉得屏邑刚设治，一经通考确实不公平，同时古邑生童占屏邑名额确实不公。他一边安抚百姓与生童，一边迅即具文呈报府、省，终得批复，两县各设考场，才平息了这场因名额问题引发的纷争。沈钟曰：“当时是，势出万难，惟竭力挽回，为万全之计，稍一调剂不善，必至愤事，始信为吏之难也。今蒙督宪题定岁科两试，又迭蒙皇恩广额。”从此杜绝考生移民现象，为屏

南学子争得科考取第的机会。此后三年，屏南26名童生进取生员。后人评说，屏南文运之兴，自此开始。

沈钟以振兴文教为首念，他说：“凡庸民成俗，兴贤育才，莫重乎学校，所关甚巨……故下车后，即鼎新义学，延师督课，俾诸生诵习其间，行见敦诗说礼，与邹鲁同风，科名鹊起而已哉！”他这样说便是这样行，先建学宫，即圣人庙，又捐俸银500两创办义学，命名“双溪讲堂”，还为讲堂题诗联：“化雨遍疆，户习弦歌，会见人文蔚起；地灵当景，星联奎壁，应知山水增光。”义学建立，便延师执教，并制定讲堂宗旨，“崇实学、敦士品、端志趣、弘经济、正文体”，每月参与命题考课，谆谆不倦，还购置“经、史、子、集”57部，大兴尊师重教新风。讲堂开设10年，进举人、贡生6人，秀才10人。

义学建成，沈钟又兴建三台阁，以昭学风。后人勒碑铭记：“邑候沈公既力主分考，以为屏士上进之阶，又鼎建义学以为诸生肄业之地，复于后山构阁三楹，杰出云表，祀文帝于其上……公之所以造就我屏士与期望我屏士者，可谓无弗至矣！”他自己登台览胜，也留下了“富庶关心惟教者，春风弦诵夜如年”的诗句。

沈钟在屏南三年，兴贤育才，尊师重教，虽两袖清风，经济拮据，衣食多由地方绅民资助，却因城垣工程一事被诬陷，被撤职。好在百姓心中自有公论，屏南百姓为其立起功德碑记之，“敬竖碑铭以志不朽，亦使后之学者不忘所始云尔。”

梁思成手绘的福建古塔

乔 橦

是怎样的一座石塔吸引了中国近代建筑之父梁思成的关注，并为它亲手绘制了建筑画？是怎样的一座石塔让鲁迅在厦大教书时的外国同事用“简单雄壮”来形容它？又是怎样的一座石塔让一位德国人在梁思成、林徽因之前 20 年“捷足先登”？

福清龙江畔，这座古朴雄壮的水南塔在风雨中屹立了千年……

1

福清水南塔的手绘地图收录于《梁思成建筑画》这本书。许多中国古建筑爱好者因为这张手绘地图，认为梁思成曾到过福清亲眼看过水南塔。其实，这是个美丽的误会。手绘水南塔的契机，源于他的一位德国朋友、中国营造学社的外国社员——古斯塔夫·艾克。这张手绘图是梁思成根据艾克拍摄的水南塔照片手绘而成的，是目

前已知福建省唯一一座由梁思成手绘的古塔。

古斯塔夫·艾克何许人也？熟悉中国明代家具的人一定对这位德国人不陌生。他被誉为中国明式家具研究第一人。他的著作《中国花梨家具



梁思成手绘的水南塔



古斯塔夫·艾克拍摄的水南塔

图考》是近现代中国明式家具研究的开山之作。因为德国人的这本书，在世界范围内刮起了收藏中国古典家具的热潮，并不断扩展蔓延，让中国的古典家具文化得到了世界的关注，并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经久不衰。就连原籍福州的著名文物学家王世襄当年看见艾克出版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后，都大受震撼，感叹咱们自己的中国家具研究领域却被外国人“捷足先登”。

古斯塔夫·艾克（1896—1971），生于德

国，其母为伯爵之女，父为波恩大学神学教授。艾克在德国、法国各大学攻读美术史、哲学史，后游学欧洲各国，随后在包豪斯任教。1923年，艾克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受爱国侨领、厦门大学创建者陈嘉庚聘请来华任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叫“艾锷风”。这个时期他与鲁迅在厦大共事。1928年，艾克受聘进京，到清华大学教授德语，学生中最出名的就是攻读西洋文学系德文专修方向的季羨林。1935年，艾克转到辅仁大学任教，直至1948年辅仁大学迁校，离开了中国到檀香山艺术学院任职。

艾克在厦门大学执教时就开始研究福建石塔。他慕名来到福清，细细观赏了瑞云塔和水南塔，并拍下照片。居京后，他把研究成果给梁思成看，还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根据他提供的照片手绘了水南塔的建筑图。后来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两座福清宝塔，艾克写下了《福清二石塔》一文。梁思成看完后大受启发，将其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

2

那么，由德国人艾克在福清拍摄并经一代建筑宗师梁思成润笔后的水南塔到底是什么样的？

《福清二石塔》中记载：“为人们所不复记忆，而匿于深林丘壑间者，尚有水南塔巍然存在，距龙江约半英里，位于龙江桥之对面。塔后屏背的青山，在旭日初升的时候，映着点点的紫色。这红

色的石塔，正是精巧玲珑叶公塔的简单雄壮的祖先。”

“距龙江约半英里，位于龙江桥之对面”点出了水南塔的具体位置；“红色的石塔”，表明整座石塔由福建当地含铁量较高的花岗岩砌建，风化后塔身呈现红色；“简单雄壮”，是艾克与梁思成赋予水南塔最好的注解；“正是精巧玲珑叶公塔的简单雄壮的祖先”则点出了水南塔（始建于宋宣和元年，1119年）与瑞云塔（也叫叶公塔，建于明万历年间）之间的先后关系，即先有水南塔，后有瑞云塔。

水南塔又名龙山祝圣宝塔，具体位置在福州市龙江街道下梧村水南自然村，始建于宋宣和元年（1119）。建炎三年（1129）遇台风毁坏，绍兴十一年（1141）修复；明代曾重修。塔高20米，仿木构楼阁式用花岗岩砌建，七层八角，下有须弥座，转角用倚柱，柱头用斗拱出椽。第一层塔门口置两尊浮雕武士；一至四层塔腹系八角直筒空心室，室壁悬挑石级呈螺旋状，无雕饰；五至七层，塔内作八角空心室，圆形拱门顶。塔壁各面设佛龛，龛内各坐浮雕像一尊。经文物专家鉴定，此塔下四层为北宋建筑，上三层为南宋建筑，风格迥异。

在福清，已被世人熟知的瑞云塔有“大塔”之称，而“小塔”之称的水南塔却鲜有人知。但在艾克的描述中，“小塔”水南塔“值得赞美的乃是整个塔的建筑的观念”。在《福清二石塔》中，艾克写道：“瑞云塔的轮廓，虽然华丽玲珑，



水南塔塔身上的石雕

但缺乏整个的镇静的现象，而此小塔却是整个的创造。由基至顶都简朴非凡，无平座，无栏杆；除各角外无支柱，只有极大的石棉伸出，表示一种整个的协调，那是任何建筑物优劣最后的试验。”在艾克看来，水南塔让他看到了“中国历来木质楣式建筑，亦有适用于石作之可能”。

3

其实在德国人艾克1923年来到中国之前的1906—1909年间，另一位德国人曾在中国跨越14省，对中国的皇家建筑、寺庙、祠堂、宝塔等建筑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他被称为“早梁思成、林徽因20年，全面考察和记录中国古代建筑第一人”。他在1931年出版的著作《中国宝塔》中也对水南塔不吝夸奖。他就是德国建筑师、汉学家恩斯特·伯施曼。

伯施曼说，福清的两座宝塔均为石块砌筑，



水南塔底部石雕

工艺和装饰不同凡响。在伯施曼看来，这两座石塔是依照福州的宝塔（即白塔和乌塔）建造而成的。

“檐部有上下两层叠涩凸起，承托着起翘很小的轻薄檐面，上面的两层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构造。该塔不设回廊，向外伸出的悬臂架支撑着檐部，福州的宝塔中也有类似结构。两座塔几乎完全摒弃了大弧度的曲线线条。人们推测它们是依照福州的宝塔建造的。”通过伯施曼《中国宝塔》这本书中对水南塔的描述，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准确地抓住了水南塔塔檐的特点，即塔檐由上下两层叠涩凸起，承托起最上面一层出檐最长的石条。在今天靠近水南塔的时候，你会发现正是这种构造直接造成了石条因为长度和受力原因损毁最为严重。千年后的今天，即使水南塔的塔檐、塔刹、塔龙首棉都在岁月的洗礼中严重受损，但当阳光透过层层云雾柔和地洒在塔身时，“简单雄壮”的身姿之美还是让我们为之震撼，

也许这就是所有中国古建筑越被岁月打磨越不朽的共同点。

这位德国人显然还发现了“底部雕刻装饰带，此处为极小的人物塑像”。原来这是塔基今天仅存的两方壁画。其中一处壁画中雕刻着“头顶托物”的画面，这在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也有类似画面，是南海岛国国王的侍者“双手托举头顶举物”的高规格奉献礼节，奉献的是当地产出的旃檀香、珠贝等方物。文物和宗教美术史专家判定，从塔基现存的青石壁画可推测早在北宋时期，海丝文化已经影响渗透到了福清龙江地区。

有趣的是，在伯施曼的观点中，“水南塔角柱上端以悬臂架加固，这极似哥特式的建筑理念”。虽然今天看来，伯施曼的许多观点仍有着“自相矛盾”之处，但这也正好符合了那个时代下东西方文化碰撞带来的冲突和隐形的召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古建筑的不同角度。

从1909年伯施曼考察中国建筑归国之后，《中国宝塔》脱稿成文，直至1931年出版，当中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的爆发让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战前相比，东西方走得更近了。伯施曼自踏入东亚伊始，自始至终坚定地认为：东方民族，尤其是中国，与现代开化民族门第相当，并驾齐驱。通过对中国古建筑与宗教的研究，伯施曼得出了一个结论：亚欧所有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深深地相互影响着。

而水南塔，就是最好的证明。

把茶叶带到西方的荷兰人

孟丰敏

明朝，中国茶叶成为奇货可居的商品。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找不到茶树，于是渴望来中国进行茶叶贸易。但最早把茶叶带到西方的是荷兰人。荷兰对于福州茶港开埠起着重要影响。

1588年，荷兰联省共和国从西班牙独立出来，新成立了国家，在17世纪时国力达到鼎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霸主，被誉为“海上马车夫”。当时荷兰控制了印度利润丰厚的胡椒、丁香、肉豆蔻等香料贸易，且由于造船业非常发达，快速发展起海上贸易和远洋海军，使其贸易范围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远东和美洲。

1595年4月，荷兰商船从阿姆斯特丹出发，历经15个月，穿过好望角抵达爪哇岛西部万丹王国，带回了胡椒等货物。这是荷兰商船第一次到达远东贸易的胜利象征。他们于1597年8月回到荷兰，1599年再次前往东印度。船队带回的胡椒利润率高达400%。当时荷兰有14家贸易公司在竞争收购印度的胡椒等香料。

1601年，荷兰商船抵达濠镜澳，但正式向中

国进贡是在1655年。在荷兰心甘情愿向中国称臣纳贡前，荷兰与中国是如何交往的呢？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有商人团体在外国成立自己公司的国家。而且，这家公司日渐发展成为国家境外领土的代理人，并从此拉开了欧洲国家在海外发展殖民地的序幕。

1602年，荷兰成立了联合东印度公司（简称V.O.C），对股东实行有限责任制。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仅在马六甲、印度贸易，还渴望到中国来贸易，但明朝政府一直不愿开放台海两岸之间的自由通商。1601年，荷兰遣军以贸易为名，驾舰携炮直抵广州珠海的香山澳不成，转而盯上了台湾。1602年8月7日，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从马来半岛抵达台湾的澎湖，随后在闽南海商的帮助下，请求通商。

17世纪，中国的桑蚕丝是亚洲、欧洲市场都狂热追求的重要商品。天启二年（1622），为了和中国做生意，巴达维亚城的荷兰总督库恩任命雷理生为舰队司令官，率领8艘船共1024人，企图攻击澳门的葡萄牙人。由于战事不顺，雷理生

转向台湾，并请求福建当局通商，被拒绝。1622年10月17日，雷理生开始派船舰不断攻击厦门，胁迫明政府同意通商。明政府终于被迫同意，福建当局邀请雷理生使团来商谈。

1623年2月6日，雷理生从厦门来福州，于11日晚和福建巡抚商周祚洽谈通商事宜，回国后将此谈判过程写成日志发表。

雷理生使团走的几乎都是陆路，且是官道即铺驿，说明是按照官方指定的路线来，沿途走路、坐轿、骑马或搭船。从他们绘制的福建铺驿地图可见，当时福州的铺驿有两个，即城内的三山驿和城外石岳村（今淮安半岛）的芋原驿。

雷理生使团从福州南门进入，可见也和琉球贡使一样，坐船到了石岳渡后下船，在芋原驿休息后，由官兵护送入城。他们到达的日子正是初七，是福州人的行香日。雷理生使团从南门入城，看见城南人家潮流般涌入城中去寺庙行香，

街头更是人山人海在迎接玉皇大帝的神像，整个城市像沸腾了一般热闹。没几天，福州又庆祝元宵佳节。由于痛恨荷兰人攻击厦门的强盗行径，福建官员给予代表荷兰的雷理生使团的待遇不如几十年前的西班牙使团，不准其入城住宿，有时把他们安排到市郊的寺庙或某富豪私人别墅中过夜。雷理生因此看到了城内、城外的迥异风景与民间风俗。

雷理生与福建巡抚商周祚商谈的结果是承诺从澎湖撤退，却未得到与福建通商的机会。

1609年、1616年，日本的德川家康两次派遣船队侵犯台湾。1624年起，荷兰东印度公司侵占台湾南部长达38年，因此与日本发生了激烈的贸易冲突。

荷兰东印度公司和日本为了抢夺生丝和绸缎而明争暗斗。为了避免失去日本的茶叶市场，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与日本争夺福建的丝绸贸易市



场。当时管理福建市舶司的市舶府太监，为了暴利只派商人许心素独揽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的特权。荷兰东印度公司因此只能与许心素贸易。为了在福建购买物美价廉的商品，荷兰东印度公司不断贿赂市舶司的太监，希望中国开放商人自由贸易的权限，尤其能允许福建商人前往台湾大员贸易。但是为了保证生丝的高价，明朝廷禁止出口绢丝和绢丝品。

明朝海禁时期，福州是中国的唯一开放口岸，是琉球的进贡口岸。日本为了获得中国商品不得不依赖于琉球。琉球则从福州的柔远驿十间排（官方特许经营商户）购买中国商品。日本、琉球、荷兰都垂涎三尺的生丝主要来自福州，因为福州自宋代开始就是丝城，丝织水平位于全国前列。浙江产的优质蚕丝需运到福州加工成生丝，或织成绢丝品，浙江商人再来福州回购绢丝品。除此以外，福州、漳州等地都大量养蚕产丝。因此，福州本地有大量的生丝可销售。

荷兰东印度公司一筹莫展之际，郑芝龙海盗船队开始攻击福建沿海，沉重打击了独揽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外贸业务的许心素。福建官方答应，只要荷兰东印度公司协助剿灭郑芝龙，就同意中荷之间的自由贸易。谁知，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被郑芝龙的船队打败。此后，荷兰东印度公司以贸易之名，诱骗并扣留了郑芝龙，要求郑芝龙每年向荷兰提

供1400担生丝、4000锭白色绉绸、1000锭红色绉绸、5000担白糖。但是，郑芝龙与同伙李魁奇在福建沿海发生冲突，导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勒索计划化为泡影。

荷兰重视的商品是印度的胡椒等香料，还想不到茶叶能带来更大的利润。

看到荷兰因胡椒发家致富，英国为了抢夺胡椒市场，与荷兰之间发生了三次著名的英荷战争，三次英荷战争为英国带来了一次海上的“军事革命”，以及英国作为海权帝国的崛起与荷兰帝国的衰落。

第三次英荷战争中，由于英法联合对抗，荷兰东印度公司败北，但这并不影响荷兰的香料市场。英国能做的就是继续进口胡椒等香料，即使经济受损也要使劲阻止荷兰的垄断经营，并启动了对荷兰的全面挑战。英国不断进口胡椒，并



福州柔远驿

用便宜的生姜代替胡椒，成功打压了荷兰的胡椒市场。随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寻找新的商品市场，逐渐转型到印度棉织物、咖啡和中国的丝织品、茶等商品，开发了自己的贸易市场，并自1660年后迅速崛起成为最大的国际商业帝国。此后，一直到18、19世纪，市场基本被茶叶这一难以替代的新商品占领了。

1556年，葡萄牙神父加斯博克鲁兹到达中国时发现中国人喜欢喝茶，因此写书时专门介绍了这种饮料。但这没有引起葡萄牙商人的重视。最早把茶叶卖到欧洲的国家还是荷兰。1607年，荷兰商人从澳门运送茶叶到爪哇，又于1610年从日本平户运茶到爪哇再到欧洲。1619年，荷兰在万丹王国的港口城市雅加达设立据点。这是西方国家第一次从中国出口茶叶，也从此把中国茶叶推向了世界。

那时，荷兰人从澳门运到欧洲的茶叶是绿茶。苏格兰医学家、作家托马斯·舒特在其著作中写道：“欧洲人最初所订购的茶叶是绿茶，后来则改为订购武夷茶。”1611年，荷兰人在日本平户岛设立贸易商社做茶叶贸易被禁止，转而与中国开始贸易。

163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从中日运送大量茶叶回荷兰。17世纪30年代，饮茶风气在欧洲大陆扩散开来。当时，他们把茶称作“tsia”。

为了卖茶，荷兰政府组织专家研究茶叶，说明喝茶的好处，比如荷兰的邦迪尔斯医生是欧洲宣传推广茶叶的第一人，劝告人们每天至少要饮

茶8—10杯。荷兰化学家、生理学家荷尔蒙说：“茶有促进血液循环和清理肠胃的作用。”

1651—1652年，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分部首次拍卖茶叶。清顺治十二年（1655），荷兰作家J·尼尔霍夫随荷兰东印度公司出使中国，担任荷兰驻中国代表。他发表于17世纪中叶的作品中，介绍了广东政府招待外国使节的喝茶礼节和方法。他说当时广东人把茶叶煎煮到水剩下2/3时，加入1/4的热牛奶，再略加一点食盐后热饮。这种喝茶方法随之传到了欧洲。

166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被郑成功逐出台湾。但真正让荷兰东印度公司退出海上贸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其陈旧的经营体制、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西北欧相继诞生民主国家等。在这变革的时代，荷兰国内也发生了民主运动。1795年，法国革命家占领荷兰，建立了巴达维亚共和国，取代荷兰共和国。179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被迫结束了近200年的活动。

《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荷兰人曾在1612年时想登陆福建港口，并对沿海的渔民许诺，如果允许他们登陆，就和渔民做生意，保证渔民发财，还许诺当地官员帮助赶走占据台湾的日本人和葡萄牙人，还有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当时的菲律宾属于中国的附属国）。当这些条件无法诱惑渔民和官员时，荷兰商人就放了几炮威胁恐吓，结果无效，只好转道马六甲，继续他们的海盗抢劫行业，但抢劫的依旧是满载中国货物的船只。

清顺治十二年（1655），顺治帝敕书，同意

荷兰商船每8年来一次进行朝贡贸易，但荷兰模仿琉球，没有按照规定的期限来，都是找借口隔一两年就来朝贡一次，并积极进贡金叶表文。康熙看到进贡的一座自鸣钟，激动之下，同意把八年一贡改为五年一贡，而且贡道从广东改为福建的厦门。这个修改贡道的意见是荷兰提出的，理由是“以船入广东路近而险，福建路远而稳”。从此，荷兰的贡道都在厦门，直至乾隆时期。

1663年，荷兰人想攻占澳门、潮州为立足之地未遂。到了70年代，荷兰有4艘船只进入福州。英国东印度公司知道后非常生气，责备万丹总办事处没有报告这个重要情况，导致他们以为福州是难以开放的口岸。到了乾隆执政时，依然给予荷兰十分优厚的条件，尤其在春节庆典时赏赐了大量珍贵礼物给荷兰的国王、贡使、高级随员等。荷兰也借进贡的机会满载商品来广州交易，再购足中国的丝、茶叶、瓷器回国。乾隆知情后非但没有责备，还大笔一挥予以全船免税，包括船税也全免。

康熙二十五年（1686）荷兰进贡时，送上一把“蟠肠鸟枪”想震慑康熙。康熙吹牛说大清有的是，要送给荷兰贡使10把。《国朝省献类征初编·戴梓传》：“时荷兰来献蟠肠鸟枪。立命梓造十枪赐之。”大清的武器专家戴梓仿造出10把



荷兰驻福州领事馆旧址

“蟠肠鸟枪”，令荷兰贡使佩服得五体投地，丧失了再次试探的勇气，也不敢再肆无忌惮地跑去福州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使者随后也向康熙进贡他们研发的先进火炮。康熙又把高仿武器的任务交给戴梓。戴梓只用5天时间仿造出一样的武器，贡使惊愕得不敢再轻视大清的军事实力。

荷兰商人真正到达福州大规模开展贸易还是在清中叶五口通商后。清同治二年（1863），荷兰在仓山麦园路1号（今仓山影剧院）设荷兰驻福州领事馆，属于副领事级。影剧院前广场原为英商太兴洋行住宅。太兴洋行老板、英国商人高士威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开始署理荷兰驻福州领事职务；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式授荷兰驻福州领事，直至民国十九年（1930）其撤离福州。此间，太兴洋行馆舍一直作为荷兰驻福州领事馆使用。1955年，太兴洋行旧址建筑被拆除，仅余地基。

浮香之路

江梦笔

《十国春秋》载，后唐时，闽王王审知进贡到中原的贡品有象牙、犀角、珍珠和香药，闽王王延钧进贡有玳瑁、龙脑和麝、红髓；后晋时，闽王王继鹏进贡珍珠 20 斤、香药 1 万斤，闽王延曦时的贡品有饼香、沉香、煎香 600 斤，胡椒 600 斤，肉豆蔻 300 斤。在多种多样的贡品中，香料占了很大比重。这些香料是朝贡贸易中的重要交换物，它的意义不仅存在于权贵阶级的精神生活之中，甚至推动了一个时代融合的历程。这些香料背后我们能窥见一个闪亮的文明进程。

一、龙脑

东晋《搜神记·卷十八》载：“吴先主时，陆敬叔为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樟树，下数斧，忽有血出。树断，有物人面狗身，从树中出。”

这是三国时代建安的一棵怪力乱神的大樟树。世间万象，阴阳相依，一棵樟树可以掏出妖魔鬼怪，也可以掏出神圣之物——龙脑。在植物学家李时珍笔下，漳州是樟脑的主要产地，且樟脑类似“龙脑”。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卷三四·木部》“龙脑香”条记载：“樟脑出韶州、



樟脑

漳州，状似龙脑，色白如雪，樟树脂膏也。”

樟脑、樟脑丸，当我们的嗅觉敏感又失望地将龙脑的印象迅速滑向“卫生球”味道的时候，文化学者、专家给出了解释：此龙脑非彼樟脑，龙脑是一种左旋樟脑，是中国古代名贵的进口香料，“其香为百药之冠”。龙脑香科有 17 属约 600 多种植物，其中有一种能出产龙脑，这就是龙脑香树。它又称婆律香、婆律膏、羯布罗香，还有瑞龙脑、冰片脑、梅花脑、脑子等称呼。其气劲而烈，颇为提神醒脑。

在福建这片土地的历史上隐隐还可以找到龙脑的“暗遗留香”。《新五代史》《清异录》中记载了闽王王继鹏曾在佛像前焚烧了大量的香料，诸如龙脑、乳香等，在烟云弥漫中以求获得神灵的关注，求得大还丹。据载，王氏家族王审邽之

子王延彬，每次醉酒，苦不堪言之时，都会往身上倒几斗龙脑，色白如雪的龙脑如凉风消融了焦躁，驱散了不适，顿时心魂俱静，便可沉沉酣睡至第二日中午。

《诸蕃志》中列有专条，专门分析渤泥所出龙脑香的采集方式及种类：

脑之树如杉，生于深山穷谷中，经千百年支干不曾损动则**贖**有之；否则，脑随气泄。土人入山采脑，须数十为群，以木皮为衣，赍沙糊为粮，分路而去。遇脑树则以斧斫记，至十余株，然后截段均分，各以所得解作板段；随其板傍，横裂而成缝，脑出于缝中，劈而取之。

龙脑之珍贵，不仅在于它漂洋过海而来的艰辛，还因为有着一层神秘的色彩。龙脑藏于深山穷谷之中，其树高达四五十米。采脑时，人们成群结队，带足口粮，以木皮为衣，分路而出。遇到脑树，便静待黑夜降临，屏息凝神，倾听枝干间的声音，以确定那神秘的龙脑确实在树干中。在湿热潮闷的热带森林里，巨蟒盘栖在枝头，宝蓝色的夜幕中，月亮如血，龙脑在探头探脑间便伴随着极具震撼的呼啸声倒地。在史料文字的包浆中，龙脑的取香过程越发神秘，这种想象充满着无邪与天真，这样的珍宝最后也成为权贵阶层的私有之物。

可以看到一则史料：宋初，漳、泉留守陈洪进向赵宋王朝入贡乳香万斤、象牙 3000 斤、龙脑香 5 斤，以示修诚归降之心。在此，珍贵的香料

代表了一种秩序，一种权力的象征符号。

二、甲香

唐代《通典》中记载福建五州的土贡品种，其中有“甲香”。何为“甲香”？明代《闽中海错疏》载：“香螺，大如瓿，长数寸，其掩杂众香烧之，使益芳。独烧则臭。诸螺之中此螺味最厚，本草谓之甲香。”《新唐书》中载此为广州所产，但在福建沿海产量也十分丰富。宋朝《证类本草》的记载甚为详细，“甲香味咸，平，无毒。主心腹满痛，气急，止痢，下淋。生南海。唐本注云：蠹大如小拳，青黄色，长四五寸，取烧灰用之。南人亦煮其肉啖，亦无损益。图经曰：甲香，生南海，今岭外、闽中近海州郡及明州皆有之。海蠹音螺之掩也”。由此看出，甲香是一种甲壳之香，这是一种从腹足纲软体动物的厣中所提炼出的一种芳香剂。

甲香是一种世界性的香料。薛爱华先生的《唐代舶来品研究》称唐代甲香为“‘半’外来之物”，贡献甲香的城市有安南的陆州。在《宋会



甲香

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中，专司海外贸易的市舶司送至京师的物品中就有甲香。

大多数熏香是由木头、树脂和树液组成的，它们浑身散发着一股甜味或花香，而作为一种动物性香料，究竟何味？南朝的范晔在《和香方》中提出“甲香浅俗”。试想，香螺的角质螺厣，燃烧起来是什么味道？是一种类似厚重的肉味烧焦后挥发的味道？是碳酸钙掺杂角质蛋白或甲壳质的味道？抑或是药香、皮革香？顿时，《闽中海错疏》中提出的那种“独烧其臭”的味道，涌入了我们空泛的想象中。由于这种特性，历史上的甲香多用作调制口脂、面脂，或用作合香，合香时需要通过和其他香料如檀香、沉香混合或经过特别炼制才能散发出芳香。这种混合物又被称为“甲煎”。

苏东坡曾有诗《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诗曰（摘句）：

旃檀婆律海外芬，西山老脐柏所薰。
香螺脱厣来相群，能结缥缈风中云。
一灯如萤起微焚，何时度惊缪篆纹。
缭绕无穷合复分，绵绵浮空散氤氲。

这放于银质犹香盘中的便是由龙脑香、檀香、麝香与黄柏一同熏制，最后再由甲香调和的一款甲煎香。从诗中能感受到香螺所贡献的甲壳之香，其性坚，其质厚实，一缕浅淡的青白色的烟升了起来，心动如微澜，而后，轻烟又化作袅袅之姿，缓缓地，不知所踪，只剩点燃的香头如豆，明灭着。

在《新唐书》中，福建土贡的甲香仅仅只有5斤。后晋时，闽地曾有少量的煎甲香作为贡品进贡到中原，足见其香珍贵。

三、龙涎香

龙涎香，究竟是什么香料？“龙涎”二字，在汉语中其义铿锵，其物难得，为帝王独享之物。传说是深海处的龙枕石而睡时，不小心滴落的“涎沫”，经日月流转，又经鲛人之手，才让世人获得此宝。比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其珍贵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嘉靖十八年（1539），因醮坛之需，嘉靖命户部采购龙涎香。但三年过去了，并无所获，嘉靖大发其怒，倾举国之力在四海之内搜罗龙涎香，“上谕户部，龙涎香十余年不进……户部覆请差官驰至福建广东会同原委官于沿海番舶可通之地多方寻访，勿惜高价……”嘉靖三十六年（1557）七月，福建地方官员进贡龙涎香十六两。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福建布政司进龙涎香十八两”。次年（1563）四月，“福建抚臣进龙涎香八两”。八月，“福建抚臣进龙涎香五两”。这“八两”“五两”的精确计量，更是展现着龙涎香的珍贵。

因在阿拉伯语中龙涎香的发音为“ambar”，故在中国古代将其译为“阿末”香。在晚唐的《酉阳杂俎》中就出现了关于龙涎香的记载：“拨拨力国，在西南海中，不食五谷，食肉而已。常

针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食。无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妇人洁白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

拨拨力国在今非洲索马里北部亚丁湾南岸，为古代东西方交通线上重要港口所在。到南宋时期赵汝适所著的《诸蕃志》才开始称其为“龙涎香”。

由于龙涎香的珍贵，凡人难以窥探具体采集过程，阿拉伯商人对此更是秘而不宣。《岭外代答》“龙涎条”载：“大食西海多龙，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积而能坚。鲛人采之以为至宝。新者色白，稍久则紫，甚久则黑。”宋人张世南《游宦纪闻》又有记录，教人如何取龙涎。首先寻得“近海傍有云起罩山间”，即知有龙睡其下，接着能做的事便是等待，或半载，或两三载，待云起散去，便知龙已去，“往观必得龙涎”。如果龙之吐涎，鱼聚而嚼之，那么从鱼腹中还可以取得此香。在《增补本草纲目》中认为这种从大鱼腹中获得的龙涎，不如大洋中所产的品质佳，且“闽粤货售者多”。

事实上，龙涎香本身没有特殊香气，反而有一丝鱼腥之气，燃烧后，其香馥郁，数日不散，其功能除了入药，主要用于定香聚烟。《岭外代答》记载，用龙涎所制作的香，燃烧后翠烟浮空，结而不散，宾客们还可以用剪刀剪断烟丝，从中分出数缕。

现代研究显示，龙涎来自抹香鲸误食乌贼骨等难以消化的物质，为愈合伤口，肠胃分泌病态

蜡状物，类似结石，其密度轻，排出体外后，浮于海面，经风吹日晒与海水的氧化，变成块状香料。中国龙涎香多是由大食商人贸易带来的，但是据研究，大食商人也是“中间商”，龙涎香多数产于温暖的印度洋海域，靠近尼科巴群岛等地，大食商人与岛上土著人交换到龙涎香，又转手卖到中国。

1974年泉州湾后诸港出土的宋代海船中，在第二、三、五、六、九、十、十三等舱近底部曾发现黄色沉渣，经鉴定，为小块状与碎散状的龙涎香，色灰白，嗅之，尚有一些带腥味的香气。

四、从香料乌托邦到海上浮香之路

从龙脑到龙涎，香料是朝贡贸易中的重要交换物。晚唐时，许多文学作品已经赋予舶来品与贡物极大的传奇色彩，民国学者吴经熊认为“我们看到已经不再是一个现实的世界……世界淹没在了无边无际、朦朦胧胧的海洋之中，留下来的只有‘一缕香魂’”。香料背后是商业、航海、军事、政治格局的变迁，它们推动着历史的进程。

五代十国之时，甲香、龙脑与其他珍贵的香料已不断出现在朝贡的名单上。宋代，各种香料以更强势丰富的姿态进入宋人的生活。大宋以“硬通货”的丝绸、瓷器，换来了大批香料，龙脑与来自真腊的沉水香、安息香，阇婆的檀香、茴香，古里佛的胡椒、蔷薇水、乳香，细兰的粗细香，朋加刺的丁香，东非索马里的龙涎香，大



食的乳香、没药、苏合香等，乘着季风与洋流，随着番舶贾客，浮海而来。这条海路也因此而被唤作“香料之路”。

福建是香料之路上的重要贸易点。1974年从泉州湾后诸港出土的宋代海船再现了宋代福建海上香料贸易的辉煌。从这艘运货船出土的香料木总重量（未经完全脱水）达4700斤，经初步鉴定，有降真香、檀香、乳香、龙涎香等多种香药。

宋室南迁之后，西外宗正司、南外宗正司分别设于福州与泉州，庞大的宗室群体成了香料的巨大消费群体，一张巨大的贸易网缓缓铺开。有人来组织收割、加工和运输，层层接力，把货品倒卖到中国。于是，不同的人聚集起来，在茫茫的海上，他们要依靠精确的近乎奇迹般的航线图、地理学、几何学、星象，运用天然磁石能力，甚至玄学来抵御各种风险，也许还要经过神秘的渠道，跨越异教徒的土地。当热带海洋上的独桅帆船出现在中国港口的时候，它们也因此记录了一段有意义的历史，关于文化传播，关于思想或审美的兼容，关于航海技术进步，甚至关于全球贸易化。

明成化十年（1474），市舶司由泉州迁至福州，外国贡船群向福州集泊，当年设立的进贡厂中包括香料、硫黄进贡厂8所，加工改制工场20间。成化至嘉靖年间，许多香药散布在福州。福州市舶司负责点验勘合琉球贡舶，琉球国遣华使中特设进香使。《闽书》记载了南洋诸国进献的诸多香药。

全球的陆地通过海上通道连接起来，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在他们的嗅觉里，所有的香都蕴含着黄金的味道。此时，在世界的海洋上正开启了与香料相连的宏大历史进程。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纪》里记载：

在福州……印度商人带着各种奇珍异宝，来这里出售，获得巨大利益……刺桐（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商人们租船运货，对于上等商品，须付该货价值的百分之三十的运费，胡椒却须付百分之四十四的运费。对于檀香木、其他药材以及一般商品，运费是百分之四十。据商人们计算，他们的花费，包括关税、运费在内，总共达到货物价值的一半。然而，就是从这余下的一半中，他们也能取得很大的利润，所以他们常常能够用更多的货物，回销到原来的市场。

中国口岸涌来了各种香，迷人的香味中包裹着危险也包裹着希望。随着贸易的船只连帆而来，辛凉的龙脑、沉静的龙涎，还有被喻为圣经之香的乳香等，不断汇集在一起，与众香浮海而来的外国商客从中国这片土地上获得巨大的利益。不同的文明在此开放与融合，促进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华地向城中尽，外国云从岛上来”“南来海舶浮云涛，上有游子千金豪”，香气散尽后，只有诗句在悄悄地泛出光阴的痕迹，让人窥见历史针脚上生动的细节。



隐元禅师东渡之旅

胡沧泽

1

隐元，名隆琦，俗姓林，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万安乡灵得里东林村（今福建省福清市上迳镇东林村）的一个林姓农家，在家中排行第三，名曾曷。万历四十八年（1620），林曾曷在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剃度出家，法号隐元，法名隆琦。隐元学习刻苦，精研佛教大乘经典《楞严经》和《涅槃经》，严持戒律，勤修禅定，有很深的造诣。同时由于他经常云游参访，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因此闻名遐迩，在佛教界声望日高。崇祯九年（1636），隐元禅师在鉴源、慧隐之后，继任黄檗山万福寺法座，成为临济宗三十二世。此后，他督理黄檗山万福寺前后两次达17年之久，门下之盛，当时无与伦比。他的名字，不但在国内盛传，而且也传到住在长崎的中国僧人中间，甚至他在中国开



隐元禅师像

印的语录，也传到日本，被传诵。

明朝末年，在日本长崎有由中国僧人发起兴建的兴福寺、福济寺和崇福寺，即所谓的“唐三寺”。当时，“唐三寺”之一兴福寺住持逸然长老久闻隐元的盛名，便想把他请到日本来弘传佛法。经日本德川幕府的许可，清顺治九年（1652）四月，逸然发出邀请隐元禅师赴日弘法的第一次信函，由当时来往于长崎、福建之间的“福州”号船主何素如居士亲自送至福清黄檗山。

这时，隐元已年过花甲，便以年老、路远为由，婉言谢绝了邀请。他抄录了自己平时随手所作的诗偈、语录等交给何素如居士，请他带给逸然，表示谢意。可是，逸然长老看到诗偈后，求贤之心愈切，接二连三又派弟子古石、自恕等，带着邀请书和钱物，恳请隐元一定要赴日弘法，隐元深受感动。

在兴福寺逸然长老邀请隐元禅师赴日弘法之前一年，曾发生一件事，使隐元禅师的心境久久无法平静。那是清顺治八年（1651），长崎“唐三寺”之一的崇福寺邀请隐元的弟子也懒赴日。可是，也懒在赴日途中，船遇风浪，不幸溺死，未能实现愿望。消息传来，隐元悲痛万分。因此，到清顺治十年（1653）十一月，当隐元接到第四次恳切邀请时，便终于答应下来，在写给本师费隐的信中说道：“然日本所请，原为也懒弗

果，有负其命，故再请于某，似乎子债父还也。”他要去传法，为弟子“还债”。

隐元不顾黄檗山万福寺僧众的一再挽留，将法席让给弟子慧门，毅然决定东渡。清顺治十一年（1654）五月初，他从黄檗山出发，六月初到达厦门，六月二十一日率领弟子慧林一行，乘坐郑成功属下的船只从厦门扬帆出航日本，七月初抵日本长崎。

2

隐元禅师赴日的目的是弘扬佛法，可是，为什么会有人认为隐元赴日是为郑成功的反清复明向日本借兵的呢？这问题主要是由于郑成功“拨船护送”隐元赴日而产生的。

当时福建至日本长崎的海上交通线，主要由郑成功及其部属所控制，隐元禅师东渡日本搭乘郑成功的船只本身并不是件奇怪的事。而郑成功出于对声望很高的隐元禅师的敬重，让他搭乘自己属下的船只赴日，也并不是一件难以办到的事。

隐元禅师在厦门是不是接受了郑成功的秘密使命呢？根据隐元弟子独耀性日所编的隐元年谱记载，隐元在顺治十一年（1654）五月初离开福清黄



福清黄檗山万福寺

檗山万福寺后，五月二十日至泉州，六月初至中左（厦门），寓仙岩，“藩主送斋金为供”，而后“藩主备舟护送”。隐元的另一位弟子南源性派所编的年谱也记载说，“国姓公备斋金送仙岩”，而后“拨舟相送”。“藩主”“国姓公”均指郑成功。根据以上记载，可知在厦门，郑成功是把隐元禅师当作德高望重的高僧而予以优厚礼遇的，并且从敬重佛教的角度出发，“送斋金为供”。

从史料中可知，隐元与郑成功并未直接见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秘密往来。隐元与郑成功的关系是高僧法师与佛教信仰者的关系。高僧法师要出国弘法，有能力的信仰者当然要尽自己的能力予以支持。

隐元赴日是否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特殊使命，还应该具体看看当时郑成功有没有向日本借兵的需要和行动。

清顺治八年（1651），郑成功攻克福建漳浦，军势大振，敌军多来归附，正在担心器械未备、粮饷不足时，参谋冯澄世建议：“方今粮饷充足，铅铜广多，莫如日本，故日本每垂涎中国……且借彼地彼粮，以济吾国，然后下贩吕宋、暹罗、交趾等国，源源不绝，则粮饷足而进取易矣。成功是之。”郑成功采纳了冯澄世的建议，遣使通好日本，从日本获得物资，卖给吕宋、暹罗、交趾等国，通过海外贸易，补军饷和政费的不足。郑成功与日本的关系主要是从事经济贸易活动的关系，丝毫没有提到借兵的事。而且从冯澄世的话中可知，他们对日本还是保持相

当的警觉，认为日本仗着粮饷充足、铅铜广多，“每垂涎中国”，因此生戒备之心，而轻言向日本借兵，必无可能。

认为郑成功向日本借兵、“乞师”的根据主要有《华夷变态》中所录的“郑成功启日本文”，兹摘抄如下：

钦命总督南北直省水陆军兼理粮饷节制勋镇，踢蟒玉尚方剑便宜行事挂招讨大将军印总统使国姓成功顿首拜，启上，日本国上将军麾下。……文谐丹府，屡有表使至金台；释辅儒宗，再见元公参黄檗。虽共临乎复载，还独莫其山河。

成功生于日出，长而云从。一身系天下安危，百战占师中贞吉。……马嘶塞外，肃慎不数余凶；虏在目中，女真几无剩孽。缘征伐未息，致玉帛久疏。仰止高山，宛寿安之有望；溯回秋水，怅沧海之太长！敬勒尺函，稍伸丹悃，爰赍币筐，用缔缡交。旧好可敦，曾无赵居任于今复往，明兴伊迹，敢望僧桂悟如昔重来。文难悉情，言不尽意，伏祈监照。无任翘瞻，成功再拜。

综观整篇书信，郑成功致日本幕府的内容主要是为与日本敦睦旧好、加强联系。全信未见有任何“借兵”“乞师”的字句。至于信中提到的“元公参黄檗”，是指日本幕府元老参访隐元。隐元在日本传法影响不断扩大，郑成功因“拨船护送”隐元赴日，尽了自己的一份心意，通过这事来拉近与日本幕府的距离，也是书信中常用的一



隐元禅师书法

郑成功汇报在日本借兵活动的详细情况。然而，他没有回来。他在写信给故山僧俗的信中明确表达自己要开创新黄檗的坚定意志：

一言既许，千驷莫追，故知与日域法缘不苟，诚有定数存焉。今既承领开创新黄檗，衲侣莫不忻庆，王臣弥固金汤。俟开创后，有负命汉子，可托大事，再唱还乡曲，愈见好听。吾平生不愧初念，自有全始全终之事。

既然郑成功没有向日本借兵的需求，那么，所谓隐元赴日是负有为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特殊使命的说法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

3

种联络感情的写法。而在日本，却有人对此信讹传附会，借题发挥，编出了郑成功此次遣使是向日本借兵的故事。

郑成功此信写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当时他正在厦门筑演武亭，选练兵将，广招贤才，准备大举北伐。郑军兵多将广，声势浩大，根本没有必要向日本借兵。他所以要写信给日本，一方面主要是出于叙叙旧情以交旧好的目的，另一方面也防止日本与清廷勾结，共同镇压反清复明的军事武装力量。

隐元在日本声名鹊起，信仰的人越来越多，福建黄檗山的住持及僧众发信恳求他早日归国，维持祖庭。如果说，隐元负有为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使命，他完全可以以此为理由回国述命，向

清顺治十一年（1654）七月五日，经过十多天与惊涛骇浪搏击的艰苦航行，隐元一行终于到达长崎。隐元上岸时，受到以“唐三寺”僧众为首的各地僧众的热烈欢迎和顶礼膜拜。逸然长老邀请隐元在兴福寺讲法。七月十八日，是隐元开堂讲法的第一天，他讲演的题目是《生命之流——业与轮回》，听众之多，场面之盛，空前未有。

隐元在长崎住持兴福、崇福两禅寺，弘法一年多，留下了《住日本国西海道肥前州东明山兴福禅寺语录》《肥前州长崎圣寿山崇福禅寺语录》两大珍贵的语录，向广大中、日信众宣传自己的思想，影响不断扩大。

清顺治十二年（1655），隐元应日僧龙溪的邀请，到摄州普门寺（今大阪府高槻市富田丁）演讲，又引起很大的轰动，皈依他门下的僧徒日益增多。值得一提的是前京都所司代板仓重宗（1586—1656）。京都所司代是德川幕府时管理京都一带的最高行政官员，板仓重宗会见隐元，深为隐元的坦荡胸怀和渊博佛学所折服，决心尽力护法，便皈依三宝为佛弟子，隐元为之取名曰性空，字独真。板仓重宗的皈依，有利于黄檗宗在京都大阪这一日本的核心地带向民间的传播。

清顺治十五年（1658），隐元禅师率领弟子到京都，受到很高的礼遇。他为所到寺院僧侣写了大量赞偈法语，重刻了密云、费隐等禅师的《全录》，继续大力宣扬黄檗宗风，日本后水尾法皇、公卿以及很多贵族官僚，都皈依了隐元。

这年九月，隐元一行到达江户（今东京），晋谒将军德川家纲，接受大老酒井忠胜等的皈依。第二年，日本皇室决定在宇治的醍醐山麓赐地1万坪建寺供养隐元大师。

清顺治十八年（1661），在宇治的新寺建成。新寺的建筑完全仿照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为了不忘本源，隐元将新寺仍命名为“黄檗山万福寺”，中国的黄檗禅宗正式在日本生根，隐元成为



宇治黄檗山万福寺

黄檗宗的宗祖。

清康熙三年（1664），隐元主持日本黄檗山万福寺三年之后，将法席让给弟子木庵，自己退居松隐堂，时年73岁。退隐后，隐元经常接见参谒者，接受其他寺院的邀请前往讲法，并大量著书立说，出版了《松隐集》《松隐二集》《松堂新集》《松堂续集》《松隐老人随录》等大量佛教禅学著作，宣传佛教、弘扬黄檗禅风。

日本为什么能容许隐元在日本传教？这与日本当时的国内情况关系密切。

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1603），德川家康被日本皇室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今东京）设立德川幕府，开启了日本德川幕府当政的时代，德川幕府成了日本实际的政权机构。到了隐元赴日时，正值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当政。这时，日本幕府实行半个多世纪的统治，社会已趋

于稳定，统治者的统治政策已由武功为主转向文治为主，开始重视文化建设。隐元等僧人代表的是新鲜的中国文化，而这与历来善于吸收中国文化的日本统治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一脉相承。同时，隐元的到来是与当时中日民间贸易的兴盛联系在一起。中国商人所进行的贸易，他们所带来的丝绸、陶瓷、书籍，极大地丰富了日本社会自上层贵族至下层平民百姓的兴趣和需要。因此，日本允许隐元传教，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上层支持。

隐元到日本后，与后水尾法皇关系密切。后水尾法皇在日本长庆十六年（1611）16岁时即天皇位，宽永六年（1629）让位，庆安四年（1651）在京都相国寺剃发出家，故称法皇。后水尾法皇在日本皇室中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对隐元尊皇的思想很欣赏，并支持和鼓励隐元在日本弘法。宽文六年（1666），法皇将珍藏的五颗佛牙舍利赐给黄檗山，还赐金建造舍利塔、赠镂金砚匣等。

清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二日，隐元逝世的前一天，后水尾法皇特赐隐元以“大光普照国师”的尊号，这成为以后日本皇室遵循执行的惯例。后来日本历代天皇相继追赠隐元“佛慈广鉴国师”“径山首出国师”“真空大师”等称号。

隐元所创立的黄檗禅宗，后来发展成为日本佛教的一大宗派。日本黄檗宗在最盛时有寺院1100所，33个塔头，僧俗信徒25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5。日本黄檗山万福寺法席传至今

天已经58代，隐元禅师开创之功不可没。

隐元上承临济宗法系，作为临济宗第三十二传，秉承临济宗刚健的气质和严密的风格，同时又强调要重视传承，严持戒律，注重僧众威仪。这在日本佛教界无疑是一股新风。

隐元主张在修禅的同时还应念佛。黄檗山万福寺众僧念经用汉音，举行法会演奏时用中国法器，完全依中国明代禅寺的规矩，显示了其庄严、隆重、清净的特色。这种中规中矩的念佛法，有利于在其信徒中克服戒律松弛的弊端，建立佛法的权威。

隐元对儒家学说的尊崇和兼收并蓄也是黄檗宗能在日本传播的重要原因。他强调：“知儒方可入佛，入佛而后通儒。”隐元对孔子是很尊崇的，他在对孔子的题赞中写道：“天地既分，三才已判。空空如也，吾道以贯。博约卷收，文章显焕。一声木铎响中华，堪作千秋之模范。”认为孔子是“千秋之模范”。

隐元重视父母的养育之恩，他在《中元叹》诗中写道：“摇落空林皈无根，忽闻特地怀深恩。江山有限情无限，草木虽存谊亦存。莫报劬劳空自叹，号天罔极向谁言。聊宣半偈含悲怆，字字淋漓带血痕。”表达了对父母的深切怀念之情。中元节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佛教要举行盂兰盆会，出家僧人会举行系列的法事仪式，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这与中国崇尚孝道的伦理传统相符。

隐元禅师赴日，创立黄檗宗，对日本德州幕

府时代的宗教产生了重大影响，国民精神为之一新。隐元师徒的传法和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对日本的建筑、雕塑、印刷、医学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也产生很大影响。

在建筑方面，隐元以明朝的寺院样式建造日本宇治的黄檗山万福寺，由总门经山门至天王殿、大雄宝殿，浑然一体，既雄伟壮观又典雅清丽，在日本的寺院建筑中独树一帜，并影响了日本其他寺院的建筑。隐元弟子木庵住持万福寺期间，在江户建瑞圣寺。随同隐元以及在隐元前后前往日本从事建筑寺庙的工匠将中国的建筑技术乃至建筑材料、建筑构件带往日本，促进了日本建筑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在雕塑方面，宇治黄檗寺以及黄檗宗各寺安置的佛像，多出自中国雕工之手。这些雕工又称唐风佛工，所雕佛像工法娴熟，仪容端正，栩栩如生。著名的有方三官、林高龙、吴真君和范道生。范道生最为杰出，福建泉州人，造出的大士及十八罗汉祖师伽蓝的佛像奇拔豪快，雄浑生动，令众人叹为观止。

在印刷事业方面，隐元法孙铁眼道光（1630—1682）刊印出以明万历版《大藏经》为底本的日本第一部大藏经，称《黄檗版大藏经》或《铁眼版大藏经》，收佛经 1161 部 7334 卷。版本今仍存万福寺。黄檗版大藏经收集佛经丰富，在日本大藏经编纂史上有重要地位。黄檗山还重视佛教的大众宣传，黄檗各寺印有“观音图”“阿弥陀像”“十罗刹”“不动明王”“五百罗汉”

等各种佛像的印刷品，印刷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佛教的传播。

在医学方面，隐元的弟子独立，原是个学者，以 58 岁高龄来到日本拜隐元为师，对诗文、翰墨、篆刻、医道无一不通，尤其是医术最为精通。他将自己的医术传给池田正直、高天漪、北山道长等人。池田正直是其在医学方面的第一高足，所传有生理、病理图 7 种，医书 6 部 9 卷，其中以解说《痘科键》最为有名，池田氏因而名声远播。宽政年间（1789—1800）幕府医官始设痘科，由正直之孙瑞仙担任此职。除独立外，化外、心越、澄一等僧人也都通晓医术，并把医术传给后人。

隐元东渡日本，还带去了很多植物新品种，今传有“隐元豆”“隐元莲”“隐元菜”“隐元豇豆”等。黄檗禅僧日常所吃的“唐式点心”“胡麻豆腐”“隐元豆腐”“黄檗馒头”等也传入日本，为日本人士所习用。按照中国方式，主客围桌共同饮食的“净素持斋”（日语称“普茶料理”）也对日本的烹调法和会餐方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隐元禅师东渡日本是明末清初中日民间交流的一部分，进一步促进和扩大了明末清初中日民间交流，隐元禅师的业绩，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与天地共久长。正如他在 80 岁自题中所云：

单提柳栗上扶桑，惹得满头尽雪霜。
两眼圆明净法界，半身独露愈风光。
阐扬先圣拈花旨，点醒后昆大梦场。
永挂松堂伴梅竹，从教地久与天长。

半岛风情

吴安钦

看礁看船看渔排，有鱼有虾真精彩。

船去船来蟹贝鲜，一路风景一路海。

出连江县城十里，有一条通港大道，径直通向黄岐半岛。这通港大道就是环海大道，它把半岛黄岐湾、定海湾、罗源湾和可门口“三湾一口”数十处美景及其历史人物联系了起来。徜徉在这条宽敞大道上，尽可欣赏连江海上风光和海

峡两岸的渔乡风情，还能一路饕餮半岛独有的海鲜风味。

定海湾

从环海路入官岭村，便有一艘巨轮映入眼帘。这艘泊在岸边的大船上的“定海湾”三个大字引人眼球。伫立船头，凭栏而眺，可看到船底下沙滩和沙滩外的浩瀚大海，还有沙滩上的风景。这是定海湾的品牌——山海运动小镇。定海村是定海湾的中心村。这是个有故事有风景的千年古村。早在宋朝，定海就设有千户所，是抗倭前沿阵地。它三面皆海。海湾水阔港深，辽远空旷，东西南北水道皆通，福州港、闽江口、敖江口、黄岐湾，与其相连的台湾海峡和东海，四通八达，战略位置极其



定海湾

重要。早在唐宋时期，这里就是一处繁荣的海上贸易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海湾里挖掘出的数十艘古沉船与所载 2000 多件唐、元、宋朝的瓷器、铁器、铜钱，与定海村如今尚存的修旧如旧的古城墙和城门，足以证明当年此地的繁华之盛和防守之重。湾内海岸曲折，明屿暗礁，桅樯帆影，浪飞鸥翔，与“十岛神姿”“牛台夜月”“九龙聚会”“金线葫芦”“五燕投窝”，以及十三滩、三十六礁等构成了定海湾天然海景，堪称“海上画廊”。连江县第一部电视剧《风吹定海湾》便是就地拍摄。一首由赵秀兰演唱的主题歌《定海湾之歌》一时唱响八闽大地。

定海湾为何在靠近官岭之处竖起了大招牌？原来与一个人物有关。这个人就是我国第一位音韵学家陈第。作为军事家的陈第因向戚继光献抗倭之策，被赏识重用。他曾数度渡船至台湾岛考察军事，并写下《琉球传》，是历史上第一位详细记录台湾风土人情的学者。一次，他随船队出航琉球时，途中狂风大作、巨浪滔天。不大的船只在浪涡中颠簸，他担心船员丧失信心，便勇立船头，意气豪迈地唱起自编的《泛海歌》：

水亦陆兮，舟亦屋兮；

与其兮而弃之，何择于山之足海兮！

如今，每当渔家人在洋面突遇大风大浪时，便会想起陈第的这首歌。歌声一起，令人气宇轩昂，信心顿增。

陈第出生于县城，长眠在官岭山上。他一生胸怀大海，心恋台湾……

黄 岐 湾

到了官坞，算是跨入黄岐湾。

与定海湾比，黄岐湾像内海，风小浪平，即便有风浪也只是碧波涟漪，绿水微漾。

先说官坞吧。官坞是全国生态文明村，码头是彩色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白天，像一条彩带，把渔村装扮得分外妖娆；夜间，灯火和渔火，闪闪烁烁，恍若天上的彩虹落到海里，斑斓艳丽。一条桥梁似的栈道直通海湾。蓝色海面上，除了亮晶晶的海水就是一行行如诗行如音符的渔排，亮丽壮观。渔排也是彩色的，一粒粒或圆形或椭圆形的多彩浮球把鱼拢在一张张渔网里。这不是一般的鱼，而是鲍鱼、竹荚鱼和海参等名贵海产。此外，便是季节性的一条条赤褐色的海带。官坞村的“渔夫岛”楼盘，如今已吸引不少城里人入住，看海观涛品海味。这个全国十大魅力乡村已然成为黄岐湾一道别样的风景。

远远望去，这片海域内，有一艘航母似的巨轮十分抢眼，让人都想一睹为快。这不是舰艇，而是“振渔一号”新型智能渔排。它底下养殖有 5 万多吨的海鲜，各色鲍鱼、海参、大黄鱼等鱼虾应有尽有。它的特别之处在于，不仅养鱼，渔排平台上还建有酒店似的厨房、餐厅和宾馆一样的客房，茶座更别说了。有人形象地把它说成是“海上会客厅”。尤其是夏天，登上这艘大船，不仅可观赏和品尝渔网里的海鲜，还能领略东海

之滨的海上风光。海风吹拂，涛声潺潺，鱼虾跳跃，还有天上飞翔的海鸥与海上作业的渔船，这是真正的海上连江。

黄岐的畚箕山和望乡亭，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后沙滩的沙、大建湾的渔排、烟囱顶上的灯塔、海港里的渔轮，还有黄岐海特有的龟足，都是人们所熟悉的。近年，一个以石头著称的古石村声名鹊起。古石村90多座古厝全为乱毛石墙。

“波绿山青芹壁近，琳琅民房石砌成。烟锁雾绕海天阔，风光旖旎留美名。”这首诗是古石村的真实写照。村里有一条200米长的石洞隧道。一入石洞，一股凉爽之气扑面而来，仿佛一脚踏进秋冬，可谓乘凉避暑胜地。一出洞口，眼前与脚下皆是雄峭的山崖和蔚蓝的海水。听，白色的浪涛冲击礁石的声音忽然作响。有人把这处景观称作中国的里约热内卢海湾。“将军岩”“狮子崖”“生

命门”等皆是这里独特的海蚀地貌之景。在这里，倘若晴空万里，凭肉眼就能眺望隔岸马祖北竿岛上匆匆行履的人们。1962年夏，郭沫若夫妇曾莅临黄岐。观赏这般风景时，郭沫若情不自禁赋诗一首：

和暖如春意欲融，嘉池山上鼓东风。

东西犬岛波涛外，南北竿塘烟霭中。

往北，就进入了苔菘镇。在这里有一个驿站似的“北纬26度”景观。驿站是枕石听涛的最好去处，时刻能聆听大海如诗一般的声音。与“北纬26度”相接的就是负有盛名的平流尾地质公园。这座公园里有一块块造型各异的嵌崆巨石，风情万种，形神毕肖。风高浪急时，似万马奔腾，让人惊心动魄；水波荡漾时，如万千少女，喃喃耳语，让人动情。这里的风声涛韵，如诗如画。此景此情，非到其境不能领受和感悟。苔菘

另一处胜景在北茭鼻。此处为连江境陆地最北端，可谓连江的天涯海角。要真正看海就该到这里来，因为这里至少汇聚了三湾两口水流，海底自成多处旋涡，是真正无风不起浪之海。无论晴天丽日，还是风雨交加，北茭鼻总是波飞浪旋或惊涛骇浪。如果不是驾艺娴熟的渔民老大，不敢轻易驾船至此。北茭鼻以它桀骜不驯的



黄岐湾

脾性征服了不少人，更吸引了众多胆识之士到此浪遏飞舟。

罗源湾

黄岐半岛北岸是另一番海景，不高的山上有一架架缓缓转动的风车。风车下的海湾比南面海平静多了。这边不仅泊有大小船舶，而且还有各种形状的渔排。连江，作为全国海洋渔业大县，气势就在这里。无论是后湾海、横厝海，还是同心海、沙澳海、大建海，都写满了“渔”字，不是海带紫菜，就是海参鲍鱼。到安凯乡的奇达海时，场面更为壮观。那纵横交错的渔排如同田园，或井状或圆形或星星点点，在此，可以真正领略到古人所言的耕海牧渔之蕴。在这渔海之上的白云山中还有两处风光，一是千年古刹白云寺，二是旗冠顶。旗冠顶是半岛的制高点。立山峰之巅，半岛乃至闽东海岛海湾和罗源湾风光可尽收眼帘。松泉海、江湾海、初芦海、可门口、新辉海，如珍珠般相连在这片海域，那彩色浮球下的海里尽是鲍鱼、海参或者石斑鱼、大黄鱼等名贵鱼产。

与定海湾和黄岐湾比，罗源湾静如处子，仿佛一处水光潋滟的大西湖。罗源湾有船、有岛、有滩涂、有可涨可退的海港，还有一座火电站、一个工业区和闽地最大的人造平原——大官坂垦区。这里也是一处养殖区，对虾、缢蛏、弹涂鱼、牡蛎、泥螺应有尽有。几十座星月般的村庄屹立在海湾沿岸。这里的最大亮点是独具特色的海鲜，如哇南、海月、土笋、沙虫、泥蚶、乌鲢、青蟹、八爪鱼、沙蚕、虾蛄、马蹄螺、凤凰螺、花螺，以及越来越受人青睐的生蚝、龙须菜和藤壶等。

于凡人而言，人生之福有二，即眼福与口福。如果爱看海上风光，那么，黄岐半岛2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皆是极目可眺的美景；倘若喜啖海鲜，半岛的海、礁、洞、滩涂里的鱼虾蟹贝触手可及，鲜美醉人。

美丽的黄岐半岛，一路风景一路海。



罗源湾

芬芳四溢 “茉莉花”

杨国栋

1

芬芳四溢、浓郁洁白的茉莉花，原产于印度，进入华夏后盛产于中国南方亚热带地区。茉莉花被古今文化学者拟人化地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品相，象征人间真善美。宋代诗人江奎在《茉莉》一诗中赞誉道：“灵种传闻出越裳，何人提挈

上蛮航。他年我若修花史，列作人间第一香。”可见芬芳馨香的茉莉花给了诗人怎样的强烈刺激。诗人所说的“蛮航”，指的是闽江航行。由于茉莉花茶最受北京人喜爱，故而有京都官方、百姓将福州茉莉花茶列为茶之饮品之首的说法。

“暮春郁绽茉莉花，玉骨冰肌影香纱。天赋仙姿柔枝翠，月夜清辉赏雪花。淡雅轻盈香韵远，君子世人品更夸。花馥茶美称上品，药食同源茉莉花。”古代诗人对于洁白无瑕、素雅清丽的茉莉花的吟诵诗作数不胜数。而当代中国民间老百姓对于茉莉花的记忆，最流行的还是20世纪耳熟能详的经典民歌《好一朵茉莉花》。

茉莉花民族歌曲带着芬芳馨香，漂洋过海，融入西方的高雅演出。世界著名歌剧大师贾科莫·普契尼还在他的大型



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



歌剧《图兰朵》中，让中国传统民歌小调《茉莉花》成为该剧的主要音乐素材之一。中国人造卫星把《好一朵茉莉花》带去了太空，也让这首民歌在世界各地的知名度和传播力不断提升。

位于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茉莉花广场，面积约1万平方米，连接福州马航洲生态湿地公园与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5座主体建筑，其中有音乐喷泉、延伸至江内的景观平台。茉莉花广场有着大片清丽洁白的茉莉花，还有遮天蔽日的榕树。茉莉花是福州市花，榕树是福州市树，两者在各种橙色、绿色、黄色、紫色、青色的衬托下，呈现出生机勃勃、春意盎然的美好景观。在茉莉花广场的绿地、绿荫、绿景的绿色荡漾中，游人休闲漫步、赏景悦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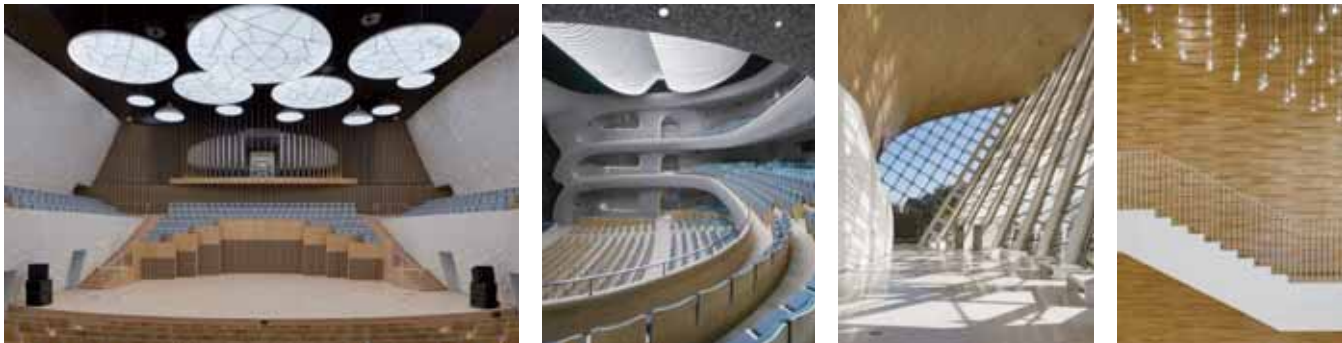
人有国籍，花无国界。把洁白美丽的茉莉花织成花环，套在客人颈上使之垂到胸前，可表达主人的热情好客之意。在国内外一些歌舞厅，向舞台上唱歌的演员敬献茉莉花，也表达了尊敬和友好。从这个意义上说，茉莉花早已不为某个国

家独有。茉莉花的久远馨香已经融合了诸多国际元素。

我国宋代诗人姚述尧在《行香子·茉莉花》中这样写道：“天赋仙姿，玉骨冰肌。向炎威，独逞芳菲。轻盈雅淡，初出香闺。是水宫仙，月宫子，汉宫妃。清夸苦卜，韵胜醪糜。笑江梅，雪里开迟。香风轻度，翠叶柔枝。与王郎摘，美人戴，总相宜。”应该说，后人不断传唱的《好一朵茉莉花》民歌，有着诗人姚述尧笔下《行香子·茉莉花》的影子。

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茉莉花”造型设计，也是富有创意，颇具特色的。绿色依然是主旋律，周边的公园和人行道边上，种植了蓝花楹、美人树、洋紫荆、黄花风铃木、黄山栾等花树，还有柳叶马鞭草、粉黛乱子草、紫穗狼尾草、小兔子狼尾草等多年生草本植物，形成连贯的十里花径。在“金沙飞舞”景区的东侧围挡内，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明显的改观。

许多义务植树和绿色氧吧维护者，在三江口



“茉莉花”大型建筑周边，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先进理念，积极打造生态化的城市轴线。火车南站、梁厝河、马航洲湿地遥相呼应，横贯东西，马杭洲河、闽江、乌龙江隐隐相连，贯穿南北，一条十字形生态长廊，成为三江口片区锦上添花的新景观。为此，“茉莉花”之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大型建筑，于2021年获得了美国 MUSE 国际设计奖“文化建筑”类别的铂金奖。

2

毛竹是福建的骄傲。福建毛竹又称闽竹，是极其重要的山林资源，种植面积、品种、产量为全国最多。闽竹是和紫幽生长在一起的植物，年年都能产生很高的观赏价值与经济效益。

闽竹的品种繁多，色泽鲜艳，如紫竹、罗汉竹、红竹、唐竹、橄榄竹等。唐朝诗人贯休的一首《五律》诗云：

藤屨兼闽竹，吟行一水傍。

树凉蝉不少，溪断路多荒。
烧岳阴风起，田家浊酒香。
登高吟更苦，微月出苍茫。

由此可见，在大唐时代甚至更早，闽竹就扬名华夏了。古代许多文人骚客都曾经对青竹的品格气节无比赞赏。“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一首七言绝句《竹石》天下闻名：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竹的气节与精神风范令人感动。大诗人苏东坡也对青竹高度赞扬：“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

竹的品相、品位、品性、品格，得到人类的赞赏。

有道是“素竹为肤，陶瓷为骨”。闽江下游五瓣“茉莉花”大型建筑，清新鲜亮，素净淡雅，一旦同柔中有刚的陶瓷组合，那样的品性和风情，可以让世人耐品耐读。

“茉莉花”大型建筑的设计大师们，充分考虑到毛竹这一福建特色，于是在设计中铺排并演

绎着大量的“毛竹元素”。每一个场馆前，都会有一条宽敞的曲线长廊作为“引渡”。长廊内可见大面积使用铝方通敷竹皮墙面，让人们可以尽情享受来自大自然原生态的美妙与温馨。

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建筑形式和颜色，均模仿了茉莉花盛开的形态，五片“花瓣”由东往西依次为多功能戏剧厅、歌剧院、音乐厅、艺术博物馆和影视中心。它们由艺术沙龙、画廊和中央文化大厅连接。它为创造一个闽江江畔的文化地标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使得“茉莉花”在永久的绽放中朝向闽江。

建设者在中央文化大厅中建造了大面积的清一色“中国白”，每一件考究的装饰都彰显出精致的细节，整个空间散发出一股空灵纯净又卓尔不凡的高雅气质。在其他公共区域中，茉莉花造型的休闲桌椅，呼应着几何茉莉花纹饰，达到美观与适用并存的功效。

更为别致的是每个独立的“茉莉花”花瓣建筑，呈现不同的功能，但其基本设计概念却又是相似的。每一个建筑都有一个核心区，一个半对外区。曲线长廊遵循弯曲的形状，通过中央文化大厅与其他建筑核心区相连。

打开岁月的旧窗，洞见月钩的光芒，我似乎看见盛开的福州市花茉莉花优雅的舞姿……

3

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自建成以来，其超高

水平的建筑设计，一直领跑于全国大型建筑艺术设计的前沿，备受业内人士的高度关注，数年间各种项目持续不断地夺得多项国内外顶尖级建筑的设计大奖。

2019年，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获得中国钢结构金奖等多项大奖。2020—2021年，获得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亚洲设计奖等多个奖项。2022年1月，获得第十九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此外，还获得亚洲设计奖的特等奖、美国IDA国际设计奖银奖等多项国际上的重要奖项。

2018年10月10日，“茉莉花”歌剧院组织首场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后来，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经营者却积极创新，采用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进行展演交流，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被世人誉为福州版的“悉尼歌剧院”。

2022年，“茉莉花”歌剧院充分利用各种有利资源，拓展经营范围，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歌舞、电影、演讲、报告等活动，同时也为全国和国外的大型表演、大型活动提供了优质的服务，好评如潮。

2024年新年伊始，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再次高歌猛进，抢抓机遇，持续引进艺术感染力强的优秀电影和歌舞作品，吸引了新一轮观众和文化艺术爱好者。

美丽的“茉莉花”在文化和艺术交织的维度里，始终盛开着，芳香不绝……